



#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FACULTY-ORIENTED INFORMATION EXPRESS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主办

- ◆ 经贸动态
- ◆ 金融动态
- ◆ 商务英语动态
- ◆ 法学动态
- ◆ 高教动态

**1 Vol.5**  

---

**2009**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9 年第 1 期 • 总第 29 期)

顾问: 叶兴国 胡雪梅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王群 谢丹迎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李谋信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 目 录

### 一、经贸动态

|                         |    |
|-------------------------|----|
| 200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专家权威解读..... | 1  |
| 关于中韩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分析及启示.....  | 7  |
|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底部了么.....       | 11 |
|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 16 |

### 二、金融动态

|                             |    |
|-----------------------------|----|
| “第二波金融危机”离我们多远.....         | 22 |
| 全球金融海啸隐显三个大“底”.....         | 23 |
| 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契机.....            | 24 |
| 赵启正: 中国没有金融危机 不要陷入认识误区..... | 26 |
|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专访索罗斯.....     | 27 |
|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             | 30 |
|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 几何图形的观点 .....   | 32 |
| 中国: 这么多美元怎么办? .....         | 35 |

### 三、商务英语动态

|                                                                                  |    |
|----------------------------------------------------------------------------------|----|
|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Skills for Business Students .....                      | 38 |
| Using the E-Mail Précis for Advanced Learner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 50 |

### 四、法学动态

|                            |    |
|----------------------------|----|
| 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年立法工作简述.....  | 55 |
| 论国际法的国际化——中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 | 59 |
|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 66 |

### 五、高教动态

|                                           |    |
|-------------------------------------------|----|
|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 2008 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的通知..... | 78 |
| 周济: 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 82 |
|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回应繁体字建议 法律说了算.....               | 83 |
|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 塑造高峰体验 用优秀文化育人.....             | 84 |
| 学生管理归位 构建辅导员队伍新模式.....                    | 88 |
| “学院”改名为“大学”的动力机制——以美国亨廷顿学院为例.....         | 91 |

S I F T |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9 年 03 月

第 1 期[总第二十九期]

### 本期要目

- 200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专家权威解读
- 关于中韩农产品贸易争端分析及启示
-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底部了么
-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 200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专家权威解读

2009 年全国两会是提振信心的两会。

温家宝总理在 3 月 5 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对 2009 年整体工作部署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因为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才“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

宏大的规划和战略需要有的放矢的具体部署和强有力的执行力，面对新中国 60 华诞的到来，2009 年注定将再次成为中国发展里程碑式的一年，如何理解这份关键时刻的政府工作报告？它将开启怎样战胜风雨的奋斗道路？其重点思路和施政逻辑将如何展开？等等问题，《瞭望》新闻周刊邀请了多位权威专家作详细解读。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如下(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 国内政策探讨

王延中(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刘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

安体富(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

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教授)

### 增长，“困难和希望同在”

《瞭望》：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坚持把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保 8% 的困难和机遇似乎都包含其中了。

安体富：关键要明白为什么保 8%？西方国家增长 2%~3% 就不得了，但是我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效益型经济，我们是粗放型。我国原来一直增长比较高，2007 年 13%、2008 年 9%，那么今年如果达到 8% 的话，就比 2007 年下降了 5 个百分点。



我们一般推算,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就要增加失业100万人口。所以相对2007年下降5个百分点就是增加失业500万,这是很大的事。所以,西方以0~1%作为保底,我们的保底实际上就是8%,否则整个经济、就业形势就难以承受了。

常修泽:目前面临的形势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明显增大。这次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用了“复杂、严峻”这样的词,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这场金融危机到现在尚未见底。

8%,作为我们今年全国人民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具体目标,我觉得是合适的。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感到,第一,有难度,不是唾手可得。IMF预测今年美国可能是-1%左右,欧盟也是-2%--1%。由于我们依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关键在于怎样保增长。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在爬坡阶段,我们现在工业占GDP的比重为43%左右,还是一个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我国还有55%左右的居民生活在乡村,按照城镇化进程,一年大约有1000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来,这1000万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我们到2020年要争取全面实现小康,这个过程中百姓的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中国储蓄率高,资金相对来讲比较充裕,劳动力资源也丰富。

所以,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大于困难。

《瞭望》:当前保8%需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

常修泽:从温总理报告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其一,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了调整产业结构、使之优化升级,非常重要。其二,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怎么由粗放式发展转到一个集约式发展。其三,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暴露了中国经济生活深层次的制度性障碍。前些年经济增长率很高,水位高把水底下的石头掩盖了。现在,经济下滑水位下降了,我们经济生活内部的一些体制性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比方说资源产品价格机制不合理,造成资源的滥用和破坏。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次危机,下功夫解决这三个问题,将会获得一个长期稳定健康的增长速度。

### 重心在民生

《瞭望》:今年温总理的报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重民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政策重点上,都让人充分感受到这一点。

王延中: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体制不顺和社会矛盾剧增的情况下,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促和谐,更加体现了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关注经济,转变为关注全局,是在社会建设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深切体现,也是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发展是不能动摇的根本战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保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着眼点仍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非常正确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国家财政收入和可支配能力明显增强,这对我们解决过去遗留的历史欠账,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福利,促进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温总理在今年的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 2930 亿元, 积极就业资金 420 亿元, 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 改善教师待遇。同时, 各级政府三年内预计投入 8500 亿元用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其他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投入, 也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将大大促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步伐。

《瞭望》: 报告关于民生战略的部署, 可以明显看到“社会保障”是个突出重点。

唐钧: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 社会保障可以说是民生问题中的重中之重。2月23日, 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上, 就将“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放在“四项总体要求”之一的位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关社会保障, 最令人振奋的亮点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要覆盖全国 10%左右的县(市)”。

近年来, 在社会保障方面, 各级政府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各个方面, 实际上都已经有所动作。医改方案和社会保险法以及关于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两个办法已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社会保险的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有了成功的试点样板,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正在发挥“保底”的作用, 社会福利服务和慈善事业也正在各个相关领域内形成合力, 优抚安置和救灾救济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政府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也正在连年增长。

但是, 要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可以说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比较困难的时期, 社会保障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鉴于社会保障“可上不可下”的刚性特点, 所以首先可能要确立一个基本原则, 这就是: 只能做加法, 切忌做减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物质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心理方面。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关部门放出的“推迟退休年龄”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试探气球, 就触动了中国社会两个重要阶层——企业职工和专业人员本来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 社会效果是负面的。

《瞭望》: “社会保障”的难度具体如何讲?

唐钧: 比如, 实现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的时间表已经列出, 而且很有可能写进《社会保险法》中。但是, 怎样定义“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 公众心目中的“统筹”是“一卡通”, 是“通存通兑”, 而现在有关部门笼统说的“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 其面目是模糊不清的。很有可能, 埋下的伏笔就是, 有关方面宣布实现“统筹”了就“统筹”了, 与公众的理解相去甚远。

类似的具体问题仍然很多。要实现“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人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目标, 我们仍然任重道远。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 再踏踏实实地一个个寻找解决办法。尤其是要时刻牢记, 现在正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 人心向背应该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王延中: 应当指出, 受发展阶段和目前国力水平的限制, 我国还难以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我国的民生和社保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协调发展道路,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这是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我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应当是发展型的, 确保全民共享和公平公正, 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相对于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来说是偏低的, 应当适当加大投入、加快发展, 尽快补上民生保障、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一课。特别是面对经济下滑导致的就业压力, 要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大学生就业、青年就业、困难人群就业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扶持重点，切实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实现最大程度的民生建设。

### 财税任务最重

《瞭望》：根据温总理的报告，很多工作都是围绕着积极财政政策展开的，今年财政工作和财税负担不轻。

安体富：多年的财税收入高增长在这个时刻需要发挥积极作用。其实，财政收入方面，一再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即有的税种可能要减负担，有的税种可能要增加收入，但算总账是减收的。通过减税，主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政府这次的做法主要是围绕增值税转型。当时计算了一下大概减少收入 1000 亿。从今年 1 月 1 号开始实行。除了增值税转型外，我们今年新出台的减税措施实际上不是太多，主要是把去年实行的减税措施今年继续实行。按照我的想法其实还可以加大力度。

支出方面规模巨大，但大规模投资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不少人有看法。在我看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来得比较快、比较直接，另外投资可以带动就业，按照以前的数据，投资中的 60% 可以转化为工资。

当然，投资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投资不一定就增加就业，投资到什么地方应该考虑到就业问题。从报告看来，政府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其二，投资要看到效应，不要搞形象工程，要注意腐败，要加强监督。温总理的报告里面也重视了这个事情；其三，还要避免产能过剩，如果用在加工行业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瞭望》：报告显示，财政政策在扩内需、促消费上也格外重视。

安体富：从现在报告谈到的内容来看，我算了一下，十四个指标里面很多涉及这方面，大概有 16590 亿元用于这方面。包括促进就业 420 亿元，今后三年中央财政向医改的投入 3318 亿元，三农投入 7161 亿元，科技投入 1461 亿元。社会保障 2930 亿元，地震灾后重建是 1300 亿元，基本都是拉动消费。这次一致重视消费的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消费真正要启动，还得解决几个问题，比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调节收入差距和提高城乡居民的支出预期（消费预期）。

《瞭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要注意优化支出结构？

安体富：这一点很重要，积极财政政策不等于大手大脚不讲效益。从现在预算来看，增加投资和消费方面支出的同时，就该减少其他方面的一些支出，主要是行政管理。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过大，大概占 1/5，这点群众反映很强烈，包括“三公”的支出，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使用问题。

另外，还有机构臃肿问题。这次政府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控制出国旅游和公务经费等措施。这个问题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的重要问题，现在在经济困难时期也是个时机，要压住，把主要支出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投资、消费方面。

《瞭望》：在财政收入减少背景下，大规模财政支出，对我国财力影响如何考虑？

安体富：一方面，财政基本靠税收，GDP 增长快的情况下其增长更快。反过来如果 GDP 下降的话，财税收入就大体上和 GDP 增速差不多了，甚至更低。今年 GDP 增长保 8%，财税增长大概预计也是 8%。而且，又有很多减税政策，结合在一起，今年财税收入可能减收较多。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消费,又要扩大财政支出,赤字比较大。去年赤字1110亿,前些年有时甚至还有结余。所以,估计今年赤字可以达到1万亿,甚至1.2万亿,都可以承受。现在温总理报告提出9500亿赤字,控制在警戒线之内,承受力上游刃有余。

当然,有些人担心我国以前积累到现在的隐性债务很多,基层到地方隐性债务很厉害,担心这样会出现财政风险。我认为现在赤字率比以前要高得多,财政风险是加大了,但如果不这么搞,经济上不去,风险更大。相比之下,还是在采取各种措施的前提下提高赤字率风险比较小。只要我们能渡过这个难关,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今后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至于隐性债务,与现在的赤字性质不一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来解决。总之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状况到目前为止可以承受。

### 攻坚国内市场

《瞭望》:扩大内需是报告对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领域,但国内市场的开拓难度不比国际市场小,甚至更复杂。

彭真怀:应当帮助出口企业尽快把目光转回国内,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开拓国内市场,变原来的外销为内外销并举,用“两条腿”走路。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更应当断臂求生,主动关停并转,避免高消耗、低效率之路越走越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要坚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变压力为动力,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和体制创新,形成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增强更高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开拓国内市场,不但是扩大内需的路子,更是转变增长模式的路子。

《瞭望》:开拓国内市场的突破口应该选择哪个方向?

彭真怀:比如房地产市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整顿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行为,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推动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我认为,这个判断抓住了房地产市场的症结。从2005年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就进入价格膨胀期,高房价让富人更富,让地方官员寅吃卯粮出政绩,中低收入居民却买不起房子,多年带病运行,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房地产市场的本质问题不在于住房过多,而在于房价过高,以致中低收入居民买不起房子。突出的问题还在于,房地产市场面临严峻的供应过剩风险。全国现有存量房3.32亿平方米,在建24亿平方米,空置率为71.5%。即使按2007年全国平均房价3885元/平方米计算,存量房占压资金也高达1.25万亿。

对于房地产市场笼罩的观望气氛,我认为必须让房价回归到与居民购买力相协调的水平,应该救的是“市场”而不是“房价”。个别房地产开发商利用经济实力,掌握媒体话语权,混淆视听,仍在编造种种不维护高房价就影响经济基本面的危言。但我相信绝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愿意理性降价,因为有活跃的交易行为才能保证投资的增长,才能有稳定的收入预期。降低房价,最终实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是房地产市场成长与成熟的标志。应该强调的是,房地产开发商自有投入资金大多来自银行贷款,没有购买力的房地产市场是危险的,严重时可能绑架政府、绑架银行、绑架社会。

怎样确保既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购买力,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落实好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性和改善性住房的信贷、税收和其他政策。但还应当进一步给出更加清晰、明确的信号,房价降到什么价位才算合理,才不会继续往下降。





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应正视并解决这个实质问题,从而释放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购买力。具体的内容可以包括:其一,实行房地产市场最高指导价,不同城市区别对待,确保一步降价到位。其二,居民购买首套中小户型商品住房(体现合理、自住、普通商品住房三要素),可以直接获得房价总额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其三,对房地产开发商给予减免土地出让金等适当补偿,规范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行为。此外,继续完善降低交易税费、加大购房金融支持等行之有效的配套办法。

### 降低经济对外依赖性

《瞭望》:此次金融危机带给我国经济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外贸依存度过高大大加深了经济的脆弱性,报告对此分析清晰。

梅新育: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快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推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到全世界最高水平,2007年外贸依存度为64.4%。其他大国外贸依存度通常很少达到30%,即使以外向型经济而著称、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2007年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9.2%。

彭真怀: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一个特有的经济现象,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依存度高达70%,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出口依存度达到40%以上。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软肋,但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我国通过出口创造的大笔外汇,大多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存放在美国银行,这些钱又通过美国企业回到我国投资。购买美国国债最多只有5%的收益,外商投资回报率却高达15%。

这一来一回,不算我国付出的环境污染、本土企业被挤出等隐性代价,中间就是10%的净损失。这种出口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国内资源消耗殆尽后,又不得不到世界各地高价买资源。因此,我认为要学会承受GDP的慢速发展,不必过于理会出口对GDP增长速度或左或右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就此指出,今年8%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也是综合考虑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

《瞭望》:如何辩证理解这个问题?

梅新育:从宏观层次看,单纯依靠内需而不保持足够的出口规模,中国经济不可能维持足够的增长速度。

从微观层次看,由于我国已有数百上千种产品产量高居世界之首,生产和出口规模动辄占世界市场总量的百分之八九十,单纯依靠国内市场也根本就不可能容纳我们这些产业已建成的巨大产能。

无论我们高度依赖外需和加工贸易的增长方式有多少弊端,我们都不能脱离现实去谈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能抛开已有的这一摊子去另起炉灶,而只能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改善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因为如此,正如温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放松出口,要通过国际通行财税政策、金融服务等措施努力保持出口平稳增长,并通过发展服务贸易等开辟出口发展新天地。而且,我们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是要和推动出口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对外经贸并不局限于出口和引进外资,也包括进口和对外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当前的危机恰恰为我国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创造了良机,所以才有总理报告中强调的“努力扩大进口”,以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口号曾经响彻神州大地,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能永远被动地与他人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接轨,我们还需要适时渐进地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我国利益、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政府驾驭能力再受考验

《瞭望》：从报告描述的今年局面来看，党中央和国务院在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局势中，将再次受到时代和历史考验。

刘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就现阶段来讲，提高政府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具有极为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艰巨的课题，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应对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推进社会发展，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从而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

《瞭望》：这些考验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春：从当前的迫切性来看，各级政府应着重提高的能力主要包括：首先，认识和掌握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的能力。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联互动关系等，都存在哪些规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知之不深，知之不透，仅满足于一知半解，就无法在政策上作出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困难的挑战面前，了解和把握经济变动规律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正确认识的指引下，统筹兼顾，妥善应对风险。

其次，科学民主决策的能力。科学决策的意义在于用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思路 and 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民主决策则促进和保障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如果政府决策不科学不民主，保增长和保民生的重点和许多具体问题均难以清晰认识和正确把握。政策很可能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民生的需求相背离。过去不少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均是决策不科学不民主的产物。为此，必须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不断提高对于科学民主决策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实践科学民主决策的能力。正如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的，政府要做到察民情、听民意、聚民智，尊重客观规律，提高决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其三，依法行政的能力。通常，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公共管理的绩效和质量是成正比的。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更把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凸显了出来。只有严格依法行政，才能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保障政府活动的规范化，有效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纾缓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护民生，保障稳定。特别是通过依法行政和规范的公共管理，才能创造良好环境，增强企业投资信心，增强社会消费信心，促进经济增长。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制定并遵守合理的程序和规则，为企业和公民提供规范的服务，提高运用法制工具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绩效和质量。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09 年第 10 期

## 关于中韩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分析及启示

**内容摘要：**自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联系日益紧密，但两国在 2000 年和 2005 年先

后围绕以大蒜和泡菜为主的农产品

国际  
运行  
分析





发生了两次贸易争端。本文通过对这两次争端的分析和比较,以期为今后应对类似的贸易冲突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 中国, 韩国, 农产品, 贸易争端, 分析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405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20多倍。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国;而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外资来源国。双方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2000年两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以大蒜为主要产品的贸易争端;事隔不久,2005年10月的“泡菜风波”又引起双方新一轮的贸易争端,双方经贸关系受到冲击和影响。本文通过对两次贸易争端的对比分析,以期对中韩两国之间及对中国与其它贸易伙伴国之间,为防范和解决类似的贸易纠纷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 两次贸易争端概述

#### (一)第一次贸易争端——“大蒜贸易战”

中韩正式建交之后双边各类商品的贸易增长迅速。以对韩大蒜出口的数量变化为例,199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大蒜为9500吨;1997年增至18400吨;1998年达36000吨;1999年达89530吨。2000年因输往韩国的大蒜数量大幅增加,严重影响到韩国大蒜的市场价格和韩国大蒜种植农民的收入。在各方压力之下,韩国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蒜关税由30%调高至315%,这次关税的调整涉及中国大蒜的价值约为1500万美元。在协商没有取得成果的情况下,2000年6月中国宣布禁止由韩国进口移动电话及聚乙烯,这两项产品1999年的进口值估计在5.1亿美元以上。2000年7月中旬,中韩两国在北京经过为期约两周的谈判后达成初步协议,

终止两国间由大蒜贸易挑起的贸易战。根据2000年8月的正式协议,中国同意撤消禁止进口韩国手机和聚乙烯的措施,以交换中方获得自2000年起三年内,以30%和50%的关税待遇每年向韩国各出口32000吨、33728吨、35448吨大蒜,包括征收30%关税的20000吨新鲜及冷冻大蒜。至此中韩两国第一次贸易争端结束。

#### (二)第二次贸易争端——“泡菜风波”

中韩第二次的贸易争端是围绕中韩两国的泡菜进出口展开的。泡菜是韩国的传统美食之一,由于物美价廉,韩国的很多学校、公司和餐馆都是大批量订购。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泡菜从2001年的393吨猛增到2004年的72600多吨,四年来增长了185倍。到2005年,韩国进口的中国产泡菜数量已经突破了10万吨,这是韩国国民年均泡菜消费量的1/15。而2004年韩国泡菜出口只增加了43%,但进口却增加到出口的2倍多。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泡菜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

与此同时,韩国国内不仅种植白菜的农民收入大幅下降,而且韩国生产泡菜的厂商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各方多次向政府施压,希望采取一定措施来控制中国产泡菜的进口。2005年10月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称,对在韩国市场上销售的9种中国泡菜进行食品安全性检测时检测出三种寄生虫卵,随即对来自中国的进口泡菜采取了禁售和回收措施。尽管在此期间双方经贸官员都表达了对正常贸易关系的维护,但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公布第二次检测结果时,称再次检测到寄生虫卵。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宣布从韩国生产的10种泡菜、辣椒酱、烤肉酱等产品中检出寄生虫卵。国家质检总局就此发布公告,当日起停止相关产品的





进口入境。以泡菜为主的贸易争端爆发。随后双方进行了多次的解除和协商,两国就泡菜贸易的问题达成了谅解,双边贸易重新恢复了正常。至此中韩两国第二次贸易争端结束。

### 两次贸易争端对比分析

#### (一) 两次贸易争端的相同点

涉及到的主要对象都是农产品。两次贸易争端的主要对象都是农产品,具体包括大蒜、新鲜冷冻大蒜、泡菜、辣椒酱、烤肉酱等。它们都是中韩两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常涉及到的农产品,其共同点是价格低、科技含量不高。而且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农产品从种植地、消耗地都带着较浓厚的地域性特征。之所以涉及到的产品以农产品为主,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任何国家的农产品对本国的国民经济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韩国也不例外,这就决定了其必然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中国农产品出口经常以低价取胜,科技含量和品质低,容易招致对方的贸易限制,这就必然招致了韩国对来自中国农产品的限制。

两次贸易争端发起国相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韩国之所以成为贸易争端的发起方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韩国作为一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能力并且愿意采取积极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于进口农产品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加之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所以进口价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国农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到生产者及消费者的收益。因此韩国也倾向于实施贸易保护,以确保国民收益和维护国家利益。第二,从政治观点出发,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受到农产品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较为直接,容易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在其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国家政治选举制度按区域划分的做法进一步给了农民较大的政治权

利;因此政治家为了当选,就不得不照顾选民,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这也是韩国政府为了顺应本国农民的利益而发起贸易争端的重要原因。

#### (二) 两次贸易争端不同点

两次贸易争端背景不同。中韩“大蒜贸易战”发生在中国未加入WTO之前;而“泡菜风波”却发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对比两次争端最终解决方式,可以发现“泡菜风波”的解决比上次“大蒜贸易战”时中方的措施更加中立、温和与对等。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在WTO框架下,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贸易争端时,由于中国未加入WTO,因此不受WTO法律的约束,中国采取了直接报复韩国的措施。但第二次贸易争端中,由于受到WTO相关规定的约束,中国以比较沉稳的途径解决,用韩国挑起贸易争端同样的方式,即调查韩国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是否符合卫生检验检疫标准,从而禁止进口韩国相应的产品。

挑起贸易争端的方式不同。“大蒜贸易战”是韩国以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蒜影响到本国大蒜行业的发展为由而进行进口限制;而“泡菜风波”中韩则是借口中国产泡菜在卫生检验检疫中不合格的理由停止进口中国产泡菜。从中分析可以发现:贸易保护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从表面看是由直接裁定中国影响韩国而采取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方式,转变为以卫生检验检疫不合格为借口禁止进口中国产泡菜的隐蔽贸易保护方式,实际上却反映了以韩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贸易保护方式正由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变为更为隐蔽的非关税壁垒。

两次争端的影响范围不同。“泡菜风波”并没有发展到5年前“大蒜贸易战”的程度,影响范围和涉及金额都比前一次贸易争端要小。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具体原因是:与中韩贸易总额相比,这次所关联到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并不多;从泡菜的生产角





度分析,其工业化程度不高,并不是中韩贸易的主流,也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两次争端中中国的应对措施不同。2000年“大蒜贸易战”时,韩国宣布从2000年6月起进口中国大蒜征收惩罚性关税;随即中国宣布停止进口韩国的手机和聚乙烯。这种解决贸易争端的手段较为直接和简单。但在“泡菜风波”中,中国的应对措施明显与上次争端不同。中国这次同样也在相同领域采取相应措施,从韩国进口的农产品中进行卫生检验检疫,并查出寄生虫卵,且同样进行限制性进口。中国这一次所采取的相对温和的应对措施,充分体现了中方对维护双边正常经贸关系的诚意。

### 中韩两次贸易争端的启示

#### (一) 中韩两次贸易争端相同点的启示

两次贸易争端所涉及到的产品基本都是农产品。农产品对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决定了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但在农产品贸易中中国却存在一系列的不足之处。例如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未注重市场的多样化、农产品出口主要靠低价取胜、科技含量低、竞争力相对较弱等,这些都是容易诱发贸易冲突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应该从自身出发,一方面努力改善中国农产品的卫生质量,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及科学的测试方法,保证中国的农产品具有在任何一种卫生检验检疫中都达标的高质量;另一方面还要及时针对主要进口国市场情况,调整产品,提高科技含量和品质。如果能够针对不同进口国的情况,研究制订新的产品策略,使产品具有特殊性,则能够减少与国外同类产品的低水平竞争。

两次贸易争端发起国都是韩国。工业化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由来已久,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的韩国,其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因此在本国产品受到威胁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保护生产者收益都是必

然的。因此中国应当加快同以韩国为代表的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进行谈判,确保各方在双边贸易中遵守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

#### (二) 两次贸易争端不同点的启示

争端解决方式的变化。在WTO框架下,这两次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直接的贸易战转变为较温和、中立的解决方式。这种充分体现了在新形势下中国也在不断适应和学习,并在这种过程中进行相应的调整。只有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WTO的相关规则和要求,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WTO所规定的方式和手段保护本国出口产品,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

贸易保护方式的转变。贸易保护由直接提高关税进行限制进口,转变为以卫生检验检疫为代表的隐蔽的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方式。这种新的变化说明作为发达国家一员的韩国也在不断适应国际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其贸易保护的方法和手段,并且这种越来越隐蔽的贸易保护方式将会成为今后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点问题。

综上,通过对中韩之间两次贸易争端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不断深入,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中的贸易摩擦和纠纷会出现的更加频繁。并且其涉及的领域、产品种类和争端的解决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各国贸易关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特点。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新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更加关注各种发生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新问题和新变化,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并从中总结出规律和特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作者:章辉 来源:《商业时代》2009年第4期







## 形势判断

## 趋势预测

##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底部了么】

**摘要：**本文在对美国 50 多年来季度经济增长周期的研究基础上，提出 2009 年一季度很有可能是美国此轮经济调整的低点，美国的全面复苏或始于 2010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与美国因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美国经济 2010 年或有好转很可能意味着 2009 年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近几年增长的底部区域。文章也对当前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次贷危机 经济周期 超额货币 底部 复苏

### 一、美国经济或在 2010 年一季度复苏

自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出台措施，力图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迹象依然难觅，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程度日益加深，金融危机正从发达国家向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加剧。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 年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 3.8%，经济紧缩下滑速度创下 26 年来之最；出口急剧放缓，环比增长大幅下降 19.7%；今年 1 月份失业率达到 7.6%，为 16 年来最高水平。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包括工厂、矿业和公共事业企业在内的美国工业生产在 2009 年 1 月份下降了 1.8%，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数据还显示，1 月份，美国工业设备开工率为 72%，低于前一个月的 73.3%，也低于去年同期的 81%和 1972 年至 2007 年平均水平 80.9%，这显示美国经济仍处于下行过程中。居于金融风暴中心的美国，经济衰退会持续多久，何时能够复苏，将成为决定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通过对美国 1956 年 1 季度——2008 年 4 季度经济增长率的研究，发现：

美国的经济周期通常呈现 V 型曲线，即急剧衰退之后往往出现快速增长。而且，美国季度经济增长大多时期处于 2%——5%的区间，低于 2%经济增长率的时间段共有 11 次（具体如下表 1），其中因危机或紧缩性政策而造成的经济衰退共 9 次（即剔除表中所示的第九次与第十次），在此 9 次衰退中，共有 5 次低点（或相对低点，第六次危机中出现 W 形的双底走势）出现在第一季度。

表 1 美国经济 1956 年以来的运行与调整情况

|     | 时间段       | 简要说明                     | 调整时间  | 最低点所在季度 | 负值季度数 |
|-----|-----------|--------------------------|-------|---------|-------|
| 第一次 | 57Q4-58Q3 | 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                | 4 个季度 | 1 季度    | 3     |
| 第二次 | 60Q4-61Q2 | 第一次美元危机                  | 3 个季度 | 1 季度    | 2     |
| 第三次 | 70Q1-70Q4 | 紧缩性政策引起的经济衰退             | 4 个季度 | 4 季度    | 1     |
| 第四次 | 74Q1-75Q3 | 世界第二次经济危机、滞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 | 7 个季度 | 1 季度    | 5     |
| 第五次 | 79Q4-81Q1 | 第二次石油危机、滞胀               | 6 个季度 | 3 季度    |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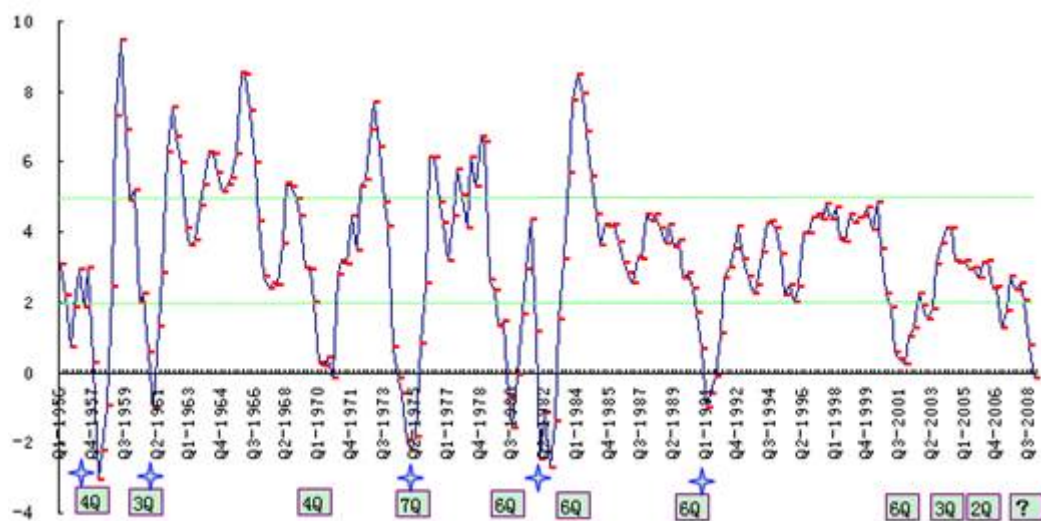




|      |           |               |      |     |   |
|------|-----------|---------------|------|-----|---|
| 第六次  | 81Q4-83Q1 | 石油危机、滞胀       | 6个季度 | 3季度 | 4 |
| 第七次  | 90Q3-91Q4 | 海湾战争、日本楼市泡沫破灭 | 6个季度 | 1季度 | 3 |
| 第八次  | 01Q1-02Q2 | 科技股泡沫破、9.11   | 6个季度 | 4季度 | 0 |
| 第九次  | 02Q4-03Q2 | --            | 3个季度 | 1季度 | 0 |
| 第十次  | 07Q1-07Q2 | --            | 2个季度 | 1季度 | 0 |
| 第十一次 | 08Q3-?    | 次贷危机          |      |     |   |

数据来源：OECD，国研网整理

图1 美国季度经济增长的长期走势



数据来源：OECD，国研网整理，星形表示低点出现在1季度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确认美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并确定此次衰退始于2007年12月1日。截至2008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两个季度处于2%以下。如果根据美国1974年以来最近5次衰退的经验来看，美国季度经济增长在2%以下的调整期为6-7个季度，鉴于此轮危机的严峻性，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将还有4个季度在2%的经济增长率下运行，其中，或有3个季度经济呈现负增长（即5次经济负增长季度数的均值）。从一季度出现低点的概率来看，2009年一季度，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此轮经济调整中的最低点，2009年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此轮调整中最糟糕的一年。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复苏期或在2010年1季度。

## 二、2009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近期增长的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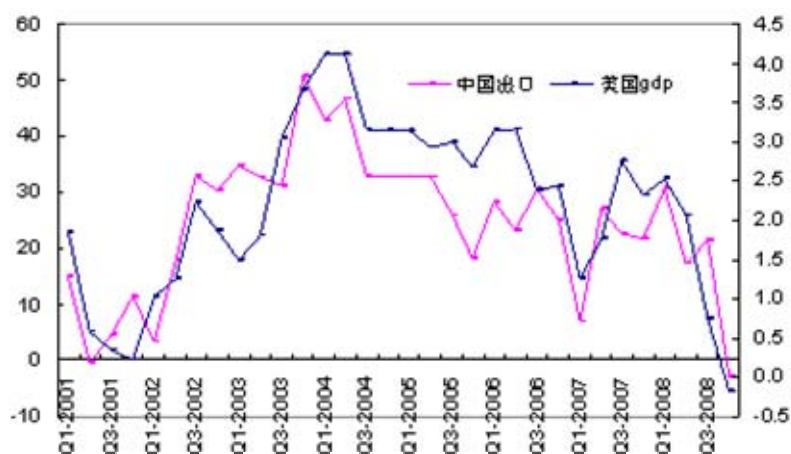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其中，美国更占据了20%左右。由于美国的GDP占世界GDP的30%，美国的进口虽然只占世界贸易的15%，但其对世界贸易的实际影响应接近30%。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在令美国、英国及其一些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同时，也间接地打击了中国的出口。数据表明，美国经济长期来看，影响着中国的出口，并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三者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美国的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中国，当美国经济扩张时，增加中国产品的进口，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美国经济收缩时，减少中国产品的进口，使中国经济趋于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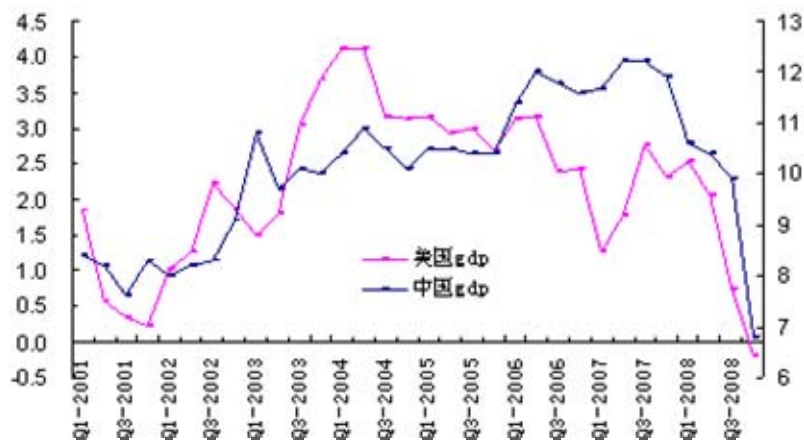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出口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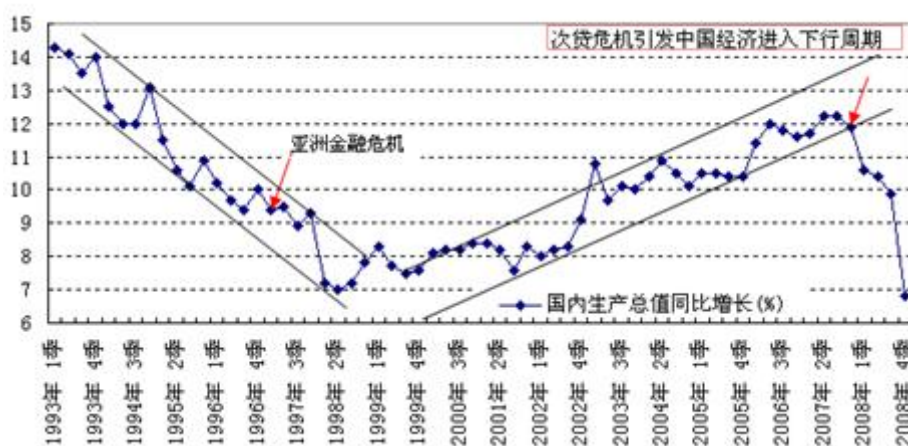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OECD, 国研数据

图3 美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 OECD, 国研数据

图4 次贷危机引发中国季度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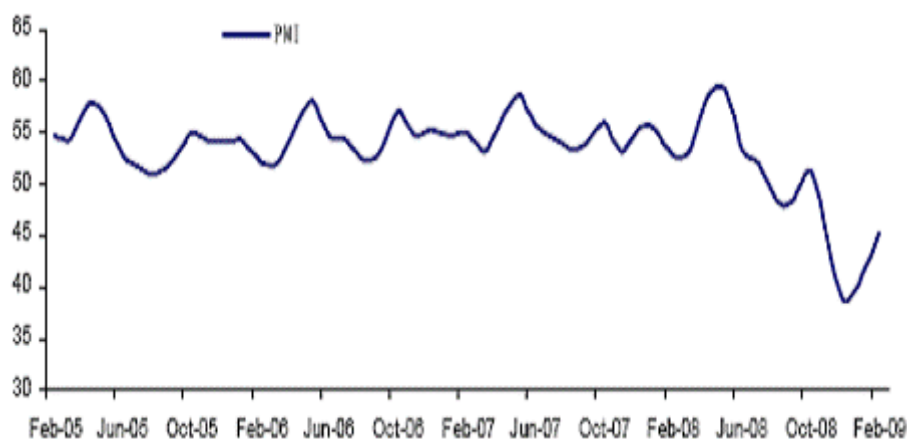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OECD, 国研数据





我国2009年2月份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这一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继续保持好转,2月份中国PMI为49.0%,比上月上升3.7个百分点。从该指数来看,虽然继续处在50%以下,但自去年11月份创38.8的低点以来,连续3个月呈回升态势,目前已经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标来看,呈现普遍回升态势,升幅多在3个百分点以上,尤其以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积压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升势最为显著,升幅超过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已回升到50%临界点以上。作为一个经济先行指标,PMI若低于50%即意味着制造业萎缩,反之则意味着扩张。2月份PMI指数及各分项指数全面回升,显示制造业活动虽然仍在萎缩,但较2008年底时已有明显缓和。

图5 中国PMI先行指标回升表明经济已较2008年底显好转



数据来源: 国研数据

从发电量这一先行指标看,2009年1月,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为2476.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2.3%。按这个数据,剔除季节和春节因素影响后,1月份发电量比上月增长3.3%,折年率43.1%。

在2月28日,温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提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初步见到了效果,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表明我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其中,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发电和用电量都恢复了正增长。在全国,2月中旬增长15%,环比增长13.2%,在南方,同比增长10%,环比增长8%。

用电量的大幅回升,表明1-2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在回升,工业增加值和总体经济的同比增长速度都会高于去年四季度。

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经济短期快速回落的压力得到释放。考虑到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在一季度表现最为糟糕,而同期我国经济则较上年第四季度有所改善,因此,可以认为,2008年第4季度很有可能会是我国经济的最差时期。

作为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的经济衰退程度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美国的金融市场先稳定下来,世界金融市场才有望实现稳定,并从而有望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出口作为国内政策难以控制的外部变量,基于我们上述对美国经济增长形势的预期,2009年仍将很难有所起色。在固有发展模式、不考虑中国宏观调控效果的情况下,美国有望在2010年一季度实现复苏,并带动中国出口从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在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提前复苏,如此看来,2009年,我国经济的底部正趋形成。







### 三、应提防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

我国2008年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万亿元,增长21.6%,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比2007年加快2.3个百分点,高于GDP增速5.8个百分点,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进一步增强。2009年,“双节”消费市场也较为火爆。据商务部监测,1月全国千家重点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24.5%,其中食品、烟酒、金银珠宝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9%、47%和29%。乘用车销售连续两月回升。此外,文化、旅游、教育、电讯等服务消费收入增长明显,标志着我国居民消费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转变。

虽然我国消费增长势头在2009年开端良好,但仍然存在放缓的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工业增速的低点出现在1998年,但消费增速的低点则出现在1999年。在美国经济仍有恶化趋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我国消费的平稳快速增长,实现消费升级,拉动内需,将会极为重要。

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消费模式,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有望出现改变,美国民众的储蓄率在2010年经济复苏后或有所上升,即美国人的消费或变得谨慎。这将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巨大挑战。而比较悲观的因素在于,我国已经公布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只有较少的一部分用于民生项目,而其中的大部分投资仍然用于新增产能、扩大未来供给。在国内就业和收入增长恶化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新增的产能,在国内消费未加改善的情况下,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效应仍有可能是一次性的。

我们此前的研究报告《积极财政、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经验与政策启示》已经指出,既往的财政赤字政策使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格局恶化、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影响到了财政政策的绩效,并可能与其初衷相悖,即当年的赤字政策主要是为提振当年或次年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滞后效应与经济周期规律的存在,这一政策往往在当年效果会非常有限,反倒会在经济走向复苏的阶段,加剧经济的过热!

因此,2009年,为提防我国居民消费增速的回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改善民生、刺激最终消费需求这一方面,而应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

### 四、货币政策在2009年应提防过于放松

2009年2月份起,央行并未如1月份多数券商和机构所预期的那样,继续采取降息这一货币工具,这是符合我们1月份报告《频繁降息的作用及未来政策的可能取向》中所提出的观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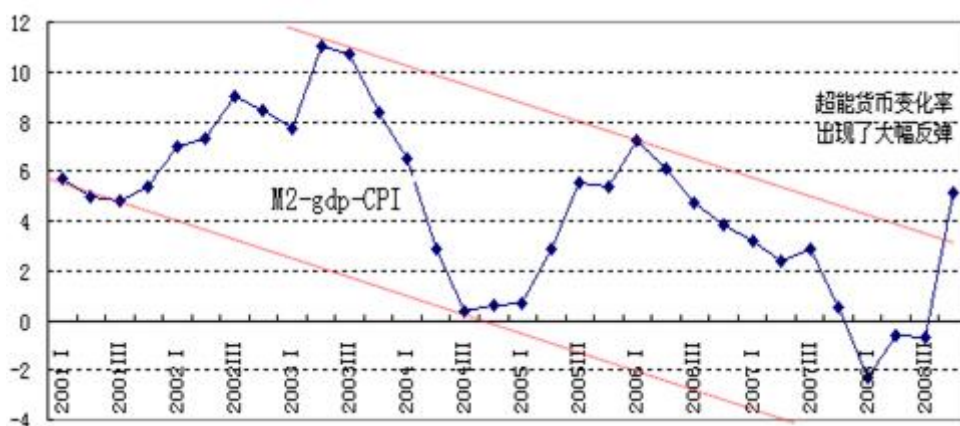
虽然央行并未继续动用利率这一工具,但却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数据显示,在2008年第4季度我国信贷扩张的基础上,2009年1月份,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9.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79%,增幅比上年末高0.97个百分点;1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1.99万亿元,同比增长21.33%,增幅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8141亿元。而高华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各种信息显示,我国2月份新增贷款可能在人民币5,000亿元至1万亿元之间,这意味着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为22.0%-24.0%之间。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信贷增速在2009年前两个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信贷大幅扩张的同时,我国超额货币供给(即 $EM=M2-gdp-CPI$ )也呈现了大幅反弹,如图6所示。





图6 2008年第四季度超额货币变化率出现大幅反弹



数据来源：国研数据

我们认为，2008年第4季度及2009年前两个月货币政策过于放松，这一急速的信贷增长不应持续下去。因为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依然存在经济过热及通胀隐忧。

央行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我国近期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通货紧缩风险较大，但当前不少经济体及其央行的大规模注资和金融救援计划，都会导致货币增发和财政赤字增长，从中长期看有可能转化为通货膨胀压力，央行对此也要给予关注。

另外，从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存在滞后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周丽琦（2006）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政策相对国内生产总值要滞后4期，其影响显著。考虑到美国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之后实现经济止跌企稳，并在2010年第一季度有望复苏，届时，配合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滞后效应的影响，极有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美国在第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状况，并结合我国的出口形势，而相机抉择，适度进行信贷供给，控制好信贷规模，避免信贷在2009年的大幅扩张，为2010年或之后的经济过热乃至过高的通货膨胀提供温床。

##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目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仍在进一步发展、蔓延，对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影响仍在持续，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近期，美国就通过了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Buy American”条款，虽然美国等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在危机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经济调整，完成结构转型，也许中国将因此走在经济复苏的前列。

### 一、美国实施贸易保护的经济背景

1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购买美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条款跃然纸上，虽然带有“购买美国货”条款的经济刺激方案在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的版本上有所软化，但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在世界贸易中重新抬头的担忧已在各国蔓延。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学者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政府支出（或减税）对国民收入和就业有明显的乘数刺激作用，只要提高乘数，美国的财政扩张政策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即凯恩斯乘数： $\Delta Y / \Delta G = 1 / (1 - c(1 - t) + m)$ ，用经济学语言解释就是政府支出或减税（ $\Delta G$ ）对国民收入变化（ $\Delta Y$ ）可以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乘数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外生变量：即边际消费倾向（ $c$ ），所得税税率（ $t$ ）和边际进





口倾向(m)。因此,罗德里克提出,只要将边际进口倾向降到零,则政府支出乘数将实现大幅提升,而降低边际进口倾向的最便捷途径就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在目前情境下,罗德里克重提凯恩斯乘数,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美国目前正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实体经济迅速萎缩,贸易赤字居高不下,失业率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学者提议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把财政扩张产生的需求留在国内,从而达到降低贸易逆差与提高美国本土就业人数的目的。虽然美国国会通过的“买美国货的条款”遭到国际人士的反对,但这并不等于说,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就没有市场,中国需要积极关注,做好应对因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不利影响的准备。

## 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令中国进出口形势不明朗

### 1. 09年1月中国进出口双双大幅下滑

在去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09年1月份我国商品进出口总值继续双双下跌。1月份进出口总值为141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29.0%。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了43.1%。

图1: 2000年1月-2009年1月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情况 单位: %



资料来源: 国研网国研数据

从经营主体看,1月份国有企业进出口下降幅度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而升至首位。国有企业进出口总值316.5亿美元,同比下降34.8%。占我国外贸半壁江山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40.5亿美元,下降32.3%。而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似乎更强一些,他们的进出口总值为361.0亿美元,仅下降13.8%。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25.5%,比去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

### 2. 对主要出口国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出现大幅下降

表1: 09年1月中国出口主要国别(地区)总值及同比增长情况 单位: 亿美元, %

| 出口最终目的国(地) | 当月 | 1至当月累计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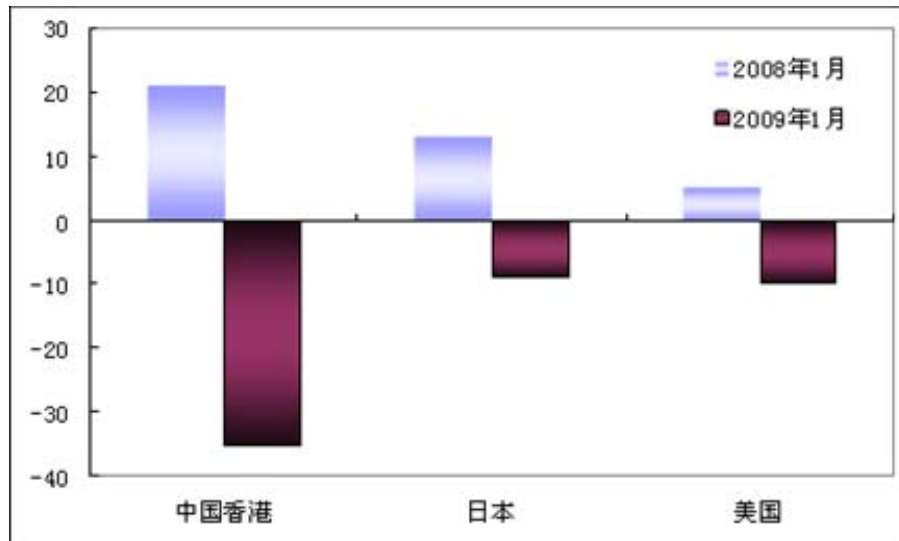


|     | 金额    | 同比    | 金额    | 同比    |
|-----|-------|-------|-------|-------|
| 总值  | 904.5 | -17.5 | 904.5 | -17.5 |
| 美国  | 172.9 | -9.8  | 172.9 | -9.8  |
| 香港  | 95.3  | -35.4 | 95.3  | -35.4 |
| 日本  | 82.3  | -9    | 82.3  | -9    |
| 德国  | 43.6  | -10.6 | 43.6  | -10.6 |
| 韩国  | 37.3  | -29.1 | 37.3  | -29.1 |
| 荷兰  | 27.5  | -27.7 | 27.5  | -27.7 |
| 英国  | 24.4  | -16.4 | 24.4  | -16.4 |
| 新加坡 | 21.8  | -10.4 | 21.8  | -10.4 |
| 印度  | 20.6  | -17.4 | 20.6  | -17.4 |
| 意大利 | 19.4  | -10.3 | 19.4  | -10.3 |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国别市场情况看，与08年11和12两个月双边贸易有增有降不同，09年1月份我国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对一些新兴经济体进出口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对发达国家。美国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也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中最早开始减速和下降的国家。

图2：09年1月与08年1月中国出口香港、日本和美国同比单位：%



资料来源：国研网国研数据

### 3. 美国贸易政策潜在影响或在09年开始显现

数据显示，对美国出口长期以来占我国总出口的1/5左右，因此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经济衰退一般会造成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迅速减少。历史上看，在美国同样出现经济衰退的2001年，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了2.9个百分点，自我国的进口增长却大幅下降了20个百分点；在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自我国的进口增长却下降了6.5个百分点，显示出美国经济景气与中







国进口有较强的相关性。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与国内政策调整和环境变化产生“叠加效应”后,中国出口未来增长前景令人担忧。另外,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

### 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美国并非最理想选择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看来,一国贸易盈余必然以另一国的贸易赤字为代价,在短期之内采取进口保护(Import Protection)和货币贬值的政策,对于就业和增长而言可能是有效的,对于急需提振内需的贸易逆差美国来讲尤为如此。但实际上,客观分析就会发现,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与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等多种复杂因素相关。美国自身的出口管制政策就是造成美国出口萎靡不振的首要原因。

#### 1. 美国自身经济政策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借口,对许多贸易伙伴国进行出口管制。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长,但美国在对华贸易中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始终不见松动。在2006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新的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清单中包括了20个大类、31个条款的高技术产品,如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水下摄像机及推进系统、先进复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器材等。新的清单在原有清单上增加了先进雷达、高性能计算机和可升级反坦克武器、贫铀等新出口管制项目。根据我国商务部的数据,200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8.3%,而这一比例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9.1%。6年间,美国总共因对华出口管制至少损失了700亿美元的出口,而且之后每年的出口损失都将达到数百亿美元。高技术产品作为美国最具全球竞争优势的产品,美国对其出口进行严格管制,必然会加重其贸易逆差。

产品制造基地的转移实际上虚增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由于美国国内的原材料成本和工资成本高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就一直在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转移,最近几年就连软件开发基地也在向印度等地转移。按照当前国际贸易统计的“原产地原则”,进出口统计以产地为准,因此美国的“进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产品,从而虚增了美国的进口规模,而原先由美国本土总公司的出口则由其海外子公司直接供应,不进入美国的出口统计。由此可见,“原产地原则”隐瞒了美国的出口而虚夸了美国的进口,无形中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另外,美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美国作为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制造业曾经是其最大且最具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工业制成品也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然而,现在的美国已经是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在美国产业中的份额在大幅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如服装、鞋帽、玩具等在美国国内已经基本停止生产,这意味这类消费必须依赖进口。从美国进出口的结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服务业和农产品贸易都是顺差,逆差几乎全部来源于工业制成品贸易,由此可见,美国相当大一部分贸易逆差是由其特定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

#### 2. 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从美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新任政府给出了总额8千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寄希望于此举补偿因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衰退所造成的财富损失,从而使美国经济能够保持在原来的水平运行。但从美国国会预算办





公室发布的数据看,即使没有 8 千亿的刺激计划,美国 2009 财年赤字将达 1.2 万亿美元,占 2008 年 GDP 的 8.4%,如果按照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将在今年增加赤字 1600-2000 亿美元计算,赤字占 GDP (2008 年数据)的比例将升至 9.6%或 10%,而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 2010 年,仅经济刺激计划形成的新的赤字就将突破 3500-4400 亿美元,要弥补巨额赤字,只有两种办法,加税和发债。虽然从长期看,加税可能是美国政府绕不过去的选择,但就近期而言,加税与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相抵触,美国参众两院经济刺激法案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对居民和企业的减税计划,因此,美国近期选择加税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选择发债,则美国政府需要其它贸易盈余国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一旦这些贸易盈余国因为贸易形势逆转,不具备条件再继续购买美元债券,则美国借助贸易盈余国储蓄支持本国消费的模式将失去支撑。

从长远来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美国而言并非只赚不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卡恩指出,在全球化程度如此之深的今天,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地用内需完全替代外需,这么做很可能引起贸易战,并拖慢全球经济恢复步伐。

#### 四、小结

从全球角度看,防止和遏止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方式主要有两条:第一,加强协调。通过协同行动克服危机,倡导通过加强合作和磋商解决国际贸易中的问题,主要贸易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更需要发挥切实作用,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领域做些实事。第二,依托多边。多边贸易体制担负着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虽然存在着缺陷,但 WTO 原则与规则防范了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公平及可预见性。在当前形势下,加强 WTO 的规则和纪律,进行更加公平与开放的贸易,是应对金融危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如果有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就应该通过 WTO 的规则来约束其曾经做出的承诺。WTO 总干事拉米最近也表示,WTO 将加强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监督和审议。

作为世界第二出口大国和贸易顺差大国,中国坚决维护自由贸易和投资,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可能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面前,一方面,应密切关注国际贸易保护措施的最新动向及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应抓紧时间,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因为即使不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为了全球经济平衡,美国居民也将不得不更多地储蓄,这必将导致美国需求的减少,对于依赖于出口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而言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表 2: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生产总值贡献程度与拉动作用单位: %

|                      | 2003 年 | 2004 年 | 2005 年 | 2006 年 | 2007 年 |
|----------------------|--------|--------|--------|--------|--------|
| 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 (%) | 35.3   | 38.7   | 38.2   | 39.2   | 39.4   |
| 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 (%) | 63.7   | 55.3   | 37.7   | 41.3   | 40.9   |
| 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拉动率 (%) | 3.5    | 3.9    | 4      | 4.3    | 4.7    |
| 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            | 6.4    | 5.6    | 3.9    | 4.6    | 4.9    |





|                        |     |     |      |      |      |
|------------------------|-----|-----|------|------|------|
| 生产总值拉动率 (%)            |     |     |      |      |      |
|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生产总值贡献率 (%) | 1   | 6   | 24.1 | 19.5 | 19.7 |
|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生产总值拉动率 (%) | 0.1 | 0.6 | 2.5  | 2.2  | 2.3  |

资料来源：国研网国研数据

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经济拉动作用有所下降，因此，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关税等外贸政策调整都只能作为当前形势下的权宜之计，而不能长期延续对低成本出口的路径依赖。08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明显慢于出口数量同比增长，由此可见，次贷危机发生后，随着美元大幅贬值，使得美国国民财富收缩，增加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减少了对高档次的耐用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使得中国对美在价值较低的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出口数量增长较快，但出口金额并未跟随出现快速上涨。

表3：08年1-4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数量与金额同比增长对比 单位：%

|          | 出口数量同比增长 | 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
|----------|----------|----------|
| 2008年1季度 | 430.51%  | 5.38%    |
| 2008年2季度 | 1.99%    | 12.01%   |
| 2008年3季度 | 9.90%    | 15.26%   |
| 2008年4季度 | 29.99%   | 0.73%    |

资料来源：国研网国研数据

中国对美出口数量的增长大大高于出口金额的增长，间接折射出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中低端的加工业为主，在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而打破原有均衡之时，谁主动调整，谁就有可能率先稳定并实现增长。在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中，目前看仍以量为主，着重以投资增长拉动内需，由于投资拉动的产业链较短，而且以国家主导的面向中上游行业的投资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结构调整的投资增长，是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延续，难以推动中间产业和终端消费，即使未来两年大规模投资能够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没有最终需求增长的配合，新增产能的消化会因缺乏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支持而再度下滑，最终仍有赖于外部经济的回暖，中国经济复苏的高度将受到限制。

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对中国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考验，粗放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危机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次经济转型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将此次危机和衰退看成是结构性调整而非简单的周期性调整，中国将有望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新平衡各种关系，从而变被动为主动，率先走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前列。



*SIF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 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9 年 3 月

第 1 期 [总第二十九期]

- “第二波金融危机”离我们多远
- 全球金融海啸隐显三个大“底”
- 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契机
- 赵启正：中国没有金融危机 不要陷入认识误区
-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专访索罗斯
-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几何图形的观点
- 中国：这么多美元怎么办？

## 金融海啸

## “第二波金融危机”离我们多远

作者：朱周良

作为对市场再度剧烈波动的反应，近期有关“第二波金融危机”可能爆发的惊呼频频见诸报端。对此专家分析说，当前的市场波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银行业不良资产等根深蒂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至于是否已经或者即将出现“第二波危机”，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 是否存在第二波危机

事实上，早在前期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经济形势恶化时，人称“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著名教授鲁比尼就警告说，部分东欧新兴经济体正在酝酿新的金融“灾难”，并称新兴欧洲将出现全面金融危机，就像十年前的东亚和拉美那样。

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日前表示，除非政府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否则全球经济将面临“第二波”危机。该公司驻东京的亚太区研究主管 Ozeki 在一份最新报告中写道：

“当前经济的下滑仍处在初步阶段。一旦房价跌势继续持续，将可能加速经济的下行，进一步强化风险的恶性循环，甚至可能在未来 6 到 12 个月中引爆第二波金融危机。”

金融家索罗斯上周末表示，全球金融体系事实上已经“解体”，他认为，危机看来还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索罗斯称，金融市场目前的动荡较大萧条时期还要严重，“现在还没有任何接近触底的信号”。

但也有人指出，目前的形势还够不上“第二波

危机”，而只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从股市来看，尽管近期股市再创新低，但恐慌的情绪并不及去年雷曼破产之后的情况。衡量美股短期风险预期的 VIX 波动指数上周五升至 52，不过仍远远低于去年 11 月份股市跌至谷底时逾 80 的高位。上周五，纽交所创出年内新低的股票数激增至 555 只，不过仍远低于去年 10 月份近 1700 只的纪录高位。有分析认为，这说明投资者在抛售股票时更有选择性。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昨天对记者说，当前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有什么新的危机出现，而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决，比如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比如新兴经济体的危机。他表示，“有毒资产”一直在不断侵蚀银行的机体和资产负债表，而近期东欧经济的恶化只是进一步打击了人气。

### 让银行放贷是个“坎”

经济学家表示，眼下这波危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银行业，尤其是困扰西方银行多时的不良资产难题，后者也直接影响到了银行对企业 and 个人的放贷，进而令政府的经济振兴措施效果打折。

“很多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但是政府在解决这些难题上举步维艰，客观上造成了银行依然不愿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从而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银行业再次出现巨大亏损。”陶冬说。

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对银行进行全面国有化的观







点, 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诺奖得主克鲁格曼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昨日就有消息称, 美国政府目前正在与花旗集团进行谈判, 可能将持有的花旗普通股比例提高到 40%。

不过, 陶冬认为, 在现阶段, 各界对于如何彻底解决银行坏账问题仍没有较为统一的清晰答案。“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一再拖下去。”陶冬说, 一定会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每一次新的市场的动荡, 都会影响银行、影响贷款发放和就业。”

从很多已经实施大规模金融救援的国家的情况看, 各家受援银行并未大幅提高放贷。美国财政部日前的调查报告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接受政府援助的美国 20 家大银行甚至缩减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投放。报告显示, 上述 20 家银行去年第四季度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平均下降 1%。美联储的一份季度调查报告也显示, 美国政府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未能明显缓解银行惜贷问题。报告说, 六成银行表示在去年第四季度提高了在信用卡及其他消费信贷方面的放贷标准。

德国商报周一报道说, 德国经济部正在考虑设立一家“产业银行”, 以应对企业流动性短缺的问题。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斯万周一则表示, 正在与银行业商讨发放信贷资金的问题, 虽然澳大利亚近期多次下调官方利率并通过为银行存款和大笔定期贷款提供政府担保等措施来支持国内银行业, 但一些小企业目前仍急需贷款。

**新兴经济体“火药桶”要爆**

需要注意的是, 近期更多新兴经济体出现危机大爆发的苗头, 尤以东欧为代表,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白俄罗斯等不少国家都面临货币贬值、外资大量撤离以及经济大幅滑坡的艰难局面。

本报近日对一些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就发现, 业界普遍认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逆境下, 一些外债负担较大、较多依赖外来资本或是倚重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 正日益凸显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风险。随着债务融资难度增大和西方银行大举撤资, 部分国家如俄罗斯等甚至有可能重演十年前的金融危机, 出现“又一个冰岛”并非不可能。

在上周末的会议上, 欧洲领导人极力呼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扩充一倍至 5000 亿美元, 而首要的考虑就是去救助那些已是捉襟见肘的欧洲国家。欧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正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已因此出现政治动荡, 如拉脱维亚政府就被迫在上周五辞职, 从而成为继冰岛和比利时后欧洲第三个因经济危机而下台的政府。

陶冬表示, 当前全球仍处在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中, 鉴于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 现阶段要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走向作出明确判断很难。不过, 他表示, 之前业界普遍认为世界经济今年年底有望启动复苏, 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消失。

来源: 上海证券报, 2009 年 02 月 24 日

## 全球金融海啸隐显三个大“底”

作者: 左晓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大“底”是, 完全清理与次贷相关的证券产品之日, 就是金融市场稳定之时, 第二大“底”是, 房地产市场调整到位, 第三大“底”是, 国有化成为拯救金融体系的底牌。在这次危机中, 金融体系几近全面瘫痪, 市场机制完全失灵, 市场体系不可能拯救危机, 政府不得不充当金融危机最后救助者, 成为最后拯救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

这场让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风云变色的金融危机的底究竟在哪里? 如何才能走出危机? 笔者认为, 近期以花旗银行带领美国和欧洲银行股的反

弹, 隐隐揭示了金融危机的三个大“底”, 20 国峰会和各国政府应该揭“底”, 并采取断然措施, 一次性“兜底”, 彻“底”解决问题。

第一大“底”是, 必须尽快彻底清除金融机构的全部“毒垃圾”

——次贷以及次贷衍生证券。

虚拟经济的膨胀已经使金融机构账面资产有相当规模是所谓管理的“证券资产”, 大部分是次贷衍生证券。除了美国政府和美联储, 眼下几乎没有投资人会接手这些“垃圾级别”的资产。如果没有市





场, 这些“证券资产”的“价值”应该等于零。金融机构已实质性破产。雷曼公司破产前的资产负债表是“资产”6300 多亿美元。“负债”6100 多亿。从账面上看并没有资不抵债, 可实际上所谓“资产”其实已不是“资产”了。雷曼在破产之前, 就已资不抵债!

规模巨大的“毒垃圾”, 像定时炸弹一样, 遍布全球金融市场之中: 先在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场外交易市场, 近来蔓延到汽车消费市场、信用卡市场上, 不断在不同的时点爆炸。为“毒垃圾”保险的保险公司正在遍布定时炸弹的战场上“垂死挣扎”; 全球金融市场因此胆战心惊地等待一次一次“定时炸弹”。

也正是清除“毒垃圾”, 总算让花旗银行逃过一劫。花旗银行稍早作出重大决定, 出售其经纪部门。实际上是把到期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次性清除, 彻底割掉一个毒瘤, 防止了癌细胞蔓延。相信这是花旗银行 1、2 月盈利的秘诀之一。

这些, 应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了金融危机的这一个“底”, 完全清理与次贷相关的证券产品之日, 就是金融市场稳定之时。

第二大“底”是, 必须稳定房地产市场。稍早时候, 因为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可能被国有化, 引起对第二波金融海啸的恐惧。花旗的麻烦出在次优房屋抵押贷款上。随着房价不断下跌, 最大的房屋抵押贷款银行花旗再次面对大面积的“坏账”危机; 收购了最大抵押贷款投行美林的美国银行也遭受了“无妄之灾”。

次优抵押贷款大约 1.3 万亿, 估计大约一半会出问题。花旗银行近期的盈利, 并不说明全部抵押贷款的问题已解决。如果房地产市场稳定不下来, 花旗和美国银行的资产会继续恶化, 房屋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可能继续提高, 甚至向优质贷款蔓延。所以, 房地产市场调整到位, 应该是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底部指标。

第三大“底”是, 国有化成为拯救金融体系的底牌。

最近由于 AIG 第四次向政府求助, 汇丰银行大幅亏损, 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大幅震荡。但是这次普遍没有了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性事件的第一波金融海啸时那样惊心动魄的感觉。因为大家非常清楚, 奥巴马政府绝不会让雷曼破产清算的事件

重演。政府成为稳定市场的定海神针。

曾经有强烈的批评声音, 认为各国政府不该救助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不能自我调整, 就应该破产倒闭。事实上, 雷曼公司也曾试图出售 400 亿“资产”, 但是最终失败。除了整体市场存在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以外, 被出售的“资产”本身已是烫手山芋, 有谁敢接?

那些与雷曼公司同类的、已转为银行控股的公司, 并不是他们自己救了自己。由于美联储不断允许用这些毫无价值的“证券资产”抵押, 获得央行的流动性支持应对赎回, 也获取了央行对未到期证券资产的担保, 暂时保持了账面价值。否则, 若以雷曼资产负债表破产前后的演变观之, 这些公司早已资不抵债, 实质性破产了。

但是, 对于那些为这些名存实亡的“证券资产”保险的机构而言, 那些暂时保持了面值的“毒垃圾”, 就成了到期必须面对巨额的赔付的定时炸弹。危机只不过被转嫁了而已。

白宫去年 9 月紧急救助 AIG, 缓解 AIG 赔付危机, 寄望 AIG 出售旗下资产来筹措偿付资金。但是 AIG 的出售计划频频受挫。除了核心的传统保险业资产以外, 任何与证券资产相关的部分, 都无法找到买家。AIG 最近公布 2008 年第四季度财报称, 该季共亏损 617 亿美元, 相信是其为证券资产担保的巨额赔付中的一部分。虽然政府已三次注资救助, AIG 仍不可能自我走出次贷衍生品保险的泥潭。到了赔付期限, 不论伯南克多么愤怒, 政府还是不得不第四次出手救助, 而且必须一轮一轮没完没了地救助。否则, 这个“Too big to fail”的庞然大物, 就会成为一个引发一轮又一轮的危机的火药桶。

笔者认为, 这次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危机, 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的经济周期调整导致的危机。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市场自身进行存货调整, 产品升级换代, 增加有效需求, 完成经济周期的转换的方式走出危机。在这次危机中, 金融体系几近全面瘫痪, 市场机制完全失灵, 市场体系不可能拯救危机。

表面看来, 第一波金融海啸, 投资银行全线崩溃。拯救方式有两种, 第一由商业银行收购危机的投资银行。比如贝尔斯登被 JP 摩根收购。第二, 改头换面变身商业银行。比如, 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摇身一变, 成为银行控股公司。从形式上看, 这两种





方式都保留了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股权结构, 似乎是市场化的拯救方式。

实际上, 市场非常明白,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经从债务担保, 直接和间接注资, 不断启动最后贷款人职能, 等等方式, 全力支持收购方和被收购方。投行变身商业银行, 也是为了可以直接得到美联储的资金救助, 免除破产和被收购的命运。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 市场不可能完成这些转变, 而且马上就会发生全球金融市场的大乱。

现在连花旗、美国银行等等商业银行也气息奄奄了。比投资银行更不幸, 它们连被收购的退路都

没有。所以哪怕花旗股价降到退市边缘, 也没有私人资本敢于铤而走险, 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百年不遇的危机冲破了所有底线, 市场修复能力彻底被摧毁, 政府不得不充当金融危机最后救助者, 成为最后拯救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如果政府不出手, 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彻底崩溃。国有化因此成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来源: 上海证券报, 2009 年 03 月 17 日

## 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契机

作者: 保罗·基廷(Paul Keating, 澳大利亚前总理, 现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全球金融信心一旦遭到破坏, 就需要有无数的正面事件大量集中发生, 才能抵御周围的悲观与沮丧情绪。

最近各国政府祭出的一系列经济救援计划, 虽然规模庞大、行动迅速, 但是对于信心水平和现行经济活动的前景并没有多少显而易见的影响。事实上, 随着多数国家不再有能力应对日益增长的破产负担或是进一步承担私营部门的风险, 新的大规模救援计划可能会逐渐减少。这种背景凸显出, 在伦敦的会议上, 由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20 国集团(G20)亟需打造一种新的范式, 使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恢复活力。

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安排。第一要务应该是让 G20 会议成为固定的集会。各国领导人应该每年至少集会一次, 而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集会两次。G20 代表了世界主要的债务国和债权国, 以及最具战略影响力的国家。固定的 G20 框架将敲响七国集团(G7)的丧钟。这已经晚了 20 年, 但迟做总比不做好。

第二项要务应该是由 G20 (成员国国家领导人、财政部长和央行官员) 负责协调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 而不是由已经在这个任务上遭遇惨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第三项要务应该是, 大刀阔斧地改造 IMF, 解散其委员会, 代之以一种真正能够代表该组织宣称为其服务的更多国家的治理结构。IMF 应继续管理其国际收支应急工具, 但是要在 G20 的全面监督下

进行。

美国政府可能会抵制这种变革, 而 G7 中的欧洲国家会尽其所能坚持采用战后的旧框架。不过, 在冷战结束、中国开始崛起成为今天这样的大国之后, 那种安排的效用就开始逐渐减弱。

政府通过承担预算赤字和对银行实施资本重组来刺激经济的方式, 只能暂时延缓这场危机。财政政策有其局限性。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经在预测, 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 1.7 万亿美元, 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3%。他还告诉美国公众要做好准备, 上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可能会持续数年。

在短期内, 世界需要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但长期来看, 前车之鉴证明, 只有在赤字国家增加储蓄缩减开支, 而盈余国家减少储蓄增加开支时, 危机才能得到解决。当债权大国被排斥在国际机构的核心集团之外时, 这种储蓄的不平衡不会得到纠正。如果听之任之, 它们会重新采取防御性策略。如果在诚信的基础上接纳它们, 它们或许会觉得改变一些习惯也无妨。

例如, 中国政府在安排其盈余时, 并不打算让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来改变国家资源的方向, 特别是在这种行为有可能让它落入 IMF 之手的时候。1997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亚洲所有政府都对资本外流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心——印尼总统苏哈托(Suharto)就在 1998 年被迫下台。

在国际货币治理实现民主化, 或者至少更具代







表性之前,任何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不是债权国——都不会把脑袋伸进 IMF 连同美国财政部设下的套索。

不过,要构筑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 G20 框架,美国必须首先回答两个战略问题。中国是需要在战略上保持警惕的商业竞争者,还是建设多面新世界的结构单元?俄罗斯是应该成为更具代表性的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应该继续被视为无药可救的不可信赖者?

以积极的态度解决上述问题,并改革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就能够开创一种更加可

行的世界格局。问题是,奥巴马是否会在即将召开的 G20 会议上意识到这个契机,以及老顾问的建议是否会让他和美国其他人继续陷在当前经济和策略的窠臼里。

迅速大规模接纳发展中国家是让世界面貌一新的唯一出路。这种局面的出现,将对信心产生深远的影响——胜过迄今出台的所有刺激方案。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03-09

## 赵启正:中国没有金融危机 不要陷入认识误区

——专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

作者:董少鹏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十一届二次全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一谈金融危机就以为“也包括中国在内”的说法和认识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澄清。

赵启正认真解释说,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只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冲击。中国克服金融危机既有经济优势也有政治优势,这正是外界羡慕的地方。

### 认识国际金融危机 抓住两个“关键点”

赵启正表示,目前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一些人和一些媒体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中国在内”,这是一个误区。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主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是受外面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受到冲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的银行没有破产的情况,也没有宣布要让国家给予投资支持的情况。中国的银行坏账率很低,都在 3% 以下。去年中国银行业的收益明显增长,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的,这也是中国多年来推进金融系统改革的成果。

第二个关键点是“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信心更重要”。信心来自哪里?就在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态势:其一,我们的金融系统是健康的;其二,国内潜在的市场很大。我们的出口遇到困难,使一些产品积压甚至是停产了。那么这些销售要转

到国内,国内有这样的市场潜力。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相信政府,相信国有银行体系。

现在没有人说外国有了危机,我们中国也有危机,我们去取款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是强有力的,人民的信心是强有力的。这些社会制度优势和文化传统优势看着是虚的,但是起的作用是实的,也是外国人羡慕的地方。

### 2009 年 GDP 增长 8% 不算高

谈到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看法时,赵启正说,中国去年第四季度出口和 GDP 都有明显下降,又有些中小企业支撑不下去,这样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去年 GDP 最后的数据大约是 9% 的增长,和前几年比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最后几个月的下降引起的。

赵启正说,中央做了很仔细的分析,提出要争取 8% 左右的增长。有人预计美国 2009 年的 GDP 增长是 0.5% 到 1.3%,中国 8% 左右的增长对自己说是较低的,但在世界上就很了不起。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买外国的产品,与相关国家在经济上有更大的协同。

### 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国家容易乱”的说法不科学

赵启正指出,我们在学习借鉴外国人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时,需要小心。前几年有一个说法,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的时候,这







个国家就容易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中国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的时候,也就得小心。

但是,这个说法究竟来自何处?是哪个人说的?经过一番查找,最终没有结果。

赵启正认为,这句话是在哪个国家、哪一年说的,很重要。如果 20 年前说的,那个时候美元的价值和今天的已经不同;如果是在某个国家说的,那

个国家的 1 美元和在中国的 1 美元价值也不同。各国美元价格的平均价比都不一样,那你为什么有这么个说法呢。因此,这个说法比较武断,不是外国人说了我们就认为是对的。

来源: 证券日报, 2009 年 03 月 04 日

## 专家观点

##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专访索罗斯

作者: 叶伟强(《财经》驻纽约记者)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2008 年下半年开始深化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仍不断地突破人们的预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发展演变,以至于传统主流经济理论哑然,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亦遭受挑战。

拉响警笛者并非没有,甚至数年前开始做空的人也并非寥寥——在众人仍对次贷危机不以为意的时候,就已有对大危机的预警——只是都在当年那热得发烫的气场中被轻易地蒸发掉了。

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 2005 年就开始高呼“狼来了”。刻薄的人们嘲笑道,“一只坏了的钟,一天也有两次是准的”。索罗斯固然有过“狙击”英镑、墨西哥比索和泰铢的辉煌,但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沉痛铩羽。只不过,这一次他又赢了。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判断。

2008 年 1 月 23 日,索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60 年来最糟的市场危机”,称“当前的(次贷)危机标志了,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进行的信贷扩张,走到了终点……这次危机,是一场超级繁荣经历过 60 多年以后的盛极而衰”。

79 岁的索罗斯,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而他的公众形象,则颇为复杂。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美国《华尔街日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更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

——与投资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许稍低。他创立或参与创立

的数家基金会,近 20 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民社会成长。

——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不无巧合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他的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政府政策中。

2008 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9 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政府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10 月初,美国国会仍在为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10 月下旬,《财经》专访索罗斯时,保尔森已经一改初衷转而采取注资的方式。

此后,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10 月 28 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 3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今年 1 月,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索罗斯或许只是众多为政府建言的人之一,但这位“中标率”颇高的建言者,其见解或许值得一听再听。2009 年 3 月 11 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财经》记者再访索罗斯。

采访在纽约曼哈顿区七大道 888 号 32 层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进行。索罗斯一袭黑西服,雪白的衬衫和齐整的领带,标准的华尔街装束。采访过程中,他不断把玩记者的名片——在这位叱咤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架子,感觉不到压力,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犀利。

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头发尽染银霜，眼角爬满皱纹，却难掩其蓝灰色眼睛顾盼之间的熠熠神采，以及偶尔的微笑中流露的天真和狡黠。

“我笑不出来，因为现在形势很严峻。”拍照时，索罗斯说。

### “超级大泡沫”

**《财经》：你曾经多次成功地预见金融危机并从中获益。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罗斯：我自己发展的一套理论，或称一种哲学，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同一般的。可能是这种观点，使我能够在泡沫生成的时候就把它们辨别出来。

通行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所有的可得信息，我的理论却不是这样。其中包含两个假说，其一，市场总是扭曲可得信息。因为市场是投资于未来的，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市场总会有一些偏见，产生与现实不符的扭曲。其二，金融产品的错误定价，总能影响或改变那些价格本来应该反映的基本面。

市场和基本现实之间这种双向的联系，意味着市场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同时也主动地“影响”现实。我称之为“反射性原理”（principle of reflexivity）。泡沫的产生，首先要有一种主导了现实的趋势，然后要有对这种趋势的错误概念，而这两者之间反射性地相互加强的结果，就会导致泡沫，泡沫变得不可持续就终将破裂。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形式。

**《财经》：具体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呢？**

索罗斯：这场危机恰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谬误。我认为，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但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温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这次危机不同于 80 年代以来的那几次；那几次只不过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而这又强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能够自我纠正”这一错误概念。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干预纠正的，不是市场自我纠正。

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其实就是“市场危机-政府拯救-再危机-再拯救”的过程；市场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对许多问题听之任之。在这套游戏规则下，许多小泡沫累积、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政府再也

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施以援手了，危机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金融泡沫从此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 “新旧”银行

**《财经》：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罗斯：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za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政府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财经》：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索罗斯：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财经》：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技术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并使可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

索罗斯：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





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目前政府正在检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即所谓“压力测试”，这会持续到 4 月底。然后就得决定，对每家银行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财经》：你说的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成立一个“新银行”和一个“旧银行”。也有许多人建议成立专门的“债务银行”，持有从金融机构中剥离出的“有毒”资产，你对此怎么看？**

索罗斯：1994 年用过这种方法，但用于今天的情形效果不会好。当年的存贷款危机之后，人们设立了一家独立的“坏银行”，处置了所有的不良资产。当时行得通，是因为资产数额相对较小。但现在问题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现有这些银行是旧业务的最佳接管人，它们明白做什么、怎么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给“有毒”资产估值的难题。如果拆分出“坏银行”并把资产拿来拍卖，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这些资产存在银行里，用银行的资本、股权、次级债务来覆盖这些资产，就可以慢慢等，让这些资产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资产有可能还会恢复一部分价值，特别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所说的“旧银行”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一个实体，它只是一种清算资产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银行业务。把有贬值压力的资产都“另装一个口袋”，以免它们对其他业务产生严重影响。“旧银行”针对的是过去的业务，所有的新业务都由那个“新银行”来处理。“新银行”，“旧银行”，其实是一个整体；“旧银行”完成使命的时候，也就成了“新银行”。

**《财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以便进一步推进。你认为呢？**

索罗斯：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政府的影响。在所谓的“国有”期间，政府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财经》：就是说，政府要尽早退出？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索罗斯：对。政府要准备尽早退出。政府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现在必须用政府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在第一阶段，他们还没有成功。

**《财经》：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索罗斯：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至美国。美国政府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它们的很多银行实际上都是欧美跨国银行的子公司，这些银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资金。这些国家面临着贷款即将到期的现实，却不能融得资金来偿还；它们的危机还要继续恶化。我们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美国和中国现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协力合作。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财经》：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索罗斯：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你不能







指望出口增长, 因为外需不再, 只能刺激内需, 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 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 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 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 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 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要走出这场危机, 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财经》: 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索罗斯: 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光刺激 GDP 增长, 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 但建筑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 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乡村, 还是扩展新城市? 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 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认为, 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 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 所以我今年 6 月要去中国。那时, 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财经》: 那么, 欧美经济呢? 2010 年能够恢复吗?**

索罗斯: 恢复不到过去。现在的调整, 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 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对于美国来说,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 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都需要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 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所有国家都应该出一把力, 因为如果全球化破裂, 每个人都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但现在破裂的可能性很大。要维系它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 必须调整、更换那些坏掉的部分。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 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就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 但我们没有。现在的监管都还是国家层面的。所以, 必须增强现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 这是眼前要做的事。

来源: 《财经》杂志 2009 年第 6 期, 2009 年 03 月 16 日

##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作者: 李众敏

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出台了 4 万亿的巨额经济刺激方案, 对基础设施、医疗产业、十大重化制造行业等领域加强财政投资。尽管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仍然呈下滑趋势, 但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的信贷增长、PMI 指数已经出现了回暖趋势, 因此, 有经济学家指出, 这是经济复苏的迹象。我们要问的是: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一、刺激方案没有触及结构困境

目前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主要包括三大块: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去年 4 季度共安排 1000 亿, 今年年初安排了 1300 亿资金; 二是医疗投入, 计划在未来三年 (2009-2011) 共投入 8500 亿; 三是十大行业振兴计划, 目前已经知道的是钢铁、纺织两大行业将获得出口税收优惠, 汽车行业投入 150 亿。石化行业的振兴计划还没有公布, 据称计划投入 5000 亿, 包括 1000 亿提高汽车燃料质量, 4000 亿兴建 20 座石化厂。

回顾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我们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规模大, 上面列出的只是政府直接动用财政资金的部分, 受政府投资带动, 还有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 因此, 整体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二是投资领域非常集中, 集中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重化制造业, 这些领域的投资很多是公共投资的范畴。

但是, 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带有很强的结构性,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外需严重萎缩, 致使失业问题严重、中小企业破产迅速增加, 因此,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失业问题, 是中小企业的困境, 是外需形势突然逆转, 以及内需长期低迷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 目前的经济刺激方案还没有触及到这些方面, 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八”, 根据这一目标, 只要加大政府投资, 带动银行信贷,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重化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 在短期内是很可能实现增长目标的, 但是, 从长期







看, 结构性问题无一能够被解决, 甚至还没有被触及。

而且, 根据 2008 年的财政收支情况, 当年中央本级财政盈余占 GDP 的 6.4%, 中央财政仍然有盈余, 而地方财政赤字已经占到 GDP 的 6.8%, 比 2007 年上升 1 个百分点。如果目前的经济刺激方案不能够很好地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 许多地方财政将面临破产, 会影响到经济刺激方案的可持续性。

## 二、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基于以上的分析, 我们要做的判断是: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目前从信贷、PMI 指数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复苏迹象, 是暂时的逆转, 还是经济的触底表现? 我们认为, 这不是隧道的尽头, 经济复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认为, 由于政府投资拉动, 2009 年上半年, 尤其是第一季度, 中国经济将出现明显的好转, 但是, 因为结构性问题的困扰, 中国经济在短暂逆转后, 将出现更为严峻的困境。2009 年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倒“V”型波动。当然, 这只是实体经济的可能表现, 另一方面, 中国的证券市场可能出现泡沫。

2009 年新兴市场的表现非常值得关注, 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流向中国、印度的短期资本可能出现迅速增长: 一是美联储一再降息, 将会增加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套利”交易的规模; 二是新兴市场表现参差不齐,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出现资本外逃, 惠誉下调俄罗斯主权评级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外逃和外储降低; 三是受美国金融市场不况的影响, 很多对美国的投资将转向表现尚好的新兴市场国家。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 国际市场(尤其是日本)的短期资本可能会从美国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转向中国、印度。

根据中国资产价格的表现, 房地产经历了一个泡沫时期后, 由于受政策托市影响, 仍然没有能够及时出现调整, 价格依然居高不下, 而且在目前全球环境下, 投资房地产的风险空前增加。而证券市场则显然已有触底迹象, 因此, 流入的短期资本可能会集中流向中国的证券市场。

综上所述, 2009 年中国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倒“V”型调整, 而证券市场则出现显然不同的表现, 受此影响,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将空前增加, 政府不仅要解决就业、内外需等结构性问题, 还要面

临资产泡沫带来的风险管理任务。

## 三、应对危机要做长期准备

如果现在就对经济的前景表示乐观, 那一定是盲目的乐观。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我们认为, 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要有长期的打算:

1. 这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长期调整。与以往的危机有所不同, 这次危机有两大特点: 首先是危机在全球的传递非常快速与广泛, 其次, 这次危机起因于居民的消费行为, 也将导致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后者决定了这一次全球经济调整的长期性, 与以往在危机中减少支出不同的是, 这次危机不只是改变美国居民在危机中的支出行为, 也会提高居民的储蓄率, 是消费习惯的改变, 这种改变是长期的。从这一点看, 中国要对外需长期不足做好准备, 相信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贸易顺差,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外需可能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副引擎, 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副引擎。

2. 全力解决结构性困境。基于全球经济调整的长期性,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外需不足、中小企业破产、失业问题, 也将是长期的问题。要有效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不仅要加大投资, 还要全力解决结构性困境。解决结构性问题, 尤其是失业问题需要举全国之力, 多渠道采取措施, 才有可能:

(1) 对中小企业实施差别化的扶持。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 不可避免要出现较大规模的调整, 一些附加值低、技术创新不足、污染型的中小企业, 应当顺应经济发展需要, 适时淘汰。而对于一些技术含量高, 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 如新能源、环保产业等, 应当予以政策扶持, 助其渡过难关。

(2) 要加大县乡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西部的植树造林和环境治理、中部的农田水利建设。这类基础设施已经多年失修, 的确需要政府的投入, 长期以来也是呼声很高的, 应当借刺激经济的机会加大这方面的投资。而且, 越是基层的基础设施投资, 花钱越少、使用的劳动力越多, 对拉动就业的效果也越明显。

(3) 利用外汇储备扩大对外工程承包, 依托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的平台, 扩大中国对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工程承包, 在为外储获得更高利润的同时, 扩大中国的劳务输出和就业

(4) 改善县乡级的创业环境, 严格禁止各种对





从事副业的农民的有形和无形限制，对于在县乡级从事农副业、商业、食品加工业、修理等领域创业的农民工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在刺激经济、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过程中，要避免地方政府负债过高，甚至破产。1998 年以后，地方政府负债运行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许多地方通过发展房地产、依靠土地收入过了上十年较为阔绰的日子，现在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日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如果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致使地方政府负债过多，一是会影响刺激方案的可持续性，二是会影响刺激经济方案的效果。

3.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副引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投资和净出口，这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副引擎，而且净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拉动投资，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副引擎意义非同一般。现在外需出现问题之后，一是会影响外需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它也会影响投资的拉动作用。中国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同时，要努力寻找新的增长引擎，传统的投资引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要启动内需引擎，大国经济需要以稳定、充足的内需为基础，这也符合经济发展应首先满足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道义。

对于如何刺激内需，相关的讨论已经到了汗牛

充栋的程度，我们认为，刺激内需的关键是充分的竞争和完善的销售体系：

一是要在国内实施完善的、严格的市场准入法规，打破地区垄断，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这样，中国的企业才能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和价格，刺激需求。“诸侯经济”会限制企业和产业规模的提高，增加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无法降低，甚至可能形成地区垄断价格。包括一些所谓的“准公共产品部门”也要实施充分的竞争，医疗、教育等产业都可以尝试引入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扩大相关产业的竞争，竞争才是解决垄断的最有效办法，是降低垄断部门价格的最佳途径，而不是行政措施。

二是要建立完善的销售体系。这一点在中国的内需拓展和外需拓展上同样重要，在以前的供销社体系被打破后，这一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目前的商业销售体系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而且多被外资所控制。需要构建能够覆盖全国城乡的营销体系，这也是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关键步骤。全国统一市场包括生产领域（企业间）的充分竞争，以及覆盖全国城乡的销售体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日期：2009-2-12

##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几何图形的观点

作者：郑联盛

从美国房地产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都出台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期待经济不会陷入严重的衰退，或者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在众多不确定的条件下，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走势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点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各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各种各样途径都用来解释危机以及危机中的全球经济。这其中最为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几何图形来描述全球经济中主要经济体的走势，还指出了其中的关键转折点，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直观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各种几何图形的基本要素更是道出了各个经济体面临的重大风险问题。

### 美国：U 型走势

处在金融危机核心中的美国，其经济走势最令人关注。在小布什 8500 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救援下，奥巴马又敦促国会通过了 787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出台了金融稳定计划。在新的财政刺激计划中，35%用于减税，其他的是扩大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的投资。

市场认为，在短期内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创造不少的就业岗位，并防止经济严重恶化，同时金融稳定计划一定程度上将恢复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功能，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是，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中，金融资产损失得到明确确认之前，财政刺激计划和金融稳定计划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





无法立即显现。因此,很多学者和市场都预期,美国经济在政府史无前例的救援中将缓慢走向底部,并维持 1—2 年颓势,最终逐步复苏进而较快增长,即是 U 型走势。

对于 U 型走势,重要的阶段可能有四个,大幅下跌—缓慢下跌见底—缓慢增长—迅速复苏。美国经济大幅下挫的走势正是我们目前所见证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冲击从金融经济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渗透,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风险、就业率创 16 年来之新高等都是重要的表现。

在缓慢下跌阶段,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资产价格下跌的空间、金融机构损失得到确认和金融机构功能的“重生”。美国房地产价格还有多少下跌的空间决定了美国资产价格和相关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市场规模和价格高低,根据标准普尔 20 大城市的价格指数走势,美国住房价格可能还要下跌 5—10%。另外,金融机构的损失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为了加快这个进程,美国政府处置问题资产成为美国金融危机见底的关键要素。最后,金融机构的功能在金融危机中被破坏,其资金融通桥梁的作用严重弱化,而成为一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得到恢复是决定美国经济颓势长短的因素之一。

根据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经济增长点。铁路网、公路网,两次世界大战、马歇尔计划,汽车、房地产、信息产业等,是各个时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行业支撑。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无法完成 V 型反转,在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缺乏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新行业。为此,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至少要颓势 1—2 年,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点,那么更惨的事情就会发生, U 型增长也无法实现,只有 L 型走势等待美国了。

至于,哪个行业会成为美国经济再次腾飞的支撑点,各界观点不一。据报道,兰德公司提交了一个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救市的资金不如用于打一场战争来得有效,一方面战争不仅能够用于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促进就业,还能获得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资源和资金等。被学术界和政策界热议的两个行业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可能迎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把人类生活和美国经济带入到新的高度。而生物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人类人口结

构的影响,将提高生物、医疗和卫生等领域的重大发展,更重要的是可能改变美国的消费储蓄方式,从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另外一个候选的行业是新能源。美国最著名的能源行业风险投资家之一的杜尔(Joerr)认为,新能源行业可能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个市场的规模将达到 6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 欧洲: W 型走势

虽然,本轮金融危机的核心不是发生在欧洲,但是欧美之间贸易、金融和文化等方面的天然联系,使得欧洲成为美国金融危机殃及的“池鱼”,尤其英国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2009 年欧元区 GDP 增长率将为-1%,即是 GDP 出现负增长;而经合组织的预测则更为悲观,包括欧元区在内的大欧洲,实际 GDP 增长率可能为-2%至-3%。

为了应对经济颓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重要欧洲国家,摩拳擦掌,纷纷出台了重大的救市措施。其中,德国在 2008 年通过总额高达 5000 亿欧元的金融救市方案以及“以促进增长保障就业”的振兴经济方案,并于 2009 年 1 月公布第二套财政刺激方案。而英国央行 2008 年 10 月以来,连续四次削减银行利率 3.5 个百分点至 1.5%,这是英格兰银行建行 300 年来基准利率的历史最低水平。

虽然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暂时防止欧洲经济的严重恶化,但是欧洲经济前景令人忧虑。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大幅起色,欧洲可能也没有好日子过。其一,欧洲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比较大,美国仍是欧盟的最大出口目的国;其二,欧洲对美贸易中一般贸易占主导,外部需求的大幅减少将严重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三是欧美金融市场关联度高,道琼斯、标普下滑,金融时报 100、CAC40 和 DAX 估计很难逆市上升。

在某种层面上看,美国经济走势决定了欧洲经济的未来,这也决定欧洲经济的低点在何处。如果,在未来 1-2 年,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欧洲经济将所有复苏的话,那么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欧洲经济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无法实现强劲的复苏,或者说在实现强劲复苏前需要维持较长时间的震荡格局。







原因在于欧盟内部协调问题决定了欧洲经济复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当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候,政治联盟的约束可能荡然无存,集体行动的困难将显现。在弗里德曼和蒙代尔关于欧盟最优货币区的争论中,弗里德曼认为欧元将崩溃。虽然到目前,弗里德曼的预言没有发生,但是弗里德曼对欧元的担心仍然警示欧盟,即如果欧盟内部不能解决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问题,那么欧元将成为无本之木。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危机的上演可能是对此很好的一个注脚。只要欧元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大相径庭而且财政协调机制无效,那么欧洲经济可能就难以真正复苏,震荡格局甚至震荡下行都是有可能的。有技术派分析,欧盟经济可能二次探底,其底部可能甚于一次底部。由此可见,欧盟内部协调可能是欧盟经济走势的另一个决定因素。

#### 日本:L型的经济增长

日本近20年来的经济表现,使得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80年代初期的广场协议。有日本学者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遭遇的城下之盟,是日本走向长期衰退的根源之一。是否由于广场协议带来日元大幅升值,造成日本“失去十年”,这个问题在学术上仍然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从上世纪80年末以来,日本经济跌入峡谷,一蹶不振,这可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美国网络泡沫之后,全球经济增长迅速,日本也迎来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尤其是日本汽车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汽车,电器行业涨势喜人,日本经济似乎从失去的十年中慢慢复苏,从2006年开始,日本实现了10个季度的连续增长(当然,增长速度比较慢)。但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的日本经济又陷入衰退,而且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跌高达12.7%,为34年来之最低水平。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日元大幅升值,这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无疑是伤口上撒盐。日本学者伊藤(Ito)认为,对于日本经济,日元大幅升值可能会是致命一击。

不管是国际金融组织,还是学术界,对日本经济的预测都是较为悲观,他们认为,日本经济前景的黯淡,可能陷入较为长期的衰退。首先,日本的优势产品出口不容乐观,比如高端电器、小汽车等传统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大幅下降,在金融危机下,外部需求取代了质量和价格成为日本出口的决定性

因素。其二,日元升值将进一步冲击日本的出口。日本前财政大臣额贺福志郎在面对日元大幅升值的形势曾无奈地表示,可能世人对日元和日元资产信心增强了。最后,日本政府的过度更迭和日本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较小可能进一步延缓日本经济复苏。鉴于财政状况的压力,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相对较小,只有11.7万亿日元(大约为1300亿美元)。加上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性,政策全面性、持续性和针对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经济刺激计划的效率。从这些因素看,日本经济走出一个L型走势可能性非常之大。

#### 中国:V型反转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尤其是中国贸易形势令人忧虑,2009年1月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9%。贸易部门的颓势又引发了非贸易部门增长的下滑。“末日博士”,纽约大学Roubini教授指出,如果以环比数据计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测度多以季度环比数据衡量),中国2008年四季度已经陷入衰退。

但是,不管采取什么GDP衡量指标,中国的实际情况似乎比发达经济体好,也比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较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虽然算不上一支独秀,但也算是稳定一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超过35%。

这可能得益于中国经济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市场手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政策制定、实施方式。在危机中,中国迅速调整了政策方向,实行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政策基调,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核心,以10大政策措施为重点,以重要经济部门发展规划为依托的保增长、调结构和促民生计划。这将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鉴此,不用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可能出现V型反转,出现快速反弹,经济又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通道。

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预期,1月份的信贷数据、近期的股市表现,似乎都在印证中国经济正迅速回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样V型反转可能实现(根据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国实现这样的反转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样的快速反弹是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4万亿中的1.8万亿)和各经济部门发展规划中的投资为基础的,如果保增长、调







结构和保民生没有协调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可能重回高投资、高投入和低产出、低效率的老路。从现在的状况看,以 4 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为核心、十大救市措施为主体、各大行业发展规划为依托的保增长计划,在促进经济结构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为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存在很大的争议。即中国经济能否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增长通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如果中国经济的 V 型反转不能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增长通道,那么从中长期视角看,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 V 型逐步演化为 W 型,即国内结构问题无法解决,难以协调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关系,中国经

济必须进入二次探底,才能再次复苏,同时也是进入一个更为不稳定的动荡增长阶段。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更为严重,那就是 V 型转化为倒 N 型,那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一情况是最悲观的,但是并非不可能发生,比如中国内部结构失衡加剧,投资储蓄关系无法理顺,内部消费难以启动,而外部世界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整(比如美国储蓄率提高,进口需求大幅下降),那么中国可能要和日本一样,要陷入较为长期的低迷走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日期: 2009-2-24

## 中国:这么多美元怎么办?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

2007 年 6 月百仕通(Blackstone)上市,已被视为美国金融泡沫的象征事件之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某些最精明的华尔街人士在那时套现离场。

然而,这家私人股本集团的上市,也可以说掀开了金融历史的另一篇章,将塑造走出当前危机后的世界:正是在这一刻,中国真正开始对自身与美国密切的金融联系产生疑问。

### 百仕通股价缩水 84%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尚未投入正式运营,就斥资 30 亿美元买入百仕通 9.9%股权。由于百仕通的股价自上市后下跌了 84%,中投的新高管们成为网络博主发泄怒火的目标,这些博主认为中国在这笔交易中上当受骗了。聊天室近期的一篇帖子写道:“他们比战争时期的卖国贼还坏。”另一篇帖子抱怨道:“所谓的‘专家’盲目崇拜美国。”

中国拥有近 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为全球之最,在外界看来,这是一大优势,是对抗经济动荡的一张保险单。但在中国国内,公众乃至部分政策制定者,正日益将这些储备看作伤脑筋的东西——一个巨大的资源池,没有用在国内,而如果美元贬值,它也将随之贬值。人们问道,这样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为什么要提供资金给这样一个富国?

即便是在精英阶层,偶尔也会爆发出这种挫折感。中国银监会(CBRC)培训中心主任罗平上周访问纽约时抱怨道:“我们恨你们。一旦你们开始发行 1

万亿美元至 2 万亿美元的债券……我们知道美元会贬值。因此我们恨你们这些家伙,但我们没办法。”

随着中国经济急剧放缓,有关如何管理外汇储备的辩论日趋激烈。有人提议将这些钱用在国内,还有人认为应该将投资多元化,而继续买入美国国债的共识正受到抨击。

对奥巴马政府来说,这场争论事关重大。至少,中国政府在试图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方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力。中国社科院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中美之间)应该更加互让;应当有捍卫我们利益的某种保证。”他说,鉴于中国在填补美国赤字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华盛顿“至少应该好一点”。在近期金融史上,中国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比较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官方数字是 1.95 万亿美元,但据长期关注中国外汇资产的经济学家、纽约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布拉德·赛斯特(Brad Setser)估计,实际规模更接近于 2.3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逾 1600 美元。

### “美国从未如此依赖别国政府提供资金”

赛斯特估计,在总储备中,约 1.7 万亿是投资于美元资产,中国政府因此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去年,在国内经济经受巨大压力之时,中国仍借给美国逾 40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0%以上。赛斯特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日渐成为市场上美国国债的单一最大买家。美国从未如此依赖别国政府提供资金。”





在中国国内,投资于美国的规模一段时期以来备受非议。中投创建于 2007 年,所管理资产仅相当于总储备的 10%左右,但已成为批评的焦点。不光投资百仕通失利,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股价大跌之前,中投还向其投资了 50 亿美元。中投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也有投资,该基金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冻结了赎回。

一位为中投提供海外战略建议的欧洲银行家表示:“中国官员面临十分独特的处境——他们的每一项决策,都被放到媒体和网上辩论、分析,还经常受到抨击。我感觉他们已经吓坏了。”

几乎每周都有新提议产生,力图找到投资外汇储备的更好方法。官方媒体本周报道,可能设立一只基金,利用外汇储备来支持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最近,中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达成自然资源协议,最惹人瞩目的是中铝(Chinalco)计划投资于力拓(Rio Tinto),但这些协议无一直接牵涉到外汇储备。

另一个备受推崇的计划是,由中国财政部向央行“借入”美元储备,转换成本币,用于社会项目。

甚至负责管理大部分储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也在上周承认,该局正在论证新的方法。外管局副局长邓先宏表示:“我们将积极扩大利用外汇储备的渠道和途径。特别是,我们将探索如何让外汇储备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

#### 中国仍有必要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不过,中国官员意识到,中国仍有充足理由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当局希望以流动资产的形式持有巨额储备的大部分,那么几乎没什么选择能比得上美国国债市场的深度。而如果中国不想积累这么多储备,它就必须让本币升值——在出口暴跌之际,这恰是中国政府所不乐见的。

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至少在短期内,中国将继续支持美国市场。在危机时期,他们希望被视作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他们也知道,如果中国释出避免美元投资的强烈信号,就会损害自己手上的庞大美元资产的价值。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相信,保持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有利于支持市场信心……和国际市场的尽快复苏,”尽管他暗示危机结束之后会改变战略。正如《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执行总编葛艺豪

(Arthur Kroeber)所言:“中国的预设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稳定。他们不希望在不稳定的时候惹事。”

然而,如果说中国除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它仍可设法将自己的投资转化为某种影响力。接近政府的不止一个智库,已经奉命设想中国能够争取的各种让步,以换取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查晓刚公布了一份“经济愿望清单”,其中包括美国放松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

中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金融政策的批评声也日益高涨。上周罗平的尖锐评论,是中国担忧美元危机的最生动展示。但高层领导也给出了其它暗示。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去年 12 月份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其表示:“我们希望美国方面将会……保证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和投资的安全。”鉴于公众在外汇储备问题上的疑虑,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将会受到国内拥护。

北京正在讨论的想法之一,是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更大权力,能够就美国经济及其金融体系的健康发表中肯的评判。官员们还希望将购买美国国债用作外交武器,反对美方的保护主义措施。

#### “象正常的债权人那样行事”

可以说,中国已经显示出其可以影响美国决定。经济学家们表示,去年美国布什政府被迫对房地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进行资本结构重组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开始出售这两家美国房贷机构的债券,转而购买美国国债,赛斯特称:“中国开始象一个正常的债权人那样行事了。”

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最终面临着两大限制。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给予美国巨大的灵活性,这是其它拥有巨额赤字的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令许多中国官员感到头疼。中国不愿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也限制了它的影响力。

但政治层面的辩论可能截然不同。中美关系以往涉及美方对中方说教,数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低估和金融市场封闭。现在,中美关系将涉及中国就美国的通胀风险和美元疲弱发出警告。对即将来临的借贷热潮感到担忧的美国财政保守派,有了一个想不到的新盟友:北京。





### 说话严厉的人

去年成为副总理的王岐山负责中国的金融事务。他之前是一位银行家，并担任过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措辞严厉、坦率，曾推行艰难的改革，还主持了去年的中美对话。

但与多数高级领导人一样，他很少公开谈论中国的汇率政策。分析师表示，中国汇率和外汇储备政策的任何重大改变，都必须获得中国共产党政治局 9 名常委的批准。

### 北京在美国巨额债务中的关键角色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水平，可能在确定美国为其迅速增长的债务支付的利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投资者——主要是中国央行——已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外国机构，去年持有比例增加 15%，至将近 7000 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目前大约持有 3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即公开发行总额的一半多。今年中国是否继续以同样的步伐增持美国国债，可能是影响该市场前景的重要因素。

相应地，中国需求水平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美国人购买的中国商品越少，中国手上能够投入美元资产的美元就越少。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策略师李振伟(Alex Li)表示：“中国已成为持有美国国债的重要操盘手，以至于中国是否继续投资美国国债，将决定收益变动方向。”

不能想当然认为中国将一直购买美国国债。例

如，去年 11 月，中国卖出了 92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 2008 年 6 月以来第一个净卖出月份。去年 12 月（可获得数据的最近月份），中国再次购入美国国债——凸显出摇摆的可能性。

中国官方仍然承诺购买美国国债。但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国银监会高官罗平表达了与沙特和日本等国高官一样的矛盾心态。沙特和日本也是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

罗平表示：“美国国债是安全资产，是唯一选择，……一旦你们开始发行一万亿至两万亿美元的国债……我们知道美元会贬值，因此我们恨你们这些家伙，但我们没有办法。”

尽管罗平是微笑着说这些话的，但中国银监会很快向外国媒体发表声明，称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此外，分析师注意到，中国内部对如此巨大的财富投资到低收益率美元资产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满。

克里斯·伍德(Chris Wood)在为里昂证券(CLSA)撰写的周度报告中表示：“在其寻求降低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依赖之际，这是个饱受非议的领域，（中国）将日益变得敏感。”

“这可能是巨大的懦夫博弈(chicken game)。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将永远愿意购买美国国债。”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02-24，译者/何黎







### Guide:

-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Skills for Business Students**
- **Using the E-Mail Précis for Advanced Learner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Abstract:** Intercultural skill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business graduates operating in global economi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adaptation of the ExcelL Intercultural Skills Program to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urse, and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case study methods with the skills-based ExcelL program.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usefulness of ExcelL within a sample of third-year university business students. Four methodologies were used: (1) questionnaires, (2) case studies, (3) course evaluation surveys and (4) focus groups. The questionnaire and case study methods used pre-test and post-test designs to compar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nd micro-skill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celL program. The post-course focus groups gathered participants' opinions about intercultural skill improvements gained through the ExcelL program, and advice on potential improvements to the program for use in business coursework contexts. After completing the program,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s i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required in business contexts. Additionally,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improved identifica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cross-cultural business problems and formulation of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Key theme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focus groups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and assessed in future versions of ExcelL designed for a business audience. Considering that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usefulness of the ExcelL program in multicultural university environments, and this study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of ExcelL in business coursework settings, it is proposed that a modified version of ExcelL may provide businesses with training programs that gainfully assist adaptation within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business environments.

### Introduction

The need for intercultural training for Australian business graduates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by the Karpin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1992 to help prepare Australian managers for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Karpin, 1995). The report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Australian managers were seen as "unwilling to adapt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appeared to be unawar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Dawkins, Savery & Mazzarol, 1995, p. 37). Since the report's publication, business schools throughout Australia have attempted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skills through speciali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grees and courses. An accompanying trend has been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ustralia's business school classrooms, potentially providing a rich source of diversity for developing culturally savvy managers. The realisation of this potential, however, is unclear, with a similar situation in the UK resulting in a sometimes widening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local students, even in classrooms where intercultural





skills are being taught (Ledwith & Seymour, 2001). This research paper presents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xcell intercultural skills training program to an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HRM) classroom. The Excell program provides an excellent mechanism for students to explain how communication behaviour is different in their culture, and the underlying values that influence the behaviour (Barker, Troth & Mak, 2002).

Local, international and immigrant students have gained increased skill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ell program (Barker, Troth & Mak, 2002; Mak, 2000; Mak, Barker, Millman & Logan, 1998). However, where the Excell program has been embedded in business courses, as opposed to an extra-curricular workshop for volunteers, the learning benefits related to business coursework objectives are unclear (Barker *et al*, 2002). Using course feedback channels, participants have also questioned how the skills can be applied to the relevant business context (Barker *et al*, 2002).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 to business situations, its integration into a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nd its efficacy in teaching relevant intercultural management skills are therefore the major issues that require evaluation.

###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undergraduate context provides a number of specific challenges, some of which are identified by DeCieri, Cox and Fenwick (2001) in their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c IHRM.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guarding against the oversimplifications of cultural naïveté, the “narrow exclusiveness of ethnocentrism” and the “patronization of paternalism” (DeCieri, Wolfram-Cox & Fenwick, 2001).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the lecturer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use simplistic cultural generalisations and to use the home country as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examining cultural values. The teacher must also be aware that the classroom is rich with cultur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especially in the multicultural Australian university business classroom. The challenge for the teacher as facilitator, therefore, is to provide a teaching environment that taps into this cultural

diversity to welcome diversity through affirmation of differ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to enable students to share those perspectives with the class. Further to this, the culturally diverse classroom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e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ly synergistic solutions through application of Adler's (2002) cultural synergy model in task oriented group settings.

Despite the opportunity that the culturally diverse classroom provides, evaluative survey research amongst 172 culturally diverse students in UK business schools (enrolled in a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urse), found that task-based interactions amongst divers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were often perceived negatively (Ledwith & Seymour, 2001). In addressing this,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an assessment-based process of requiring students to manage and respect cultural differences within multicultural groups produced generally positive experiences of classroom diversity (Ledwith & Seymour, 2001). They recommended that a more deliberate, structured approach to managing classroom diversity focus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rceptual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ty competencies would help in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global oriented business students (Ledwith & Seymour,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skills for globally operating managers has been long established in the discipline related literature. There are a number of established methods of developing these skills



including role-plays, simulations, sensitivity training, field experiences (Blake, Heslin & Curtis, 1996; Woods, 2000), however most of these methods have been tested in the organisational setting rather tha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tting. The preferred methods in many higher education settings is didactic instruc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Friga, Bettis & Sullivan, 2003; Kumar & Usinier, 2001), whereas role-based training in groups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skills.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including also the case study method (McNair, 1954; Christensen & Hansen, 1987; Rees & Porter, 2002) h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graduates with both analytical and practical skills.

### The Excell program

The Excell program utilises classroom cultural diversity, student experiences and role-plays to develop specific intercultural skills. Excell is a theory-driven and evidence-based group program designed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skills in academic, social and career contexts (Mak, 2000).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resulting increased behavioural competencies decrease the stress associated with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encouraging social contact with, rather than avoidance of, students from other cultures (Mak, Westwood, Barker & Ishiyama, 1998). Further, Excell has demonstrable benefits for improv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local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and immigrant students, thus maximis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in university environments (Mak, Barker, Millman & Logan, 1998).

The Excell program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provid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requisit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successful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host national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incorporating various special features (Mak, Westwood, Ishiyama & Barker, 1999).

These features include the use of facilitator-based group work using rehearsal and retention methods based on cultural maps. These cultural maps provide succinct descriptions of effective ways of behaving in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such as asking a lecturer for help. Cultural maps use a sequence of precise and concrete micro-skills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The use of this method leads to decreased intercultural social anxiety by increasing social confidence. This social confidence is developed through mastery of actual skills that would be used in the "real world".

The Excell program uses six stages to progress participants from initial contact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use the new skills in intercultural settings. Prior to beginning this process, each session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where participants are welcomed or welcomed back. For continuing participants, their progress through the previously taught competencies is reviewed, and feedback and encouragement given. The first stage is called building "alliance and assess". This involves participants contemplating how they would behave in a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ir home culture, and sharing these observations.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map. The cultural map is developed from the observations stimulated within the first phase, with participants using the Excell manual to record the version of the cultural map that is most useful for them. Facilitators emphasize that maps are not prescriptive, but rather guides for participants to use and adapt. In the third stage, trainers demonstrate appropriate sequences of micro-skills represented in the cultural map. The participants then practice these skills, and further coaching from the facilitator is provided if required. Feedback and encouragement is given in the fourth stage.



The fifth stage involves participants setting goals and recording a contract in their manual that describes where and when they plan to practice the new skills in the week ahead with someone from a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ent to their own. They a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reflective exercises that are in the manual to focus their learning about the interaction and to identify areas that require ongoing work. This leads to the final sixth stage, where the participants transfer the learning to actual settings.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occurs when the participants report on their experience of practicing the competency in the real-life situation and flexibility required to adapt these skills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Facilitators discuss how students can continue to use their analytical skills of dividing a scenario into components (the “map”), as well as their behavioural and reflective skills.

### **Case study method**

The case study method of teaching focuses on engaging students in a reflexive dialogic process aiming for conceptual, decisional, strategic and problem-focussed analysis of a written or video case about a real company facing specific business problems (Christensen & Hansen, 1987).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to teaching business student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riginating almost 50 years ago from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cNair, 1954), and has been adopted in various forms in teaching business students at both the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 (Desiraju & Gopinath, 2001; Forman & Rymer, 1999). The benefits of the approach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diagnostic skills, subject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deep learning, and the involvement and motivation of students (Rees & Porter, 2002). The method, therefore, could provide a course related context in which intercultural skills could be critically examined in operation.

### **The Course Context**

The course,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as offered to 90 third year undergraduates and three postgraduates at Griffith University in 2003. The 13-week course was structured around fortnightly two-hour lectures involving the whole class and two-hour fortnightly workshops of no more than 20 students. Four of the six fortnightly workshops focussed on a particular intercultural skill from the Excell program, applied to an IHRM case study from the course textbook. The case studies centred on an IHRM scenario, providing the context for problem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formulation, role-play setting and cultural map (skills application) focus in the workshop.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from the workshops was not directly assessed, with a 35% case study analysis assignment chosen by the student from the case studies examined in workshops, the onl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orkshops and overall assessment.

### **Integration with case study method**

Most business courses, specifically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urse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management. The Excell program, however is focussed on developing practical skill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cell was originally framed as an adaptation program, with its stated aims being to help “international and immigrant students to learn skills that will improve their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in the new country” (Westwood, Mak, Barker & Ishiyama, 2001). The course,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two objectives being “that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HRM and the skill sets necessary for managers operating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Excell offers development of the skill set whereas the case study method offers development of an appl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of IHRM. An example of the kind of

intercultural skills needed in specific business contexts would be utili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negotiating an employment contract with subsidiary employees in an Asian/Pacific country.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cultural skills to specific business contexts enables a more 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strengthening the links between the skills and the course content. Applying the Excell intercultural skills training to relevant case studies in workshops, has the potential to actualise these goal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with the skills based Excell program requires careful evaluation, and this is a focus of this study.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usefulness of Excell within a sample of higher-level university business students.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efficacy of Excell in postgraduate university student samples (Barker *et al*, 2002), but the logical extension to undergraduate business student participants had yet to be researched. The adapted Excell program's specific learning outcomes are, therefore, that:

1.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improved skills in identify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problem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2. Students will improve in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overcome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business interactions; and
3. Students will report increased self-confidence and feelings of self-efficacy in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 **Methodology**

### Participants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 third-year undergraduate course with open enrolment and is a core course i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of the Bachelor of Commerce degree. Ninety-three stud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course, with 72% of the class female and 28% of the class male. Of the students, 28% were enrolled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Bachelor of Commerce (66%) with 10% enroll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nine other programs were represented. Forty-six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pre-test phase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twenty-three of these completed the post-test phase. Only thirteen of these questionnaires could be matched as a particular participant's pre and post Excell questionnaire.

### Procedure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four methodologies: (1) questionnaires, (2) case study analysis (3) focus groups and (4) a course evaluatio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used pre-test and post-test designs to compar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nd micro-skills before and after completing the Excell program. To complement this, the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 as a means of gathering participants' opinions about developments in intercultural skills gained through the Excell program, and advice on potential improvements to the program for future course offerings. The course evaluation survey wa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ith 85 out of 93 enrolled students participating. These four methods were used to allow an expanded analysis of the outcomes of the Excell program in the course.

Two case studies were presented to the participants, one prior to the Excell program and one after the Excell program. Participants recorded their conclusions about the most culturally appropriate ways to behave within these scenarios by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listed in Table 1. The case studies presented intercultural problems and issues, in order to allow participants the opportunity to report the skills they would use to bring about the most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These responses were transcribed



and then rated according to set criteria to determine a score of 1 = low accuracy, 2 = medium accuracy and 3 = high accuracy. The accuracy of respon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Excell.

At the end of the Excell course, two groups of four participants formed focus groups facilitated by independent facilitators. Their purpose was to evaluate the Excell program in the course and to generate ideas about how the Excell program might be improved.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Delbecq, Van de Ven & Gustafson, 1975) was used, with individuals generating ideas independently before bringing them back to the group. These ideas were then compared and categorised to distil key them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pportunity for groupthink, the key themes from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the main themes extracted. Students were then able to vote for the thre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s to the focus group questions, with 3 points for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 2 points for the second most appropriate and 1 point for the third most appropriate. The results of the focus group votes were later combined to determine the most popular responses to each question (Table 7).

### Measures

The questionnaire administered to Excell participant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gram included the Interaction Skills Checklist (Ishiyama, 1996). This checklist asks participants to rate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on 33 items using a seven-point scale from 1 = not at all effective to 7 = extremely effective. The checklist yields a total interaction skills score as well as six subscale scores being processing skills, active engagement skills, self-enhancement skills, approaching skills, assertive skills and interruption skills. This checklist assesses not only a person's perception of their skills, but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feelings of self-efficacy in utilising these skills.



The case study questions were designed to assess three particular areas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course objective of "examining the skill sets necessary for managers operating globally." The first question assessed the participant's ability to accurately identify intercultural problems by asking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ain intercultural problems evident in the case study?" The second question assessed the ability to accurately select appropriate intercultural skills by asking "What intercultural skills would have helped in resolving the problems presented in the case study?" The third question asked "What strategy would you suggest to help resolve the intercultural problems evident in the case study?" to assess the participant's ability to create an intercultural solution strategy.

The cours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from the course evaluation questions made available by the Griffit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rmstrong & Conrad, 1994). A total of 28 closed ended questions were selected, where participants respond to statements using a six-point scale from "strongly agree" to "strongly disagree". The cours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also contained four open-ended questions for participants to respond to (Table 3).

The focus groups asked five questions (Table 7) related to the relevance of Excell to the course content and course objectives (question 1), the relevance of the skills to learning about IHRM (question 2), the effectiveness of Excell in teaching intercultural skills (question 3),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in applying intercultural skills (question 4), and the usefulness and areas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participant's manual (question 5).

**Table 1: Focus group questions**

|    | Question                                                                                                                                                                                                                                                                                                                                                     |
|----|--------------------------------------------------------------------------------------------------------------------------------------------------------------------------------------------------------------------------------------------------------------------------------------------------------------------------------------------------------------|
| 1. | What was relevant in the Excell program to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 2. | <p>The intercultural skills taught in the Excell program were:</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Participating in a group</li> <li>• Making social contact</li> <li>• Expressing disagreement</li> <li>• Giving feedback</li> </ul> <p>In what way were these skills relevant to your learning about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p> |
| 3. | What was effective about the Excell program in teaching you intercultural skills?                                                                                                                                                                                                                                                                            |
| 4. | The four case studies used and the video case on group interactions: What was effective about using the case studies in applying the intercultural skills?                                                                                                                                                                                                   |
| 5. | Give some ideas on how useful the participant's manual was and how it could be improved?                                                                                                                                                                                                                                                                     |

### Results

Table 2 reports that most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 overall (76%). Although most students attended all or most of the lectures (68%), only 35% of students attended all or most of the workshops. The Excell program occupied four of the six workshops offered, and all six of the workshops focussed on specific IHRM case studies. Whereas most students found the lectures (77%) and the readings (72%) as either assisting or being a valuable aid to learning, only 57% of students felt that the workshops were a valuable aid to their learning (Table 2).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class discussion was also promoted in the lectures; hence, there was a high positive response (83%) to the question on whether the teacher encourag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lass discussions.

**Table 2: Responses to selected course evaluation questions (n = 85)**

| Question                                                                                    | Strongly Agree/ Agree | Uncertain |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 Missing |
|---------------------------------------------------------------------------------------------|-----------------------|-----------|-----------------------------|---------|
| In this course the teacher encourag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lass discussions          | 83%                   | 14%       | 4%                          | 0%      |
| Overall, I was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this course                                    | 76%                   | 13%       | 7%                          | 4%      |
| I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s used in this course were effective in helping me to learn | 75%                   | 16%       | 8%                          | 0%      |
| I attended all or most of the lectures                                                      | 68%                   | 7%        | 14%                         | 11%     |
| I attended all or most of the workshops                                                     | 35%                   | 18%       | 11%                         | 36%     |
| The lectures were a valuable aid to my learning                                             | 77%                   | 14%       | 9%                          | 0%      |
| The workshops were a valuable aid to my learning                                            | 57%                   | 16%       | 24%                         | 2%      |
| The required readings assisted my learning                                                  | 72%                   | 16%       | 9%                          | 2%      |

Course evaluations also presented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provide written answers to four questions. Altogether, 62 out of 85 respondents provided responses to one or more of the questions presented in Table 3. Table 4 presents the answers or comments related to the Excell program.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positive comment regarding the Excell program was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and discussion that the program facilitated.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negative comment regarding the program was that it was not linked to assessment. Opinion on role-plays was divided, with four participants commenting positively and two participants commenting negatively. A positive comment from question 2 (Table 3) was “getting to practice things such as ways to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role plays in workshops.” A negative comment in response to question 4 was “I thought Excell was very simplistic, to a point where it was insulting doing role plays – get rid of it and have more meaningful discussions rather than simplistic generalisations about other cultures.” Although three participants felt the workshops were boring, two other participants specifically commented that the workshops were interesting. The seven comments relating to case studies were all positive. In answer to question 1, a participant wrote “The case studies are a fabulous way to facilitate learning.”

**Table 3 : Open-ended course evaluation questions**

|    |                                                                                                                                                                |
|----|----------------------------------------------------------------------------------------------------------------------------------------------------------------|
| 1. | What are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you have learned from this course? Include at least one illustration of how you achieved the course objectives listed above. |
| 2. | Identify aspects of the course that helped your learning.                                                                                                      |
| 3. | Identify aspects of the course that hindered your learning.                                                                                                    |
| 4. | If any aspects of the course caused you concern, please recommend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

**Table 4: Course evaluation comments related to the Excell program**

| Positive Comments                                   | Negative Comments                |
|-----------------------------------------------------|----------------------------------|
| Interaction and discussion was good (x9)            | No link to assessment (x4)       |
| Case studies gave real life examples (x7)           | Boring (x3)                      |
| Liked role plays (x4)                               | Did not like role plays (x2)     |
| Interesting (x2)                                    | No link to lectures/ topics (x2) |
| Case studies are good in facilitating learning (x2) | Worthless activities (x2)        |
| Learnt from the scenarios presented                 | Felt childish (x2)               |
| Communication training                              |                                  |
| Cultural mapping                                    |                                  |
| <b>Total = 27</b>                                   | <b>Total = 15</b>                |

Paired sample t-tests of case study analysis repor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cell program (Table 5) found that Excell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th intercultural skill selection and in the ability to create a solution strategy. The low number of matches between pre-workshop and post-workshop reports (10) and surveys (13) is indicative of the low and inconsistent attendance at workshops.

**Table 5: Paired sample t-tests for case study analysis reports before and after Excell**



Paired Samples Test

|        |                                                                                                          | Paired Differences |                |                 |                                           |       | t      | df | Sig. (2-tailed) |
|--------|----------------------------------------------------------------------------------------------------------|--------------------|----------------|-----------------|-------------------------------------------|-------|--------|----|-----------------|
|        |                                                                                                          | Mean               | Std. Deviation | Std. Error Mean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       |        |    |                 |
|        |                                                                                                          |                    |                |                 | Lower                                     | Upper |        |    |                 |
| Pair 1 | Intercultural problem identification before Excell - Intercultural problem identification after Excell   | -.50               | .707           | .224            | -1.01                                     | .01   | -2.236 | 9  | .052            |
| Pair 2 | Intercultural skill selection before Excell - Intercultural skill selection after Excell                 | -.80               | .632           | .200            | -1.25                                     | -.35  | -4.000 | 9  | .003            |
| Pair 3 | Ability to create a solution strategy before Excell - Ability to create a solution strategy after Excell | -.70               | .823           | .260            | -1.29                                     | -.11  | -2.689 | 9  | .025            |

Paired sample t-tests for interaction skills (Table 6) assess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skills checklist (Ishiyama, 1996), indicate improvement in all skills assess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s noted in the total of all skills, in processing skills, active engagement skills and assertive skills.

Table 6: Paired sample t-tests for interaction skills checklist before and after Excell

Paired Samples Test - Interaction Skills

|        |                          | Paired Differences |                |                    |                                                 |         | t      | df | Sig. (2-tailed) |
|--------|--------------------------|--------------------|----------------|--------------------|-------------------------------------------------|---------|--------|----|-----------------|
|        |                          | Mean               | Std. Deviation | Std. Error<br>Mean | 95% Confidence<br>Interval of the<br>Difference |         |        |    |                 |
|        |                          |                    |                |                    | Lower                                           | Upper   |        |    |                 |
| Pair 1 | Total Interaction Skills | -11.7692           | 14.66375       | 4.06699            | -20.6304                                        | -2.9080 | -2.894 | 12 | .013            |
| Pair 2 | Processing Skills        | -2.1538            | 3.21056        | .89045             | -4.0940                                         | -.2137  | -2.419 | 12 | .032            |
| Pair 3 | Active Engagement Skills | -2.3077            | 3.52100        | .97655             | -4.4354                                         | -.1800  | -2.363 | 12 | .036            |
| Pair 4 | Self-Enhancement Skills  | -2.0769            | 3.54640        | .98359             | -4.2200                                         | .0661   | -2.112 | 12 | .056            |
| Pair 5 | Approaching Skills       | -1.9231            | 3.88290        | 1.07692            | -4.2695                                         | .4233   | -1.786 | 12 | .099            |
| Pair 6 | Assertive Skills         | -2.1538            | 3.33782        | .92574             | -4.1709                                         | -.1368  | -2.327 | 12 | .038            |
| Pair 7 | Interruption Skills      | -1.7692            | 4.12621        | 1.14441            | -4.2627                                         | .7242   | -1.546 | 12 | .148            |

Table 7: Combined major responses to focus group questions







|     |                                                                                                                    |    |
|-----|--------------------------------------------------------------------------------------------------------------------|----|
| Q1. | <b>What was relevant in the Excell program to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b>         |    |
| i   | Provides practice context for IHRM                                                                                 | 18 |
| ii  | Heightens cultural awareness                                                                                       | 12 |
| iii | Provides and understanding of impac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IHRM                                                | 12 |
| Q2. | <b>In what way were the Excell skills relevant to your learning about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b> |    |
| i   | Making social contacts and giving feedback due to cultural variance                                                | 11 |
| ii  | These skills help distinguish IHRM from domestic HRM                                                               | 9  |
| iii | Participation in a group so that one can be comfortable/ skilled in a group                                        | 5  |
| Q3. | <b>What was effective about the Excell program in teaching you intercultural skills?</b>                           |    |
| i   | Relevant and practical                                                                                             | 21 |
| ii  | The diversity of the group                                                                                         | 8  |
| iii | Effective use of case studies                                                                                      | 7  |
| Q4. | <b>What was effective about using the case studies in applying the intercultural skills?</b>                       |    |
| i   | Increases self awareness leading to skill improvement                                                              | 10 |
| ii  | Provides real life context                                                                                         | 10 |
| iii | Provides practical context                                                                                         | 7  |
| Q5  | <b>Give some ideas on how useful the participant's manual was and how it could be improved?</b>                    |    |
| i   | More specifics on each culture needed                                                                              | 11 |
| ii  | Questions provide focus for thoughts                                                                               | 11 |
| iii | Is useful, practical and precise                                                                                   | 9  |
| iv  | Simple format is good for business                                                                                 | 7  |

## Discussion

The Excell course combined with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appeared to have a mixed level of success in reaching the goals prescribed.

Based on the scenario question results, it appears as though students did achieve some improvement in identify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problem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lthough this was a trend and did not reach the 0.05 level of significance (Table 5). The goal of improving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overcome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business interactions” was also affirmed by the scenario question results, with a 0.25 level of significance for question 3 and a 0.003 level of significance for question 2.

The sample size of 10 out of a possible 93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course, affirms the finding in Table 2 that attendance throughout the Excell program was a major problem with only 35% of students reporting that they attended the workshops regularly. The student comments on the course evaluation gave reasons for this, with the major problem being that the Excell program was not adequately linked to overall course assessment and some felt that the program was “boring”.

Student's receptivity to the Excell program appeared varied, with a number of students, including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express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levance of Excell to the learning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urse evaluation comments, however,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ere divided on the relevance and suitability of the program to the course. Some students felt that activities were “worthless” and they “felt childish”. Some of these comments were linked to a



particular staff member, whose manner was regarded as “condescending” by some students. Nevertheless, the reaction to introducing a behavioural based program into university curriculum has been recognised as generating some level of student resistance as it is contrary to normal classroom expectations of business students (Rynes, Quinn Trank, Lawson & Iles, 2003). It appears as though the relevance of the program to IHRM could also have been better framed according to student feedback recorded in Table 4. The reaction to role plays appears divided (Table 4) with four students expressing they liked this aspect and two expressing that they did not like it. Role plays in training can generate mixed reactions (Smith, 1998), however further training of facilitators often helps to reduce negative reactions (Noe, 1999).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ExcelL seemed to be eff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with strongly rated responses being that the case studies “provide practice context for IHRM”, “heighten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provides and understanding of impac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IHRM” (Table 7). The link between case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skills training was regarded positively by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with the top responses being “increases self awareness leading to skill improvement”, “provides real life context” and “provides practical context” (Table 7). The focus group responses, however, must be tempered with the “voting with one’s feet” aspect of poor workshop attendance, possibly indicating that many students did not think the ExcelL program was relevant to their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Students reported increased self-confidence and feelings of self-efficacy in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via the interaction skills survey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6.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practice the skill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with students and friends from other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resulting increase in self-confidence and self-efficacy are important when considering that intercultural success is likely to lead to further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whereas failure often leads to further cultural isolation (Hullett & Witte, 2001).

###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rough completing the ExcelL program,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demonstrate improvement in some of the specific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required in business contexts, as well as reporting increased self-confidence and feelings of self-efficacy in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Additionally,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improved identifica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cross-cultural business problems and formulation of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ase study method with the ExcelL program is supported, howev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must be linked to assessment, program facilitators must be well train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ogram to the overall course must be clearly presented. Keytheme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focus groups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and assessed in future versions of ExcelL designed for a business coursework audience. Considering that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usefulness of the ExcelL program in multicultural university environments, and this study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of ExcelL in business coursework settings, it is proposed that a modified version of ExcelL may provide businesses with training programs that gainfully assist adaptation within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business environments.



### **References**

- Adler, N. (2002).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4th Edition*. Cincinnati: South-Western.



- Armstrong, J., & Conrad, L. (1994). *Subject Evaluation: A Resource Book for Impro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Brisbane: GIHE.
- Barker, M., Troth, A., & Mak, A. (2002). *Transition to a New Academic Context: Intercultural Skills Training f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Post Compulsory and Education Training Conference, Gold Coast.
- Black, J., & Mendenhall, M. (1989). A Practical but Theory-Based Framework for Selecting Cross-Cultural Training Method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8(4).
- Blake, B., Heslin, R., & Curtis, S. (1996). Measuring Impacts of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 D. B. Landis, R.S. (Ed.),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2nd Ed*. Thousand Oaks: Sage.
- Christensen, C. R., & Hansen, A. J. (1987). *Teaching and the Case Method: Text, Cases, and Reading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Dawkins, P., Savery, L., & Mazzarol, T. (1995). *Enterprising Nation : Renewing Australia's Manager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 Customer Views of Australian Management: Asian-Pacific Viewpoints*. Canberra: A.G.P.S.
- DeCieri, H., Wolfram-Cox, J., & Fenwick, M. (2001). Think Global, Act Local: From Naive Comparison to Cr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amara: Journal of Critical Postmodern Organization Science*, 1(1), 68-78.
- Delbecq, A., Van de Ven, A., & Gustafson, D. (1975). *Group Techniques for Program Planning, a Guide to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and Delphi Processes*.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 Desiraju, R., & Gopinath, C. (2001).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in Case Discussions: A Comparison of the MCIA and the Harvard Case Methods.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5(4), 394-408.
- Fish, A., & Wood, J. (1997).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Competence in Australian Business Enterpris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5(1), 37-52.
- Forman, J., & Rymer, J. (1999). The Genre System of the Harvard Case Method.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13(4), 373-400.
- Friga, P. N., Bettis, R. A., & Sullivan, R. S. (2003). Changes in Graduate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New Business School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2(3), 233-249.
- Hullett, C., & Witte, K. (2001). Predicting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solation: Using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to Test Anxiety/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5(1), 125-139.
- Ishiyama, F. I. (1996). *The Interaction Skills Checklist*.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Karpin, D. (1995). *Enterprising Nation : Renewing Australia's Manager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 Report of the Industry Task Force o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kills*. Canberra: A.G.P.S.
- Kumar, R., & Usinier, J. C. (2001).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essons From the French Experience. *Management Learning*, 32(3), 363-391.
- Ledwith, S., & Seymour, D. (2001). Home and Away: Preparing Students for Multicultur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2(8), 1292-1312.
- Mak, A. (2000). Extending Social Skills for Succes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EXCELL Progra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2).
- Mak, A., Barker, M., Millman, L., & Logan, G. (1998).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cultural*





*Social Efficacy and Skills: Evaluation of the Excell Program in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s Network of Australia Conference,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Canberra, 1-4 December.

- Mak, A., Westwood, M., Barker, M., & Ishiyama, I. (1998). Developing Sociocultural Competencies for Succes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Excell Program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9(1), 33-38.
- Mak, A., Westwood, M., Ishiyama, I., & Barker, M. (1999). Optimising Conditions for Learning Sociocultural Competencies for Suc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1), 77-90.
- McNair, M. P. (1954). *The Case Method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New York: McGraw Hill.
- Noe, R. (1999). *Employe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Boston: Irwin McGraw-Hill.
- Rees, W. D., & Porter, C. (2002). The Use of Case Studies in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art 1.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ing*, 34(1), 5-8.
- Rynes, S. L., Quinn Trank, C., Lawson, A. M., & Iles, R. (2003). Behavioural Coursework in Business Education: Growing Evidence of a Legitimacy Cri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2(3), 269-283.
- Selmer, J., Torbiorn, I., de Leon, C. (1998). Sequential Cross-Cultural Training for Expatriate Business Managers: Pre-Departure and Post Arriv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5), 831-840.
- Smith, A. (1998).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2nd Ed*. Sydney: Butterworths.
- Westwood, M., Mak, A., Barker, M., & Ishiyama, I. (2001). *The Excell Program Trainers Manual*. Brisbane: Lyonco.
- Woods, P. R. (2000). *Training of Australian Expatriates for Management in SE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 Proceedings of the 2000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ight and Action, Brisbane, 6-8 September.
- Woods, P. R. (2003).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Australian and Singaporean Expatri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4(5)

## Using the E-Mail Précis for Advanced Learner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 Introduction

The e-mail précis is underused as a learning device in FL and ESL writing classes. I describe here a methodology employed with advanced learners of German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Students e-mail summaries of online radio broadcas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o the instructor; the instructor corrects them, returning the summaries with error feedback via e-mail. The outcome is improved skills in critical thinking, oral comprehension, reading and writing.

### E-Mail in the Classroom

Scholarship has long recognized that e-mail is a learning tool with a firm place in the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and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Lunde, 1990). Gonglewski, Meloni and Brant (2001) give a recent rationale for classroom applications of e-mail, listing these benefits to learn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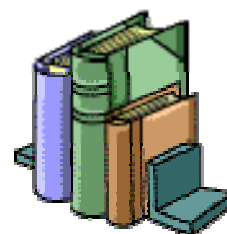




- Extends language learning time and place
- Provides a context for real-world communication and authentic interaction
- Expands topics beyond classroom-based ones
- Promotes student-centered language learning
- Encourages equal opportunity participation
- Connects speakers quickly and cheaply

The pedagogical value of e-mail is not in dispute. It fosters student aut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promote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t inspires student-centered interactions and results in greater personal and expressive use of language (González-Bueno, 1998; Hoffman and Scheidenheim, 2000; Lawrence, 2002; Mansor, 2007). So flexible is e-mail in the classroom that Corio (1999) states: "Classroom applications for e-mail are limited only by the imagination of the teacher."

Especially important is the use of e-mail to increase the global awareness of student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help learners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for geography, culture, and language. Students also form friendships with e-mail partners, keypals, from whom they gather first-hand inter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most popular student site using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to form an Internet community is ePals ([www.epals.com](http://www.epals.com)), now in over 190 countries.



### The Précis in the Classroom

Précis writing—now called summary writing—is a fundamental technique of composition, well-established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Cohen, 1950; Bromley, 1985). It is a learned skill requiring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main point(s) of an argument and then to express these in a different way, summing up the chief thoughts with cogency and concision.

Through précis writing students learn:

- 1) to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isolate the thesis sentence(s) and conclusion(s);
- 2) to use synonyms to express ideas;
- 3) to practice the art of summarizing, and abstracting, arguments; and
- 4) to model their own writing on a docum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kind of summarizing in a précis improv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encourages critical thinking, and teaches students to abstract main ideas. It is a problem-solving tool that promotes clear communication. Like e-mail,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précis are limitless (Woodworth, 1988).

Précis writing is, however, a neglected pedagogical tool, usually practiced by the English teacher or rhetorician and seldom applied to FL and ESL settings. For example, in the writing classroom MacNeill (2000) uses student summaries of news events for a class e-mail news journal.

### The E-mail Précis in my Classroom

My college composition class, usually numbering 15 students, is made up of advanced German learners. Participants are usually majors or minors, and all have had a formal grammar review. The aim of the class is to guide students to authentic written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structures and idio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ll class members are computer-literate; all use e-mail, and all surf the Net regularly. I decided to bring their talents and interests into the classroom through basic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hoping that their exposure to up-to-the-minute cultural events and news in Germany would bring enthusiasm to class assignments. I had not expected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writing, but that was the result. Up to now, my findings are anecdotal, but strong and convincing, and it is time to lay out the method to colleagues who can adapt, and test it further.

### Procedure

#### The Weekly E-Mail Précis

Our summary is assigned as a supplementary, out-of-class task. Intended to support the writing process, it has no necessary thematic connection to classroom writing and speaking exercises, or to the written, formal essay that is also handed in once a week. (On the goals and format of that essay, a redacted Internet short-text, see McDonald, 2007).

Once a week, at a prescribed time, students e-mail the teacher a précis of one of the stories in an online radio broadcast of news and cultural events. The usual length of the summary is five complex sentence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See a sample student précis in the Appendix.) Recent topics include climate change, a visit of Secretary of State Rice to Germany, German film awards, the firing of a German soccer coach, and Iran's nuclear program.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use an online synonym dictionary (for German, [www.woxikon.de](http://www.woxikon.de)) to replace words in the online radio broadcast. Through synonyms we seek to enrich, and enlarge,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The teacher corrects the précis within 24 hours and returns the corrected version to the

student via e-mail. The e-mail précis is graded cumulatively, that is, as a semester project which demonstrates progress in writing. Therefore, no letter grade appears on the weekly assignment.

All student e-mail summaries are drawn from the Internet site Deutsche Welle ([www.dw-world.de](http://www.dw-world.de)), a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source resembling the BBC, CBC, or NPR. Since Deutsche Welle offers news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30 languages around the clock, it can easily be adapted for profitable teaching in FL and ESL classrooms. For similar results, ESL teachers can use BBC online radio (<http://news.bbc.co.uk>).

#### Variations on the Method

The e-mail précis as constituted here tests listening skills, comprehension, the ability to isolate and synthesize information, and grammar. If the teacher decides the exercise is too demanding in this configuration, I propose adaptations.

- Eliminate the oral component, replacing it with a self-selected, brief Internet text (100-150 words) from the same website, Deutsche Welle. Students send the teacher the model text from which the précis is drawn as an e-mail attachment; this serves as a teacher-control text. Students continue to write five complex sentence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 Students write fewer, or more, sentences than five, as decided upon b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lass.
- In a paragraph equal to the e-mail précis in length, students add 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text chosen for the précis, stating agreement, disagreement or surprise, and justifying their reaction to it (MacNeill, 2000).





- The class decides to expand the use of websites for the e-mail précis, choosing, for example, Yahoo! International news (<http://world.yahoo.com>), or a combination of safe sites.
- The class creates a mailing list for the e-mail précis. Students post summaries for all to see.
- Teacher error-analysis is controversial (Van Handle, 1998). Some may choose to follow Van Handle's suggestion on an e-mail exchange between two intermediate German college classes: "Students were informed that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E-mail project would not be graded or corrected for linguistic accuracy because their primary focus was to be on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peers."

### Summary

I employ the e-mail précis in advanced writing classes because I see steady improvement in written expression over the course of a semester.

These observed pedagogical benefits support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 Students improve oral comprehen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learn about current events;
- Students exercise choice by selecting a topic to summarize;
- Students learn to isolate the main thoughts in a non-native language setting;
- Students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 concision, choosing synonyms and summarizing content;
- Students develop a world-perspective and receive current information on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 The teacher can monitor, and archive, the student e-mail précis, thus 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s authentic, written communication;
- Teachers can isolate repetitive mistakes easily, and can comment on these both in written remarks on the return e-mail and in follow-up oral, one-on-one remarks in the classroom.

###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 Experiment to see if the e-mail précis can be introduced at other levels of instruction besides advanced;
- Study whether those students writing the e-mail précis have greate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an their peers;
- Calculate how much instructor written feedback students can tolerate and still compose e-mails freely;
- The one-on-one e-mail dialogue between learner and teacher benefits the motivated student who wants rapid feedback and wishes to know precisely which elements of grammar and syntax require correction. How does one motivate students who are careless with grammar in target language communications, or who do not improve after repeated e-mail précis assignments?

### Appendix

#### Sample Student E-Mail Précis

**Note:** I correct in brackets and place a serious correction at the bottom with \*\*\*. In this case, the student made an error with the date: "On Tuesday." The topic is world climate control and the resolution of European states to lower the levels of carbon emissions.



Auf [am] Dienstag hat Grossbritanniens Regierung Pläne zum Klimaschutz vorgelegt. Die Regierung von Tony Blair will die Kohlendioxid-Emissionen bis 2060 um mindestens 60 Prozent senken. Diese Pläne wurden von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und EU-Umweltkommissar Stavros Dimas begrüsst. Sie glauben, dass es besonders wichtig ist, beim Verbraucher mit dem Klimaschutz zu beginnen. Meiner Meinung nach ist die Umweltschutz-Gesetzgebung immer wichtiger, und jeder muss seine Schuldigkeit [seinen Teil?] tun.

\*\*\*am Dienstag



## References

- ◆ Bromley, K. (1985). "Précis Writing and Outlining: Aids to Learning Content Material. The Reading Teacher, 38, pp. 406-411.
- ◆ Cohen, L. (1950). "Composition through Précis-Writing."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34, No.5, pp. 389-391.
- ◆ Corio, R. (1999). "PCI-97: CyberESL and Beyond: Classroom Applications." <http://oregonstate.edu/~healeyd/pci/cyberesl.html>
- ◆ Gonglewski, M., Meloni, C., and Brant, J. (2001) "Using E-mail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ationale and Suggestions." The Internet TESL Journal, Vol. 7, No.3, <http://iteslj.org/Techniques/Meloni-Email.html>
- ◆ González-Bueno, M. (1998). "The Effects of Electronic Mail on Spanish L2 Discourse."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Vol. 1, No.2, pp.55-70.
- ◆ Hoffman, E. and Scheidenhelm, C.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Composi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 Lawrence, G. (2002). "The Use of E-mail as a Tool to Enhance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al Programs: An Example from a Core French Classroom." In Turnbull, Bell and Lapkin (Ed.), From the Classroom: Grounded Activiti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pp. 30-39). Toronto: U. of Toronto Press, 30-39.
- ◆ Lunde, K. (1990). "Using Electronic Mail as a Medium for Foreign Language Study and Instruction. CALICO, Vol.7, No 3.
- ◆ MacNeill, A. (2000). "Email News Journals." In K. Ryan (Ed.), Recipes for Wired Teachers (pp. 56-57). Nagoya, Japan: Japan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 Teaching-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Special Interest Group.
- ◆ Mansor, N. (2007). "Collaborative Learning via Email Discussion: Strategies for ESL Writing Classroom." The Internet TESL Journal, Vol. 13, No.3, <http://iteslj.org/Techniques/Mansor-EmailDiscussion/>
- ◆ McDonald, W.C. (2007). "Redacting Short-Texts (IST) to Improve Second-Language German Writing Skills." GFL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Vol. 3, pp. 91-119.
- ◆ Van Handle, D. (1998). "Extending the Dialogue. Using Electronic Mail and the Internet to Promote Conversation and Writing in Intermediate Level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CALICO, Vol. 15, No.1-3.
- ◆ Woodworth, M. (1988) "The Rhetorical Précis." Rhetoric Review, Vol. 7, No. 1, pp. 156-164.





|                                                                                                |                                        |
|------------------------------------------------------------------------------------------------|----------------------------------------|
| <b>SIFT</b>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 <b>本期要目</b>                            |
| <h1>法学动态</h1>                                                                                  | <b>立法动态</b><br>☆ 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年立法工作简述  |
|                                                                                                | <b>法治论坛</b><br>☆ 论国际法的国际化——中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 |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 <b>法学教育</b><br>☆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
| 2009年3月                                                                                        | 第1期 [总第二十六期]                           |

## 立法动态

### 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年立法工作简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08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立法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了新一届五年立法规划,审议通过了企业国有资产法、食品安全法、防震减灾法(修订)、消防法(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保险法(修订)、残疾人保障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七)、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等9件法律,还审议了社会保险法、国家赔偿法、侵权责任法、邮政法(修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统计法(修订)等6部法律草案。

——编制立法规划,保证立法工作科学、高效、有序地进行。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立法工作的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分析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在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合理、可行的原则,编制了五年立法规划。这个立法规划着眼于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把基本的、急需的、条件成熟的法律作为立法规划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项目。立法规划涉及改善民生、完善经济体制、规范行政行为、健全司法制度、发展民主政治等7个方面64件法律项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统筹安排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基本保障。贯彻执行好这个规划,对于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贯彻执行好这个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召开立法工作会议作了部署,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审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加快企业改制,加强企业管理,国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积累了数量巨大的企业国有资产。为了保障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 and 监督制度,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前几届全国人大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两次审议,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按照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宪法精神,针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and 监督中的突出问题,对确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基本原则,规范企业改制、关联交易、资产评估、资产转让等





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程序等作了严格规定。它的颁布实施,对于维护国有资产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审议通过食品安全法,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针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不少食品存在安全隐患,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的情况,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经四次审议,通过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针对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针对“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从健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环环相扣的监管体制,确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明确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加强对食品添加剂和保健食品的监管,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机制,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建立起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和法律屏障。食品安全法的制定,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审议修订防震减灾法,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危害。地震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自然灾害。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防震减灾法。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总结了我国这些年来防震减灾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将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抗震救灾的成功做法,予以制度化,对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作了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对于提高我们的防震救灾能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审议修订消防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每年火灾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十分严重。为防患于未然,修订后的消防法针对消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健全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立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群众积极参与的消防工作机制,明确了消防队伍的组织、建设、装备和职责,为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公共安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审议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总结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把鼓励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政策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增强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审议修改保险法,促进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近几年,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保险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近些年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险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保险法从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利益的保护等方面,着重加强了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完善了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进一步规范了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加强和改善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对有效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促进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审议修改残疾人保障法,进一步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关心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适应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残疾人保障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修改后的残疾人保障法,充实了禁止歧视残疾人的有关规定,并从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强化了对残疾人权利的保障。它的颁布实施,对于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增强全社会扶残助残意识,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七），有效惩治各种犯罪活动。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预防惩治犯罪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证券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老鼠仓”犯罪，以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增加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维护公民的信息安全；增加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或者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和收受财物犯罪，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惩治腐败的法律规定；对偷税罪，规定了如补交税款和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犯绑架罪，降低了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况的起刑点，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还对走私罪、非法经营罪、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等犯罪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刑法修正案（七）的制定，对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审议修改专利法，进一步促进科技进步创新。专利法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部重要法律。我国专利法颁布实施20多年来，适应形势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落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行使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赋予的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我国科技创新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修改了专利法。修改后的专利法，在明确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定义，提高专利授权标准，删除向外国申请专利须先申请中国专利等规定方面，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对进一步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推动发明创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对6部法律草案进行了初审或再审。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证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使公民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审议了社会保险法草案；为更好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完善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审议了侵权责任法草案；为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审议了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为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解决机制，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巩固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审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预防和惩处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维护被调查者权益，促进统计信息社会共享，审议了统计法修订草案；为了保障邮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邮政服务，确保通信安全，促进邮政业健康发展，审议了邮政法修订草案。

一年来，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和客观需要出发，针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面对改革发展和经济社会呈现出的新特征，国际经济环境的风云突变新形势，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的新要求，在立法工作中自觉主动地回应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立法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一年来的立法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注重发挥法律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中的作用。立法是人大工作的最重要方面，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必须把立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上来筹划，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中来审视，放到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来思考，从而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2008年，面对重大困难和严峻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部署，把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贯彻到立法工作中。在制定立法规划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并且立法条件比较成熟的立法项目列入立法规划；同时，把修改法律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注重法律的修改完善，及时修改那些与实际情况







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去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为做好防震减灾修订草案的审议工作,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中形成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精干力量到灾区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抗震救灾一线干部群众的意见。全面修改后的防震减灾法,条文由48条增加到93条,提高了建设工程特别是学校、医院、农村住房的抗震设防标准,完善了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加强了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制度措施,增强了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坚持以人为本,加大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的力度。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把促进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继续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审议了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防震减灾法(修订)、残疾人保障法、侵权责任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等关系民生的法律案,占全年审议法律案总数的近一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上述法律案时,坚持以人为本,把民生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众的特殊利益关系,推动从制度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食品安全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最为关注,代表议案最为集中的立法项目,各方面对制定食品安全法寄予了很多关注和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本着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积极慎重态度。食品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后,针对“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审议社会保险法草案,对广大职工群众最关注的转移接续基本养老关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着重在公民社会保险权利的具体化方面进行规范,还对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五个险种分别作了专章规定。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时,着重就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普遍关注的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方面的问题设定法律制度。

(三)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实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科学立法要求法律制度准确反映和体现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同时要遵循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法律立改废并重。民主立法要求法律制度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法要面向人民、为了人民。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法律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效果。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点,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扩大公民对立法的参与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形成了新亮点。去年4月,委员长会议决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在中国人大网上全文公布,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法律草案,还要在全国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布,增加立法工作透明度,实现了法律草案公布工作常态化。这是不断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又一重要举措。去年有11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通过这种形式认真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对公民通过各种途径提出的意见,做到能够吸收的尽量吸收,并将吸收情况给予反馈。审议防震减灾法草案,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7000多条意见,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有关充实群测群防制度,增加国家鼓励、引导志愿者参加防震减灾活动和学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开展地震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意见,都经认真研究,吸收到了法律规定中;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收到各方面的意见11300多件,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有关理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对食品经营实行分层次管理、食品召回、保健食品管理等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对法律草案进行修改。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后,共收到7万多条意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收集的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后,通过各大媒体向社会进行反馈。首次摘引37名带姓名的群众提出意见的原文,并附带5封群众来信和10名网友







意见,正式向社会作出意见反馈,把公众对社会保险法草案的讨论引向深入。同时,还坚持对专业性较强、争议较大的问题召开论证会的做法,为修改法律草案提供充分依据。针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中涉及的电子监管码问题,法律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立法论证会,让不同意见展开论证,以利于比较、分析、决策。通过不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对法律草案进行反复研究修改,立法质量不断提高。

(四)坚持与时俱进,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去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法律清理工作,对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的明显不适应、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一次集中梳理。这是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为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常委会对法律清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法律清理工作以宪法为准则,坚持法制统一,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情况,区分轻重缓急,进行分类处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更加科学、统一、和谐,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的目标任务。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09 年 03 月 11 日

## 法治论坛

### 论国际法的国际化

——中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

莫世健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 一、导言

中国改革开放始自 1978 年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事实。如果以此为基础的话,至 2008 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法治重建的三十年,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年法学工作者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共同成长的三十年。作为一位 1978 年吉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一位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二批能够成功进入大学的幸运儿之一,一位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年加入中国法治建设队伍的一员,笔者非常珍惜此与其他多位学者一起对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进行回顾和反思的机会。法学知识浩如烟海,法学研究更是永无止境。笔者学识浅薄、过去三十年又有半数时间以上在中国大陆以外学习、工作和生活,面对我国国际法发展三十年的回顾之重任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好在法学研究的宽仁允许个性化观点的表述。笔者在此斗胆从一个海归学者角度就我国国际法三十年的发展和特点发表个人点滴看法。

笔者自 1978 年起与国际法结缘。或许是命运的差遣,笔者在 1978 年高考时所报的第二志愿宽容地接纳了我,为我提供了步入法学殿堂的机会。比起现在许多优秀的第一志愿尚且不能进入国内优秀大学法学专业的莘莘学子而言,笔者和当时能够进入吉林大学学习法律的多位学友一样都庆幸命运的眷顾。虽然我们当时学习的条件艰苦、资料匮乏、师资也相对薄弱,但我国老一代法学工作者的朴实、认真和勤奋,以及他们对当时我国既有些陌生,也有些神圣的法学教学和研究的追求,在我们心灵中成功地启迪了通往法学知识浩瀚大海的天窗,也为笔者今后的法学研究征程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如果有人询问我们这一代法学工作者回顾三十年法学研究的最大体会是什么的话,笔者列在第一位的答案是:踏实、认真、开放和求实的研究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没有的东西可以学会,不存在的东西可以建立。这不就是我国过去三十年法治发展和法学研究的历史吗?

笔者对国际法的初步认知是在 1978 年后的大学四年中获得的。记得当时学校能够接触到的中文国际法书籍只有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1979 年李浩培先生的《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1981 年王铁崖先生主编的《国际法》和高树异先生等著的《国际法讲义》(上下册)等寥寥几部著作和教材。此间笔者也曾在在吉林大学的外文图书馆中尝试借阅过旧版的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等几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前出版的英文国际法原著,但当时的英文能力有限,也没有真正学懂这些国际法经典的原理。但无论如何,这些中英文著作仍然完成了我的国际法启蒙教育,为我以后出国继续攻读国际法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学者,我在大学期间的国际法知识涉猎经历代表了我国现在这批中年国际法学者类似的经历。主要不同在于我后来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完成了我国国际法知识的初步积累,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在国内完成国际法知识初步积累的。我们不同的学习经历也是我国国际法学研究发展史的见证。

我国国际法体系的构建和国际法学研究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成就、发展,以及期间的重点事件难以以单篇论文形式作出客观、公正的概括。所以,笔者仅期望从一个海归学者的视野,从几个笔者认为重要的方面概述和总结我国国际法三十年的历史,并阐述笔者认为能够影响我国国际法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因此,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回顾、讨论我国国际法三十年的发展,即对外开放中的国际法体系重建;中国国际法教学、科研体制特色分析;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实践的互动;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法地位讨论。笔者从以上四个方面对我国现有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特点、作用和发展发表个人看法,以期能够对我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作出微薄贡献。

## 二、对外开放中的国际法体系重建

国际法是指约束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规则,也包括部分调整其他国际活动的参与者,例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法律规则。[1]我国学者所采取的定义与此普通法系采取的定义大致相同。[2]但也有学者采取了多少有些不同的表述。例如,白桂梅教授将国际法定义为:“是主要在国家之间形成并主要依靠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力量来加以实施的,调整以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合。”[3]白教授的定义与较早前王铁崖教授所主张的定义基本相同,即国际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4]就国际法实质而言,以《布莱克法律词典》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观点和我国学者对国际法概念的理解没有太大差别。《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国际法是有约束力的(governing)规则,而我国学者也认为国际法有约束力或可依靠强制力实施;[5]《布莱克法律词典》明确地将国际法主体延伸到与国家有国际层面关系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而我国学者认为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从而为调整国家和其他主体间的关系保留了一些不确定的空间。也许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我国学者和政府可能暂时不愿意过分扩大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但他们至少不否认国际法主体有可能延伸至其他非国家主体的可能。这种对主体认同的范围差别也许可被视为我国国际法学界主流观点和国外学者间对国际法概念理解的少许差别。但这种差别只能产生在实践中具体主体认定的不同,不会导致概念理解的实质性差别。这种概念的趋同是必然的,因为国际法是国家间的法律,而一致或者协调的国际法概念是建立统一国际法规则的基础。

既然国际法规则应当是统一和协调的,中国的国际法体系也应当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法体系大致相同。所以,在国际法概念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接受以《布莱克法律词典》定义为基础的概念。如果有保护中国利益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只有部分参与国际活动的其他非国家主体与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应当受到国际法的管辖,而将那些不符合中国利益需求的关系在具体案件中排除在外。事实上,《布莱克法律词典》定义的英文解读也不会一定导致将所有的其他非国家主体和国家间产生的国际关系都纳入国际法体系的结果。所以,个案中具体规则的博弈实际上可以取代概念适用范围的博弈。

作为协调国家间的关系或调整以国家为主体的涉及部分其他主体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应当是一个超国家的法律规则体系。在此意义上,本节的标题:“对外开放中的国际法体系重建”可能产生是否是假命题的疑问。但本节的国际法体系是有特殊涵义的,主要包括两点:1)中国大陆在1978年前几乎没有任何成型的法律体系,当然也没有任何由中国明确认可或接受的系统的国际法规则体系,因此在认可和接受超国家的国际法体系问题上,中国在1978年是没有国际法体系的;[6]2)中国的国际法体系概念可以延伸到中国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而众所周知,1978年前中国是没有系统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7]因而产生了建立国际法研究体系的必要。在此双重意义上遂产生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建或构建中国的国际法体系问题。





自1978年起,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和团队建设也在突飞猛进。笔者粗略的统计,1978年后发表的我国各类中文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著作和教材有四百部之多,而论文多的更是无法统计。如果按照我国目前约有600多所法学院校为基数的话,如果每所院校平均有2个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老师的话,我国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至少应当有1200多人。再加上政府机关和其他机构、组织中从事国际法研究和实践的人员,我国从事国际法研究和实践的人员应当在1500人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际法研究和实践团队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与三十年前相比,这些简单的数字展示了我国国际法研究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后我国国际法体系的重建和繁荣是老中青几代国际学人三十年共同耕耘的结果。我国国际法体系的重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实践中我国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体系的重建和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重建。实践中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体系的重建主要体现在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对相关国际法原则的运用和认可。我国的外交、领事实践、边界纠纷的解决、对多项国际公约的签署和参加、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条约的签署、在联合国和WTO等国际组织中的积极参与等活动都体现了我国倡导、接受和认可的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体系。在此体系中,除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我国在海洋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投资保护、国际金融秩序和监管、航空法、国际反恐、WTO下的贸易自由化、地区安全体系和地区自由贸易安排等领域都采取了自己明确的立场。支撑这些立场的理论和原则代表了我国对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体系的接受和认可。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贡献。例如,我国在联合国体制完善、反恐合作、WTO体制下的国际贸易交流、地区自由贸易安排、联合国各类公约的起草和由于今年美国首发的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过程中都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再者,在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海洋法法院、WTO常设专家组中国法官和专家的出现也代表我国国际法地位的升高。中国因素和中国的参与必然影响相关国际机制的发展方向、构建和完善,而某些机制本身就是国际法体系中的部分。因此,中国国际法实践能够从一定角度上反映了我国三十年国际法体系重建的状况和成就。

作为国际法体系另一部分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业绩也非常突出。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强大教学队伍和成果外,国际法教学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目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的必修课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我国许多高校能够开设专业性很强的国际法选修课,例如,国际组织法、海洋法、空间法、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WTO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商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环境法等。如果我们比较我国大学法学院中能够开设的各类国际法和与国际法相关课程的话,我国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开设的课程很可能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内所有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够开设的同类课程总和。这种现象可以从几个方面解释:1)我国有更多的师资力量研究国际法领域的各类问题;2)我国学生基数大,而其中对国际法有兴趣的学生比例也很大;3)我国学界已经至少开始了量化性的国际法全面研究。我国现存的各类国际法研究组织对促进我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体制的重建和完善也起了较大作用。例如,我国现有的影响较大的各类国际法研究会包括: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中国空间法学会、中国海商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等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和团体。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于2005年成立的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Xiamen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该研究院以促进亚洲国家间、以及亚洲与其他地区间的国际法研究、教学和交流宗旨,[8]对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国际法交流和中国国际法教学、研究发展有重要贡献。以上事实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我国三十年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展示了我国在国际法教学、研究领域的成就。

概言之,自1978年起,我国的国际法体系已经逐步恢复、成型、发展和完善。在我国国际法实践方面,我们已经开始愈来愈多地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势参加了各种机制和活动,不仅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国接受、认可和支持的国际法原则体系。在1978年,我们对于国际法的认知、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基本上没有成体系的东西。目前我们已经通过选择和修改至少已经有了中国能够接受、遵守和使用的国际法原则体系。这样的体系能够提升我国国际法实践的稳定性 and 一致性,







并能够为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公平、有效的国际秩序提供一定支持。在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体系。虽然该体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都有待提高,但该体系的基本成形是不争事实。这比起三十年前是一个巨大进步。

### 三、中国国际法教学、科研体制特色分析

我国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体制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三国”鼎立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制:“三国”指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门国际法学科内的下级学科分支,与我国教育部规定的法学学位的三门国际法课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对应。这种课程或学科方向分类方法应当反映了我国国际法学界自1978年后逐步形成的国际法研究学科方向、法学部门或法律分支类别的既成事实。〔9〕就三个国际法分支而言,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划分是较为传统的分类方法。〔10〕而国际经济法变成独立国际法学科方向或法律部门或分支则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11〕虽然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出现过对国际经济法独立性的质疑,〔12〕但国际经济法与其他两个国际法分支、即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巨大差别是不争的事实。〔13〕因而,我国国际法研究领域内“三国”鼎立局面已经形成。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相比,我国的“三国”分类有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对三个国际法分支的差别、独立性和平等性的强调,以及此种强调对于教学、科研和资源配置,以及行政管理的影响。〔14〕

2. 以“三国”为基础的教学、研究管理体制很可能体现了苏联教育体制和理念的影响:我国国际法学科内的三个下级学科的分类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管理或者教学、科研管理模式,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教育和研究资源的分配和学者个人的研究方向。在国际法教学研究人员比较多的学校,例如,笔者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的三个下级分支则通过设立国际公法研究所、国际私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方式体现。而在国际法教学科研人员比较少的学校,即使没有“所”的设置的话,国际法学者也通常被冠为:国际公法方向、国际私法方向和国际经济法方向。不论这种以区分“三国”为基础的管理模式或思维模式引进时的初衷如何,此类区分事实上构成一种标识。该标识的主要作用不仅是显示学者的专业方向、研究特长或兴趣,而是一种领地性的宣示,有画地为牢的弊端。笔者发现此类管理模式下的许多学者知识面窄,将自己禁锢在一“国”研究方向的狭小圈子里,不仅不教授其他两“国”课程,也不研究或不愿(不敢)研究其他两“国”涉及的法律问题。笔者经常遇到国际法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竟然不能够或不愿意教授其论文外的国际法方向课程的案例。如果说将国际法学科分成国公、国私和国经三个下级分支还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话,那么三个分支下的学者和学生不能够或者没有能力从事自己“所属”分支外的教学和研究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特色了。当然,国际法学科内的画地为牢仅仅是我国法学教育和研究体系内普遍性画地为牢特点的一个缩影。笔者提出的国际法学科内的弊端,在我国多数法学教育和研究学科的通病。如果说专业化的方向划分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的话,而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所导致的专业化已构成了多数学者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围的精神枷锁的话,这种精神枷锁的存在一定会限制法学学者的研究潜力、导致法学研究水平的停滞或倒退。如果专业化的方向划分是一种提高各专业方向或“领地”研究水平手段的话,除了中国法制史类中国本身的研究外,我国多数法学部门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差距仍然较大的事实说明了这种以专业方向划分“领地”理念的失败。如果现在的专业方向管理体制导致了不同方向(领地)间的资源方面的恶性竞争和研究领域的恶性排除的话,这样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我国法学研究水平提高和国际化程度的加快。

以上是对我国国际法教学和科研体制特色的分析。该分析显示,虽然我国国际法研究“三国”并存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但与此“三国”鼎立相关的管理模式和思维模式却在事实上导致了“三国”的鼎立和国际法学整体研究的分离。第二个特色是负面的,不利于我国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也不利于国际法学界和国际法实践界的互动。当今国际法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扎实、全面的国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知识才能解决。“三国”体制下学者知识、思维和能力的狭窄性,导致了多数学者综合能力不足,从而无能力解决国际法实践的复杂问题。再者,这样体制下培养的学生尚且不能够在国际法领域内游刃有余,如何能够成为将整个法







学融会贯通的大师级人才呢?笔者认为我国法治建设需要的是既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又有扎实、全面的国际法知识和其他法律基础知识的专家。鉴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体制并没有我们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体制这样的弊病,笔者认为“国际法的国际化”起码是一个解决此画地为牢弊端的途径之一。

#### 四、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实践的互动

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实践的互动是中国国际法研究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国际法学者直接向相关国家政府提供国际法咨询或国际法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或技术支持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笔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剑桥大学法学院的国际法教授 James Crawford 教授就是经常代表不同国家政府参加国际诉讼的专家之一。[15] 在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仲裁机构的判决中也经常会见到不同国家知名国际法教授的名字。而发达国家的国际法专家作为其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国际谈判也是一个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常见现象。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都会以不同方式向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学者提供财政支持,以期望这些学者能够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国际法理论支持和解决国际法问题的对策方案。这些事实都说明国际法学者应当能够和相关政府在研究和实践两个方面形成良性互动的。

在我国,国际法学者和政府的良性互动在一定程度存在。例如,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王铁崖、赵理海和李浩培先生等都曾代表我国担任过国际性法庭的法官,而不少我国外交部和商务部从事国际法实践的官员也同时在我国不同高校担任兼职教授。最近几年,国家也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度,每年都有国际法学者获得不同层面的科研项目研究的财政支持。这些现象说明,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与1978年相比,我国的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实践的良性互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不符合中国需求。

我国目前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实践的互动不足主要问题在哪里呢?笔者注意到我国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一种特有现象。每年各国际法相关的学会举行年会时,一个已经成为潜规则的项目是由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或者人大相关机构官员的大会报告。由于年会参会者众多,能够开全体大会的时间有限,所以能够向全体参会成员作报告是一种殊荣,也足见来自不同实务部门官员报告在大会日程中的重要。在大会作报告的官员不仅享有与其工作岗位相关的信息优势,也享有来自其岗位经历的国际法知识和水平的优势,其国际法水平俨然高于多数参会者。这后一个优势则是笔者往往不解的问题。多数学者没有实践优势、却有时间优势,应当有充裕的时间在本来没有疆界的知识和学术海洋畅游。但为什么多数学者的国际法知识水平却低于整日忙于国际法事务的官员呢?当然官员和学者两个领域是互通的,可以有学者型官员、也会有官员型学者。按照中国成语“熟能生巧”所预示的道理,有些官员通过实践成为国际法专家也是可能的。但年复一年地任何“学者型官员”都能够在国际法知识方面主导多数国际法学者则是一个不健康信号。这种信号解读的唯一结果就是:我国学界国际法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这个笔者也不愿意面对的结论。

笔者认为前文所描述的官员国际法水平高于多数学者的现象就是一种我国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实践缺乏良性互动的证明。试想如果我国学界需要借助官员的讲授获得国际法基本知识的时候,我们学界还能够为我国政府和我国国际法实践提供什么支持呢?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国外交部门和商务部等机构在处理国际法问题时很少咨询我国专家的原因之一。由于学界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不够,笔者经常听见政府官员抱怨学者理论脱离实践、即不能解决问题,而学界有人也经常抱怨政府信息和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从而无法针对政府需求作研究,因此无法对政府需要解决的紧急问题提供答案。这样,学界和政府则重复陷入永远无法解答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论恶性循环。

现在的国际法学界和政府良性互动不足的原因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在此仅尝试从个人角度探讨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作为学界的一员,笔者认为学界必须首先注重自身水平和修养的提高。绝大多数国际法知识、特别是国际法基础知识都是高度透明的“舶来物”,一个有“心”的学者不需要政府信息就能够掌握这些知识。而政府提出的特定问题的解决则是将基础知识适用于具体事实的实践,因而政府部门期望学界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及时提出有效的问题对策不是一种奢望。而具有较丰





富处理日常事务经验的政府部门,仅在处理棘手的、不常见的或特殊的国际法问题上寻求学界支持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作法,恰恰反映了学界存在的价值。这更说明了国际法学界必须首先修炼自身的道理。与此同时,笔者同意国际法学界的研究也必须获得政府足够支持和其贡献必须获得政府恰当承认的道理。如果学界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困难的国际法问题提供答案的话,政府则必须确保学界养精蓄锐才能指望学界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可靠的支持。如何使学界能够养精蓄锐、保持其知识的更新则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再者,政府必须对提供了有效支持和解决方案学者的劳动提供合理的报酬和承认,才能确保学者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为国家需要储备知识的动力。这样的良性互动也许能够解决我国目前学界和政府互动不足的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法学者,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学界和实践界的互动不足还有其政府实践中的体制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国际法实践主要以保守和循规蹈矩为特征,并且主要是以“经验论”作为决策基准。我们往往先参考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经验,以建立判断标准。美国人或欧洲人做过的,我们才有信心实践。否则不敢涉险。这就是经验论的方法。从心理上讲,经验论实践者或者认为美国人或欧洲人已经做过的、我们做才无风险;或者认为即使错了,至少还可以躲在他人错误的后边,好像他人的错误或者失误足以掩饰我们错误和失误。在美国人或欧洲人没有涉足的领域或者尚未采取的作法,经验论者则往往失去了判断正误的能力,也因此失去了信心。这种心态反映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话,则显示了缺乏创造力和理论分析的能力。如果官员以此心态作为其业绩考核标准的话,官员主导的决策一定会缺乏创造性的。缺乏创造性的决策一定会导致国际法实践中的保守和滞后。当决策者创新的成本大大高于守旧和遵循经验的成本时,守旧和遵循经验当然是决策者的首选。当官员本身只有经验,而没有足够的理论创新基础和能力时,他们只有依靠学界提供创新对策。当学界不能提供有效的创新对策,或者采取创新对策的成本和风险高于以经验为基础的对策时,官员是不会选择创新的。因此,我国国际法实践对于学界依赖度的不足也有其体制内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我国国际法学界和国际法实践的互动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中国国力增加必然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过程中重要性的加强。仅靠经验论是无法协助中国完成从受规则约束者向规则主导者地位转变的。同样,“体系外国家”心态也无助于中国完成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转变。[16]

## 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法地位讨论

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国际法体系建设和国际法教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这不等于我国的国际法水平已经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需求。客观地讲,我国的国际法研究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就。例如,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就以自己名义提出过《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草案,以期推动我国国际私法规则的规范化;我国学者也在多项联合国公约的起草和谈判过程中做出贡献,并对我国许多尚待解决的国际法问题,如钓鱼岛主权、海洋划界、自由贸易区谈判、人权和反恐等问题上发表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我国的庞大的国际法师资队伍对于大批量的培养我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国际法人才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中国的国际法研究水平究竟如何呢?特别是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如何呢?这是一个我们回顾三十年国际法发展所必需直面的问题。

我国的国际法研究整体还是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在现行的国际法体制的构建和规则的发展中没有或者很少中国学者或中国政府贡献的话,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之低是不言自明的。在过去三十年的积累和学习过程中,中国人一直在向他人学习国际法,并且一直在恶补各类国际法基础和专业知识。可以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好学生。当中国国力一般、国际地位不太重要时,这种被动性的追赶和补课方式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太大影响。但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时,低水平的国际法研究则不能适应中国的国际新角色。国际影响力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秩序的建立、调整和发展中必须有创立规则和改变规则的能力。而只有首先熟悉和掌握现有的规则体系、程序和原理,才有可能成功地创立规则和改变现行规则。这就是我国国际法研究必须国际化的原因。





什么是国际法的国际化呢?国际法的国际化指研究方法和水平与国际接轨,以及国际交流达到国际水准。国际法必须国际化。中国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体系和原则,但必须是能够和现行的国际法体系进行公开、公平和有效对话的中国体系。否则中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则失去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影响力,也无法提供我国国际法实践所需要的支持。国际化不是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但如果美国或者欧洲研究代表国际法最新发展的话,则必须正视这些最新发展。如果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动态、贡献和水平,又如何能够和别人交流,并提出自己的有效对策呢?国际法是一个常态性高速发展的学科。如果中国不去推动其朝着有利于中国最大利益方向发展的话,发达国家则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推动其朝着保护其最大利益的方向发展。环保、人权、反恐、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投资规则的改变、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地区自由贸易秩序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都说明了此简单的道理。

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都要求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具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法学者还很少,成果也很少。多数研究成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法的实际问题,培养出了的多数学生缺乏国际竞争力,从而不能进入国际就业市场。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符。笔者认为不能仅将问题归咎于语言能力。中国每年到欧美留学的学生很多,现在从海外归来的学者也不少,为什么这些因素对我国国际法研究和水平的提高没有多大影响呢?所以,目前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普遍低迷不是一个语言因素能够解释的。笔者认为导致我国目前国际法研究水平较低的原因很多,是多重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学者本身的治学态度,国际法学界在过去三十年所形成的法律文化,主导国际法学者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评价体系,行政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国际法学者所赖以生存的国内环境和制约国际法学者的行政管理体系等都与我国国际法发展直接相关。所以,全面提高我国国际法水平是一个综合立体工程,需要学界和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学者的努力、管理部门通过资源配置和行政管理所建立的价值导向,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促进学界和实践界良性互动的措施都是影响我国国际法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国际法研究的国际化是中国国际法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

## 六、结论

在过去三十年中,同我国其他多数法学部门一样,国际法学体系建设和国际法教学、研究取得的巨大进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支持。但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都有较大差距。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大大高于其 1978 年水平,中国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水平也必须与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同步增长,即必须尽快完成从学生向老师地位的转变或完成从受规则约束者向规则制定者和受规则约束者双重身份的转变。这就要求我国国际法体系,以及教学和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国际化。国际化是一个从体制外融入体制内的过程,[17]也是一个在体制内由消极或次要成员演变成积极和主导成员过程。没有国际化的中国国际法体系(包括教学和研究体系)是不能影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发展的,也不能成为建立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和保护中国国际利益的有效手段。鉴于此原因,在回顾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之际,笔者更愿意唤起我国国际法学界和政府相关机构的危机意识,并真切期望我国国际法教学和研究能够尽快提高到适合我国利益需要和国际地位的国际水平。如果三十年前我国国际法重建得益于当时幸存的老一代国际法学者的睿智和献身精神的话,笔者也希望中国今天有更多的拥有同样的睿智和献身精神的国际法学者共同投身于我国国际法研究事业,这样中国的国际法学术团体才有可能在下一个三十年达到或领先世界水平。

[1] Bryan A Carner, Editor-in-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 7<sup>th</sup> ed, St Paul, Minn, West Group, 1999, p 822.

[2] 例如,马呈元教授和李居迁博士在他们主编的《国际法》中基本上接受了《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第6版对国际法的定义。见马呈元和李居迁主编:《国际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 白桂梅著:《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 [4]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2页。
- [5] 例如，周忠海教授将国际法理解为：“主要是调整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关系，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即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见周忠海著：《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 [6] 中国于1954年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多构成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抽象原则，而不是国际法规则体系本身。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论述，见王铁崖著：《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见邓正来主编：《王铁崖文选》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1-299页。
- [7] 在此，我想借助曾涛博士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见曾涛：《中国国际法学术史初探-兼论百年来的中国国际私法学》。在此论文中曾涛博士将1966-1978年间定性为国际私法学研究全面停滞的时期。笔者认为1978年前国际公法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类似情况，而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尚未提出。
- [8] 相关资料，见研究院网站：<http://www.xiamenacademy.org/>
- [9] 关于国际经济法究竟是法律部门还是学科分支的讨论，见莫世健：《国际经济法“独立性”辨析》（2008年）第15卷第1期《国际经济法学刊》第9-26页。
- [10] 例如，英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Malcolm N Shaw 认为国际法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冲突法或国际私法以及国际公法（简称“国际法”）。见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5<sup>th</sup> ed, reprinted in Beijing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 [11] 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见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1983年《中国国际法年刊》，第373-385页；王名扬：《国际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1983年《国际法年刊》，第386-293页；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于陈安著：《国际经济法学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
- [12] 见莫世健：《国际经济法“独立性”辨析》（2008年）第15卷第1期《国际经济法学刊》第9-26页。
- [13] 关于“三国”的差别，见莫世健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5页。
- [14] 相关讨论，见莫世健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5页。
- [15] Crawford 教授在去剑桥之前是悉尼大学教授。
- [16] 笔者也同意徐崇利教授对我国存在的“体系外国家”心态对我国国际法发展影响的分析。见徐崇利：《“体系外国家”心态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2006年9月，第24卷第5期，《政法论坛》第33-36页。
- [17] 因此，笔者同意徐崇利教授对我国国际法水平偏低原因的分析。见徐崇利：《“体系外国家”心态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2006年9月，第24卷第5期，《政法论坛》第33-36页。
-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http://www.cuplfil.com/> 发布时间：2008年12月06日

## 法学教育

###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张利宾 美国 Baker Botts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本文不是一篇有关中国法学教育的学术论文，只是记录下来笔者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按照古人的观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笔者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从事的律师业务大多是涉外法律业务。法学教育这个问题本不是我所应考虑的问题。去年我在执业之余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国际法学硕士学位课程（International LLM Program）的联合导师，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等法律院系举办有关法律学习和法律职业规划的讲座。在和法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交流过程中，开始从学生和老师的角度去思考法律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问题，并使我逐渐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另一方面，我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每天接到大量的法学院毕业生的求职简历。经过与中国法学院的一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并且阅读了有关中国法学教育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本文中将被援引），笔者产生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都是真诚的，意欲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并将笔者的初步看法提出，供那些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老师和领导者参考。如能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有所裨益，笔者将万分欣慰。

本文只是讨论法学院的教育问题。对于法律教育（legal education）一词，似乎其涵盖的内容较广，可能除了法学院的教育外，还包括律师事务所里对实习律师的培训以及法律继续教育（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甚至还包括政府部门组织的、针对大众的各种普法教育。国内大多数学者称法学院的教育为“法学教育”。根据一种似乎普遍接受的定义，法学教育一般指就读于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且这种教育不是仅讲法条，还需要进行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探讨。由于本文谈论的是法学院的教育，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沿用“法学教育”一词。

对于法学教育的问题，笔者将立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现实，以中美法学教育对比的视角，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下面几个方面对法学教育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1）法学教育的宗旨（即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2）法学教育的内容（即教什么的问题）；（3）法学教育的方法（即如何教的问题）。基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笔者将提出一些有关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

### 一、有关法学教育的两个前提

在讨论法学院的教育之前，笔者先提出两个前提性问题。

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学院？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需求有没有关系？法学院的教育是否应该以培养法律的理论人才（即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法学家或法律学者）为主？法学教育是否是一种脱离我国法律现实的一种法学教育？

在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开始，法学教育就与法律职业相关联。正如梅因指出，法学一度独占了罗马共和国的“集体智力”，法律职业吸引了众多睿智之士。除军事生涯外，习法是通向财富、名誉和权势的主要途径。因此，法律学校遍布罗马社会。当时的法律职业有：法律顾问（jurisconsultus）、辩护人（orator）和诉讼代理人（procurator）。但是到了中世纪，欧陆的法学教育却完全脱离了法律职业的需要，成为与法律现状不相关的一种纯学术和理论的研习。美国学者沃森和伯尔曼都注意到，中世纪的法学教育完全脱离所在地的法律而自成一体。在11世纪到13世纪的波伦亚法学院，罗马法教授们讲授的法律“完全是无国界的、永恒的；他们对于本地的法律、本地法律家所关心的问题，或许根本不屑一顾。……教室里的罗马法远离各国法院的实践。”然而，这种法学教育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法学教育也就不再继续了。方流芳教授指出，脱离本国法律的大学法律教育毕竟是一种例外情况，它短暂的历史似乎应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强大影响和欧洲封建政权分散、松懈、多元化的特殊背景中得到解释。他说到，如果说，罗马法在11世纪的传播是法律普适主义在法学教育领域的全面胜利，那么，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胜利已是不可再现的历史。

实际上，有一种说法是，在美国的历史上，最初从事律师的人大都是在其殖民地宗主国英国接受的法学教育，美国本土并没有正统的法学教育。有些法律教育是由律师事务所开展的一种法律职业教育，后来才出现专门的法学院把培养律师的工作接过来，成为正统的法学教育机构。在英国，律师的职业教育最初是由律师行会进行的。设立于14世纪之初的伦敦律师会馆（Inns of Court）颇能反映法律教育机构的行会性质。伦敦律师会馆在独揽律师资格授予权的同时，又对所有想要取得律师资格的人进行培训。只有经过伦敦律师会馆培训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律师资格。

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和美国，其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与法律职业关系密切，而不是单独脱离法律职业、与其不相关的一种法学教育。以美国哈佛法学院为例，这所法学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心之一，对解决很多世界性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长期以来，学生在哈佛法学院中接受着先进的、具有综合性的法律训练，这对于学生在其后的法律事务工作、商业贸易、公共服务和教学研究上





的成功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据说,哈佛法学院约有三万名毕业生活跃在各行各业,主要在法律和政治、经济领域。

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不论是在欧陆还是在英美,大学的法律教育除了中世纪罗马法教育暂时脱离法律职业外,一般情况下都是与法律职业相联系,法学教育是为法律职业服务的。

中国的情况如何?应该说,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基本上是为法律职业服务的,但是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缺憾:一是法学教育存在一种倾向,即法学教育成为法学理论的教育,这些法学理论往往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实在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二是法学教育过于偏重知识的灌输,缺少对能力的培养,不能满足法律职业的需要。我们现在如果讨论法律教育改革的问题,就一定要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基础,即法学教育应当与法律职业相关,为法律职业提供合格的人才。

第二个前提性问题是,作为一个法律教育工作者,你在考虑向学生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之前,你对法律的理解是什么?

由于对法律的理解不同,法律教育工作者在向学生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而这种不同将导致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会大为不同。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找到一种适当的法律观,然后再去探讨本文的正题,即法学教育的问题。

有的人把法律理解为一套理论学说,可以离开具体的事实场景而存在。他们不注重社会现实问题,而是在象牙塔里舒展自己的理论肌肉,陶醉于他人和自己的理论当中。还有的人把法律理解为先验的一套概念和规则,由一些法学家和立法者设计出来。这套概念和规则体系可以反映这些人的理想和价值,用以构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的理想社会图景;他们认为这种努力会是一劳永逸的,理想图景一旦建立,则祖国强盛,人民幸福。这是一种先验的、带有绝对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法律观。

对于如何认识法律,笔者提倡一种称为“实证-理性主义”的法律观,其基本内容包括:(1)不论是普通法体系,还是罗马法以及后来的所谓民法体系,法律首先具有很强的实证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具体问题和社会现实;(2)法律应该反映人类的理性的价值追求,但这种理性应以实证为基础,将法律规则提升到价值规范层次去考量,而不是脱离社会实践和事实情形,去构架乌托邦式的法律理想蓝图。所讨论的价值规范应当是多元的,对法律规则及其所涉及的价值规范的考量应基于特定的事实情形及社会和历史环境;(3)作为上述实证-理性的反映,法律规则的内容应具有概念、规范和结构以及整个法律体系所需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这将使法律获得一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某些法律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某种适度的法律形式主义是法律制度发展所必需的;(4)对于法律,我们要辩证地理解静止和变化、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没有任何两个案例是完全一样的。但也不能将辨异和变化的观点绝对化,否则会沦为法律上的不可知论。针对某些具体的事实情形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我们完全可以确立某种确定的法律规则和认识;但是从长远来说,法律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旧的判例不断被新的判例修改或取代;制定法也是如此。人类的法律制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就是在这种相对和绝对、静止和变化的认识过程中不断演化和发展。

## 二、法学教育的宗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回答了上述两个前提性问题后,笔者想探讨法学教育的三个问题,即法学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教什么以及如何教的问题。先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是法学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人才类型基本上可以按照职业来划分。目前中国社会中法律职业可以分为实务型法律职业和理论型法律职业。前者主要包括律师、公司内部法务人员以及法官、检察官等,后者主要包括法律教授、法律学者和研究人员。当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法律学者兼职做律师以及律师兼职法律学者等现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一词在本文中既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也包括法学院的专职教授和法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那些不隶属任何机构的、以法律研究为职业的研究人员。





一般说来,法律人才市场对实务型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更多一些,而对理论型法律职业的人才需求较少,因为前者更能解决具体和实际问题。例如,律师或公司法律顾问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律工作者必须能够解决其工作上的难题,而这并不是只有理论水平就能把工作做好的。我国缺少实务型法律职业人才的情况一直存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在1997年的粗略统计,到2000年我国需要至少30万律师、40万其他各类法律人才(包括法官、检察官、法律顾问、公证员、政府法律工作人员、仲裁员等)。就当时全国专职律师(约7万人)和法官等其他法律工作者的人数来说显得严重不足,而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缺口则更大。

相比之下,由于我国目前国家所属的法律院校和法律研究机构的职位有限,对理论型法律职业的人才需求十分有限。因此,如果我们的法学院培养出过多的、超出法律职业市场所需要的理论型法律职业的人才,就会导致某些多余的人找不到工作,除非他自愿地不隶属于任何机构而自己从事法律理论研究。

就从事理论型法律职业的人而言,也有不同类型。有些人只懂法学理论而没有法律实践,他们止步于理论而不愿或因其它原因不去进行法律实践,这样的人很难算作理论型法律职业中的真正人才。而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能够做到法律理论联系实际,法律理论不脱离法律实践。这种人才的成长过程在现实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先掌握一些法学理论,然后进行法律实践并在法律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法学理论。这就像是我下水游泳之前先看了一本如何学会游泳的书,然后跳到水里学习游泳,然后再回到岸上听游泳教练讲课。中国很多自本科开始就学习法学的法学院学生在饱读了大量的法律书籍后进入到社会从事各种法律职业,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径。这种路径使得法律学生先从理论上认识了法律,然后才去接触法律实践,然后再回到法学领域进行学术研究。

另一种路径是,有些人开始不是学法律的,例如本科是学英语专业或经济学的,本科毕业后可能还工作了一段时间,对社会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因某种原因转向法律专业,进入法学院学习,例如攻读美国的J.D.学位的课程或进入中国的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或法律双学位。这些人是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后逐渐对法律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往往是很坚固的,进入法学院接受J.D.或法律硕士学位的学习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和那些高中毕业考大学时选择法律本科专业学习的大学生比,这些人会对法律的理解更深,对法律学习的兴趣也可能更强烈,因此其学习的毅力也会更强。在接受了J.D.或法律硕士学位的学习后,有一些人进入律师界,从事法律执业;而其中一些醉心于法学研究的人则在短暂的律师生涯结束后回到法学领域,从事学术研究,成为一种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型法律职业人才。另外,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型法律职业人才还包括那些在大学里讲授法律、进行法律研究而同时在律所里兼职律师的人。

现实社会中,大部分学习法律的学生都是在毕业后进入法律实务界,成为实务型法律职业的人才(如律师、企业的法律顾问甚至包括与法律工作相关的国家公务员)。这些实务型法律职业人才构成法律人的主体,因为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所需要的更多是实务型法律职业人才,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实现法治理想的社会也不例外。律师队伍可以说是我们法律界的大部队或大军团。律师职业是为培养法官或法律教授甚至政治家输送高级法律人才的蓄水池。

考虑到现实对不同职业的法律人才的需要,我们的法学院应以培养何种职业类型法律人才为主呢?笔者认为,中国的法学院应该以培养实务型职业法律人才为主,以其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国法律职业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大部分是实务型的职业法律人才,即法学院毕业生大部分是做律师和其它实务型法律职业,而不是法律学者和法哲学家。其次,即使那些将来有志从事法学研究的人,最好也是先接受以实务型职业法学教育为基础的法学教育后有一些法律实践,然后再回到法律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美国法学院J.D.学位的法学教育是货真价实地讲授美国法律的、系统的法学教育,但由于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大部分去做律师,且较少设置纯理论的法律课程,因此有的中国学者会误以为美国法学院的J.D.







教育是律师从业性的职业教育。笔者认为,美国法学院的 J.D. 教育实际上是关于法律职业有关的知识 and 能力的综合法学教育。它既不是一味的律师从业性职业教育,也不是单纯的法律学术理论教育。各门法律课程均以培养学生直接分析判例为基础,学会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各种判例法规则和制定法。这种训练不仅对律师,而且对于法官、法律教授甚至法学家均为必需的。这种教育绝不等同于律师从业性的职业教育。因为,实际上一名 J.D. 毕业生到了律师事务所里还要经过很多实际业务锻炼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而律师事务所的一些合伙人往往会抱怨法学院没有教会这些毕业生更多的法律执业技巧。同时, J.D. 课程中对学生的理论素养和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修一门法理学(像中国法学院那样)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大量的判例分析,学会美国法官在审理每一个案件时所进行的“法理学”思维。事实证明,目前在新一代美国法官和法律教授中没有哪个不是 J.D. 出身,甚至一些从政的政治家和官员也是 J.D. 毕业。

笔者认为,法学教育中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都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因为知识是会过时的,需要不断更新,而能力一旦养成将使这些学生受益终生。笔者遗憾地看到,在一些中国的法学院里,老师仍然在向学生灌输大量的法学理论的知识,而疏于对学生法律运用和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不良的后果:第一,不能培养出满足我们法律人才市场上所需要的符合要求的实用型法律职业人才,造成一方面大批的法学院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而同时律师事务所找不到具备经验的、有能力的实用型法律职业人才。第二,我们法学院培养出来的所谓法律人才,往往只是熟记了一些法学理论知识,而不具备实际法律能力。如果他们毕业后不进入法律实践而是继续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他们将很难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型法律职业人才。笔者在和一些法学院的学生交谈中得知,大量的死记硬背使学生们失去对法律的兴趣。许多学生抱怨法学院只是教会他们记忆了许多知识,但是他们不具备任何法律能力来面对未来职业对他们的要求。他们甚至认为法学院有愧于他们,因为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在他们宝贵的大学时代被浪费了。

### 三、法学教育的内容:向学生教什么?

法学院应该向学生教些什么?换句话说,通过法学院的教育,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应具备何种素质和能力呢?笔者想强调的是,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法律人才,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应首先具备一种健康的价值观(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积极的人生观等)。如果一个人具备的是一种反动的、腐败的、邪恶的或封建专制的价值观,那么他掌握的知识越多且掌握的技能越大,则越可怕。这就像一个人在玩名为“拱猪”的扑克游戏时,如果他手里都是负分,然后拿到一个“变压器”梅花 10 时,他的负分就会加倍,反之亦然。

除价值观外,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还应该掌握各种与法律相关的知识。笔者在此想引用庞德(Roscoe Pound)的观点,即最好的法学教育是多维的教育(all-rounded education),要全面地吸收和学习各种知识,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及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不能只是局限于法律本身。实际上,法律本身是一门会触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学科。

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应该掌握各种与法律相关的知识。就一般知识而言,应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地理知识(可以因未来职业的关系而有所侧重)、历史(不仅仅是中学课本中所讲的那些,而应对中国和欧美的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历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中包括中国近 30 年来的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等)以及当前人类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石油、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等)。

如果法学院培养的是涉外经济法律人才,他的知识面还应该包括:中国的外贸和外商投资政策和业务知识、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经济分析模型和经济理论等)、国际金融和货币支付(包括信用证、国际货币结算和外汇管制),国际经济组织和条约(如 WTO 的规则和机制)等。他应该掌握一些数学和会计学的知识,以便能够看得懂会计财务报表并能计算一些金钱方面的数字。







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才，它一定具有他的母语（即汉语）的一些知识（包括文言文的一些知识和中国文学知识）。如果他从事的是涉外经济法律工作，他必须具备很高水平的英语知识（包括单词量、语法知识和许多固定的表达方式）。由于法律语言中包含一些拉丁语，因此他还不得不熟记一些法律拉丁语。如果他未来的法律职业是与英语国家以外的外国相关，如研究罗马法或与中东国家的客户进行交往，那么他可能还需要学习意大利语或阿拉伯语。

一个法律人才一定应当了解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如法律史知识（包括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法律制度、罗马法以及大陆法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英美法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历史上重要法学家的理论贡献）。这些知识是必须了解的背景性法律知识；但是法律学习并不意味着只是熟记这些背景性法律知识，因为法律学习还有更加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即法律技能的培养。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应具备各种与法律职业相关的能力。就与法律相关的知识和能力而言，一般来说，一个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能力。中国的法学院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他们偏重知识，而缺乏能力。

中国法学教育与美国法学教育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前者多是法律知识的记忆和积累，而后者侧重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法律思考的能力。有一部美国电影叫“The Paper Chase”。电影中 John Houseman 扮演的合同法教授 Prof. Kingsfield 在法学院合同法第一堂课上说，“You come in with a brain full of marsh, you leave thinking like a lawyer.” 这里所说的思维方式一般就是美国法学院普遍采用的所谓 IRAC，即问题（issue）、规则（rule）、适用（application）和结论（conclusion）。在美国法学院，教授不鼓励学生背诵法条、规则和判例，而是要学会如何分析问题，并像法律人那样去思考（think like a lawyer）。

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应该具备各种法律技能：观察和发现问题（spot the issues）、理解和作出判断、进行法律调研（legal research）、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等逻辑思考、法律适用并进行价值权衡，并最终作出结论，解决问题，而且有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口头和书面）。

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笔者在此文中将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分别列出。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当我们在讲授有关某个法律规则或判例规则的内容时，我们既是在传授这个“法律知识”，也是在教给学生一种法律分析和适用的能力。另外，二者相互密不可分的例子还有法理学。法理学既是在传授法律学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法学家的基本学术观点，也是在教会学生如何利用某些法学家的理论进行法律分析。

就法律领域而言，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应该具备和掌握下面这些法律领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1）民商法领域，包括民法、合同法、民事侵权法（torts）、财产法、公司法、所得税法、公司税法、国际税法、货币支付制度、版权法、证券法、担保交易（secured transactions）、破产法、遗嘱和继承、并购和重组、跨国贸易和投资；（2）宪法（在一个法治国家，宪法往往是法律制度的基石）、行政法、国际法以及刑法；（3）程序法，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以及证据法规则。上述这些法律领域的法律知识需要通过法律课程的合理设置来体现。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提及并进行讨论。

关于法学院毕业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会发现他们有的人强而有的人弱。那些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主要是在中学时代打的基础和大学时代的进一步培养和有意识的自己练习。为了培养法学院学生的语言能力，法学院应该开设法律写作（legal writing）课程。在美国的法学院里，这门课往往由英语语言专业或英美文学专业的老师来教授。另外，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会担任法学院法学评论（law review）的编辑，这种学生的一个评选标准就是看他或她的语言写作能力。

有些法学院开设的法律诊所（legal clinic）实际上最能锻炼一个法律学生的综合法律技能，其中包括观察和发现问题、理解和作出判断、进行法律调研和法律分析（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法律适用，并能最后得出结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各项法律技能。在法律诊所里，学生面对的是真实的客户和具体的法





律问题,在这里空洞的理论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另外,学生在暑期到律所实习除了勤工俭学和找工作的目的外,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机会来在实战中培养学生的综合法律技能。

作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应是那些既有完整知识结构同时又具备很强的法律能力的那些人,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很自然地,笔者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中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应该既教授知识也应该传授技能,而不能偏重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因此,在回答我们的法学院应该向学生教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从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出色的法律能力两方面去考虑。

基于上述的观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国的法学院一般设置下面三类课程: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即法律核心课程)以及法律专业方向课。在所有这些课程里,有的课程是必修课,有的是选修课。传统的14门法学本科核心课程包括如下内容:1.中国宪法、2.法理学、3.民法学、4.刑法学、5.民事诉讼法学、6.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7.刑事诉讼法、8.中国法制史、9.经济法概论、10.商法概论、11.知识产权法、12.国际法、13.国际私法、14.国际经济法概论。2007年,教育部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和“环境与资源法学”列为核心课程,这样法学本科核心课程达到16门。

现在我们把上述课程与美国法学院J.D.开设的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做个比较。这个比较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在美国法学院里,J.D.学生第一年学习的课程通常包括:宪法、合同法、财产法、侵权行为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律调研与法律写作(legal research and legal writing)等。在大部分学校中,上述课程都长达一个学年。在第二年和第三年里,学生可以选择选修课,但大多数学习其他的基础课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担保交易、破产法、证据法、税法、遗嘱和继承法、家庭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这些课程具有广泛性和专业性,毕业时,每一个学生都接触到广阔的法律知识,虽然他后来可能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法律工作。美国的法学院没有严格的专业之分,除非学生自己通过特别选修某些课程而有意识地区分专业的不同。大部分学生都是根据律师资格考试的要求和各自将来打算从事的工作领域来选修课程。如果想做公司律师就要选修公司法、证券法、货币支付制度(payment system)、担保交易、联邦所得税和公司税、破产法等方面的课程,想从政的话就要选修一些诸如行政法这样的课程。下面,笔者通过自己的感受简单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法学院开设的主要课程。

中国法学院和美国法学院都设宪法这门课,但是上过中国法学院的宪法课和美国法学院的宪法课的人会发现二者不论从内容和讲课方法相差甚远。美国宪法课虽然也讲宪法的条文,但是主要是通过美国宪政史的著名宪法判例来讲授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这些判例读起来并不枯燥,像是在学习美国的历史,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判例故事进一步理解美国的宪政精神(包括崇尚自由、民主、公平和平等等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的宪法课大都是讲授宪法的原则和概念,很少或几乎不讲案例。其实,由于中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不被作为法律依据(这是一种荒谬的法律观点),中国法律中一般不存在宪法案例。笔者的感觉是,美国法律的基石也是其最完美之处是美国的联邦宪法,一个外国学生在美国法学院如果不读美国宪法课,就不能说他对美国法律有真正的了解,也难以学习其他法律课程,如财产法、行政法和联邦法院这些课程。相比之下,中国宪法好像跟公民现实生活中的权利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公民的宪法权利被侵害的情况下,宪法不能作为法律依据被援引,也没有违宪诉讼程序提供法律救济。因此,中国的宪法只是停留在纸上的一部宪法。难怪学生会觉得这门课读起来枯燥而无益。

中国法学院开设的第二门法律核心课程是法理学。这门课列在中国法学院法律核心课程的第二位,足见其分量在中国法律课程中之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国法学教育重视法学理论的特点。相比之下,美国法学院中的必修课不包括法理学。即使作为选修课,也很少有学生会去读,除非有些学生未来是想做法学研究或从事法学教育。笔者认为,美国的J.D.课程中的必修课虽然不包括法理学,但是美国法学院使用的所有判例教材(casebooks)中的大量判例都蕴含了丰富的有关法理学中法律方法和价值论的思考,通过研读大量的判例来学习法理学再好不过了。在研究判例中学习法理学,尤其是法律方法的运用,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能力有不可替代的好处。对此,笔者将在下面详述。





中国法学院开设的另一个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是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知识性非常强,作为背景知识的储备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律能力没有太大的联系。美国法学院没有类似的课程,美国法律史的知识散见于其美国宪法、各门普通法课程的判例中法官对一些法律问题和规则的历史性回顾。笔者认为,关于法制史的学习,可以作为选修课或通过推荐课外阅读书让学生自学,这样也有助于学生在研读有关法制史的经典著作时学会独立思考,而不是被动地仅仅把法制史作为知识记忆下来。

有的中国法学院将民法课程分为5大课:民法总论、债与合同、侵权行为法、物权法、亲属法与继承法。除民法总论是必修外,其他课程根据不同的院系安排列为限选课,也是必须选的课程。现在有的法学院将民法改为民法(一)、民法(二)和民法(三)3个课程,均为必修课,在不同的学期授课。在美国法学院,由于法律体系不同,没有民法总论,而却有财产法、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torts)。这三门课在美国法学院均作为第一年的必修课,可以说是学习英美普通法的基础课。如果不修这三门课,一个人就不能说系统地了解英美普通法的主要内容,这三门课也是日后做律师或其他法律职业所应掌握的实务类课程。这三门课内容丰富,判例接近现实生活,使人学习起来兴趣盎然。

中国法学院和美国法学院均设民事诉讼法,并将其作为必修课。另外,由于在美国法学院毕业后律考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学生均修证据法(其内容不但包括联邦法院的证据规则,还包括所要考的州的证据规则)。中国内地的法学院将刑事诉讼法列为必修的法律核心课程,但是美国的法学院一般不把刑事诉讼法作为必修课,只有那些将来有志于做刑事诉讼业务的学生才会修这门课。仲裁这门课也是如此。

行政法在中国法学院是法律必修课,而在美国法学院这门课是选修课。美国的行政法似乎是其宪法课程的延伸。其主要包括行政部门在国会授权范围内制定规则(即 rule making,类似于中国的行政法规)和行政纠纷裁定(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类似于中国的行政复议)。对于一个中国学生而言,学习这门课十分有助于他了解美国行政部门是如何“依法治国”的。

笔者注意到,中国法学院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一起)单列出来,作为一门核心法律课程。可能是由于中国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的特点所致。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不论是民告民,还是民告官,均适用联邦法院或州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不存在一个单独的行政法庭受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非刑事案件中,不管是老百姓作被告,还是政府作被告,我们为什么不能适用统一的司法程序?把行政诉讼不论从程序规则还是法庭设置都单列出来是不是为了对老百姓的诉权和利益给予特别的保护?现实的情形果真如此吗?殊不知基于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民告官有多么困难。究其困难和挑战而言,笔者觉得将行政诉讼法分列出来也是好的,起码更容易被人们关注。从长远看,行政诉讼可能会孕育产生中国的违宪审查诉讼。我们的法官、律师以及法学家们在行政诉讼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成果将为我们建立未来的宪政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

中国法学院将商法概论和经济法概论作为法律核心课程来开设,由此可见中国法学教育对商法和经济法的重视程度。但是问题出在商法和经济法到底包括那些具体内容以及二者如何划分。中国法学院目前对于经济法和商法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且不统一,许多学者各有各的分类方法。对于二者的区别及其各自应该包括那些课程,很多法律教育工作者争论了很久,似乎始终没有一个定论。经济法的概念可能来自前苏联的法律学科分类,但是在英美法和大陆法体系中,“经济法”这个概念都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法律学科。这个概念把“经济关系”、“行政监管”和甚至带有一些计划经济色彩的特性引入到法律学科分类的标准中。其现实的结果是这种分类令人困惑。按照目前的划分方法,金融法恐怕比较难以确切划分,因为其具有政府监管方面的规定,似乎应该划为经济法,但是信用证付款和外汇支付的规则似乎属商法,而其中包括的国际货币组织方面的内容则应属国际法。

不论采用何种分类方法,商法和经济法一般包含如下的具体法律课程:公司法、证券法、担保法(在美国法学院称“担保交易”)、金融法(其中重要的内容是货币支付体系)、破产法、税法、保险法、信托法以及反垄断法。由于这里所包含的每一门具体法律课程都是自成体系的且内容丰富的,这些课程在美







国法学院里一般都是各自作为一门课来讲授的。但是在中国的法学院的一个学期,想在一门商法概论或经济法概论中面面俱到地覆盖所有上述具体法律课程那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实际上,这两门课仅仅能够作为概论来讲一些基本概念、原则和主要规则,同时由于老师缺乏这些课程的实务上的经验,很难把涉及到这些课程的具体实务性知识(而非理论性知识)和能力传授给学生。而这些正是从事商法业务的律师(business lawyer)所必需学习和掌握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某些中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里,商法概论作为核心课程有相应的选修课,例如商法分为商法(一)、商法(二)和商法(三)3个课程,包含了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破产法等。

中国法学院将知识产权法作为一门法律核心课程,而在美国法学院这门课程被分解为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三门课程,由学生根据自己未来的职业兴趣进行选修。其实,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有其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结构体系。由于版权法中有许多涉及艺术作品和音乐作品的版权纠纷,笔者在美国上法学院时出于兴趣选修了这门课。

关于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以及环境与资源法,中国法学院将其分别列为法律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在美国法学院一般不作为必修课,而是选修课,主要是基于有的学生毕业后的职业是否会涉及到这些课的内容。这里笔者想就国际经济法多说几句。这门课是中国法学院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涉外经济领域的法律的建立和发展创立的一门新兴法律课程。如果一定要找到美国法学院与此相对应的课程的话,有一门课叫做“跨国商事交易”(trans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这门课实际上是有关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法律,其中包括有关 GATT 和 WTO 的法律规则。笔者在美国上 J.D. 时选修了这门课,授课老师是一位美国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

#### 四、法学院的教学方法:如何教?

法学教育的方法问题一直是笔者关心的问题。由于笔者在中国的大学读的本科,上过中国的老师讲授的法律课,所以对中国的法学教育方法比较熟悉。中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方法主要是对法律条文的讲解和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具体来说,在中国的法学院里,老师一般是在课堂上进行灌输式的教学,学生的法律学习以记忆为主,具体体现为上课听讲和记笔记。学生们将老师根据讲义说的话记在自己的课堂笔记上,然后背下来应付考试,有些学习认真的学生会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中国法学院的老师似乎是在向学生讲授一种法律学科中的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其中包括大量的法律概念、原则及规则。这种教学方法是与这些老师对法律的理解分不开的。可以说,中国法学院中的许多老师把法律理解为一套理论学说,可以离开具体的事实场景而存在,他们不注重或者不屑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笔者认为,这种对法律的理解是荒谬的。法律其实是非常接近社会和生活的,因为法律规则的产生本身就来源于社会实践。具体而言,法律规则所关乎的某个问题的提出首先来源于社会生活;其次,法律规则在人类的实践中被归纳总结出来时也离不开社会生活,而总是基于某种社会环境;最后,关于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考量(如公平、自由和效率等)均应基于社会生活的某个具体场景,离开了具体的事实场景来空洞地讨论价值规范是没有任何结果和意义的。

在中国的法学院,法学教育的传统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正统的理论基础,传授固定的法律知识,对于具体的法律能力(如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得不到重视,法律思维方式主要是以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为主。在课堂上,没有老师与学生的互动,老师很少向学生发问,鼓励或启发学生们思考。实际上,有些老师并不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思考或见解,那些爱提出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可能会令这些老师厌恶。对于这种填鸭式的法律教学,中国法学院的学子们往往感到非常乏味,并往往使他们对法律产生一种误解,认为法律本身是令人乏味的。

笔者也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接受的以上述方法进行大学本科教育(其中包括我所修的一些法律课程)。我也是在对法律产生敬畏的同时感到法律课是令人乏味的。在我后来去了美国法学院读 J.D. 后,上述看法被彻底地予以改变。我发现,与在中国大学里讲授法律的方式不同,美国法学院的老师是从一个个







生动的判例入手,向学生讲解和分析法律规则。每个判例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都事关每个判例“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让你从真实的故事中探寻真理。在学习每个判例的过程中,你会理解美国法律规则产生、适用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即法官根据先例归纳出适用的法律原则、规则 and 标准,再基于遵循先例的原则运用到新的案件中。法官对先例的遵循不是盲目的,他会基于公平、效率等价值层面进行考量,选择是遵循或是修改甚至推翻某个先例。这是一种法律稳定性和进化性的完美结合。这是按照这样一种“实证-理性主义”的法律方法,美国的法律不断地健全并成为不同于英国法律的法律体系。

有些人以为英美法只是有大量的判例,而没有制定法。这是对美国法律的一种误解。美国法虽然是普通法系,但其存在大量的制定法。在很多领域,如涉及到《统一商法典》的合同纠纷和担保交易,还有证券发行和交易、破产案件、税法案件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要适用有关的法典或制定法。当然,美国法律中的法典与大陆法体系中的法典还是有区别的。尽管美国法律有大量的制定法,美国法律的灵魂仍然是普通法传统。许多被美国法院采纳的判例规则逐渐被吸纳进美国的制定法。因此,判例始终是美国制定法的一个补充。同时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美国制定法尽管制定得非常详细,仍然需要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大量判例进行补充,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得以填补,为下一轮制定法的修改提供实证经验。基于这一点,你会发现,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法律不是僵化的而是顺应时代不断发展的。

众所周知,美国法学教育的标志一直是判例教学法而不是直接授课法。美国法学院的老师往往在课堂上从一开始就讲判例,通过判例分析让学生学习法律。老师喜欢采用一种叫做“苏格拉底”式的判例教学法,基于案件的某个事实情形发问,探寻某个先例规则的合理性。老师会让你与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进行比较,进行辨析。有时老师会改变案件的某个关键事实,让你思考法律规则是否应该有所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你会逐渐认识到法律的规则是怎样产生的,它与相关的某种场景和事实是何种关系。法律的规则如何会有例外。在学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判例逐渐掌握了一些判例规则之后,他会了解到判例法到底是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注重的不是学生知识的灌输(尤其不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是与法律有关的能力的培养。正如美国法学院教授 Gerard Rault 所描述的,这种教学方法需要有学生的参与而不是老师单纯的讲授。在上课之前,根据老师的要求,学生应该预先阅读有关的真实案例,然后在课堂上老师就某个问题向学生发问。学生对一个问题的解答又构成了下一个问题,老师会改变一个问题的某个事实(成为一种假设的情形),要求学生进一步思考下个问题。教师就这样引导学生走近真理或一个固有的矛盾,这一矛盾本身又向学生表明了推理过程中的缺陷。单纯的课堂讲授对传统信息和知识很有用,但律师需要的是办案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弄明白法规、规章以及案例的能力,为客户的案情进行思考、推理和提出论点的能力。笔者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法学院读 J.D. 时,教授公司法的 Robert Hamilton 教授是美国公司法的一个权威,他就是利用上述方法不断向学生提问,一步步循循诱导,最终使学生完全理解公司法的许多规则。

毫无疑问,美国的判例法是由无数个具体的判例组成,这些判例来自法官们建立的各种先例。各种先例规则是基于先例所处的特定事实情形和社会现实而存在的,不是脱离特定事实情形和社会现实而存在的抽象法律原则。随着类似案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先例规则也反复在后来案件的事实情形(factual pattern)中被辨析,依据案件所处不同的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不断演变的价值观念对先例规则进行重新分析其在案件的现实情形中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从而决定是否维护先例规则,还是修正或推翻先例规则、建立一个新的先例。随后,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判例规则被纳入到制定法中,并以此在更大的范围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无数法律人(包括法学家、法官、制定法的立法者,以及律师)的努力,将各种判例规则和制定法规则进行整理和归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在上述教学过程中,老师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像律师那样去思考,同时启迪学生的心灵。对于案件中所争议的焦点问题,每个判例会先回顾适用于业经确立的判例规则,这种判例规则往往是从个案中逐步发展





起来并被确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从具体到一般的归纳推理的过程。这些确立的判例规则作为法律知识是需要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的,这种学习构成了法律学习的基础。这也是向学生传授“法律是什么”的过程。这种传授在性质和方法上均不同于中国法学院的知识传授,因为学生是在具体的判例(即具体的社会情形)中去理解和记忆这些确立的规则,而非凭空抽象地记忆这些规则。笔者在美国法学院修“公司法”(Corporate Tax)课时,教授这门课的 Thomas Evans 教授有过在一家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他就是通过讲解判例时结合具体交易中的实例将抽象的税法规则讲得非常清楚而生动。

在确定了先例规则后,学生还要学会将正在审理的案件的事实与先例中的相关事实进行辨异比较。如果相关事实相同,则按照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则,就应该适用该先例规则。当该判例规则被确定适用于正在审理的案件时,法官和律师的推理一般属演绎推理,即将一般原则或规则适用于事实并得出结论。在中国的法学院里,演绎推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否则法律分析将变成一个机械的推理过程。这一点也是许多中国的老师和学生认识不到的,因为法律规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笔者想说明的是,任何法律规则(不论是判例规则还是制定法中的规则)都不是绝对的,其原因基于以下几点。首先,任何规则都是基于相关的事实情形而建立的,而不是凭空存在的。有些规则所依赖的事实情形比较宽泛,这时法律规则适用的范围较宽,而有些规则所依据的事实情形比较窄,因此我们说这时的法律规则是一个基于特定事实的规则(fact-specific rule)或适用范围较窄的规则(narrow rule)。其次,由于规则所依赖的事实情形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事实要素,而是一组相关的事实要素,如果某个事实要素发生改变,则原先的某个规则就可能不再适用。最后一点,即使我们初步认定某个先例规则适用,由于任何规则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形,在某些情形下如果适用某个先例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这时,基于政策和价值规范的权衡考量,法官有可能将该种情形作为该先例规则的例外,甚至创立一个新的判例。

上述所描述的思维过程就是英美法制度下一个律师的完整的思维过程,其实也是英美法制度下法官和法学家的思维过程。而法学院所教授的就是这样去思考的能力。在美国的法学院,教授们也会根据授课需要,进行知识讲授(如讲解法条),但是这种教授还是在传授法律技能的大前提下进行的。笔者在美国上法学院一年级时,在民事诉讼法的第一堂课上, Samuel Issacharoff 教授对学生们说,你们在三年后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现在所学的许多判例规则和制定法的规定可能大部分都会过时而需要更新,因此对于你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记忆这些法律规则,而是需要学会从哪里寻找这些规则并如何适用这些规则。

老师在培养学生上述思维能力时会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例如通过提问形式,或让学生们就他们在预习中碰到的一些现实的法律问题的解决办法来进行讨论,有些教授甚或采用角色表演的方法。在其他一些法学院的课程中,如模拟上诉法庭、谈判、咨询等,在教授的指导下也能让学生参加实践,从而具备今后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记得笔者在美国上法学院第三年时选修了版权法,教授这门课的 Neil Netanel 教授在第一堂课上就拿着一台收录机给学生播放涉及到一起版权纠纷的两首曲子,让大家判断被告的曲子是否与原告的曲子雷同而涉嫌抄袭。这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会适用构成抄袭或侵犯他人版权的判断标准。

笔者想强调的是,美国法学院的教学非常注重法律背后的价值规范的分析。与中国法学院有所不同的是,这种价值规范的分析考量往往不是空泛谈论的,而是就某个法律规则基于具体的事实情形展开讨论的。笔者在美国法学院修“联邦所得税法”这门课时, Calvin Johnson 教授改变了笔者对税法的认识。他不但课讲得好,还经常发表有关美国税法文章。这门课在他那里不再是一堆美国 IRS 的税法规则和判例,而是基于社会财富如何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背景下,通过具体判例来考量税法规则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判例法蕴含着法官在创立某个判例规则时所考量的价值规范(诸如公平、正义和效益等),基于多元的价值规范,法官会决定某个先例是否被遵循、修改或推翻。你会发现,一个案件的判决往往就是写得十分漂亮的法哲学论文。这使得人们不禁感叹美国法官的法学素养和普通法的博大精深。在这样的





学习氛围中,学生对法律的感悟更加深刻,在使法律学子的法律能力得到培养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对法律所追求的理想价值更加向往。

### 五、法学院的未来:今后怎么做?

关于法学院未来的教育改革,我想,概括起来我们需要做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作为法学院的领导者和老师,我们应该首先明确法学院的存在主要是与法律职业相关的,法学院作为法学教育的机构主要职能是为法律职业培养人才,其中主要是实务型的法律人才(如律师、政府的法律官员、法官、检察官、公司法律顾问),而不是理论型的人才(如法律教授、学者和法哲学家)。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法学院的定位。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不难,只要我们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考虑到我国法律制度中法律职业人才的需要就不难做出这个判断。其实,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也未尝不如此。说得更重一些,这种定位是我国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需要,因为所有这些目标离不开一大批法律人才来使得我国的法律制度得以运转和发展。

其次,我们的法律老师自身应该对法律有一个新的认识。当然,我知道改变一个老师的法律观实际上很难,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这一点。法律绝不应该被理解为象牙塔里的一套理论学说,可以离开火热的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实和场景而作为一门学术存在,法律应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应该非常接近社会和生活。如果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只能高谈阔论的法学理论家,那么他们教出的学生往往和他们的老师相比不会有太大的进步,他们也无法投入到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为社会做出真正的贡献。

有了上述两个前提问题的合理解答,我们便可以着手考虑和解决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教什么以及如何教的问题。对于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的问题,笔者建议我们应该以培养实务型人才为主,即使有些学生将来有志于做学者,最好也应该受到实务型的法学教育,并在毕业后接触一定的法律实践,真正感悟到法律是什么,然后再回到法学院和法学研究机构从事法律学术研究。对于教什么的问题,笔者建议法学院在法律核心课程里尽量少讲授纯理论的内容,而应该增加实务内容更加丰富的课程。我们应该既传授法律知识,也应该传授与法律相关的各种能力。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是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能力的培养。

在如何教的问题上,笔者建议改变直接授课法这一单一模式,而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具备一定法律实践和能力的老师可以采用判例教学法来进行教学。除了告诉学生法律是什么(即传授法律知识)之外,还应教会学生们如何去思考,培养他们的法律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目前中国法学院的学生由于人数过多,实行判例教学法存在困难。中国目前法律专业迅速扩招,而现有的师资有限。据了解,有的学校的本科民法课通过由 150 人一起上课,且每周一次课。这样的授课规模与频率很难让所有学生都积极参与,因此老师灌输、学生记笔记成为了惯例。因此,改变这种教学方法还需要法学院控制好招生人数和学生与老师人数的合理比例。

以上是笔者对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和建议,希望对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领导和老师有一些启发和借鉴。如果本文中存在一些观点上的错误和偏激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大家可以对相关问题进一步讨论。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于北京

来源: 正来学堂 <http://dzl.ias.fudan.edu.cn/index.asp> 发布时间: 2009 年 03 月 08 日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9 年 3 月



第 1 期[总第二十五期]

**本期要目**

-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通知
- 周济：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塑造高峰体验 用优秀文化育人
- 学生管理归位 构建辅导员队伍新模式
- “学院”改名为“大学”的动力机制—以亨廷顿学院为例

政策  
法规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 2008 年度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的通知

教高函[200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财务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 号）精神，根据 2008 年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要求，经专家评审，现将 2008 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每个实验区资助总经费 50 万元，将分年度拨付（2008 年为 20 万元）。希望有关高等学校继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位创新，努力形成有利于多样化创新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2008 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名单（100 个）

| 序号 | 学校   | 负责人 | 项目名称              |
|----|------|-----|-------------------|
| 1  | 北京大学 | 李四龙 | 哲学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
| 2  | 北京大学 | 孙祁祥 | 培养世界一流经济学本科生教育实验区 |
| 3  | 清华大学 | 史宗恺 | 清华大学创业教育创新实验区     |
| 4  | 清华大学 | 孙家广 | 清华大学软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





|    |          |      |                                         |
|----|----------|------|-----------------------------------------|
| 5  | 清华大学     | 张荣庆  | 清华大学生物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
| 6  | 北京交通大学   | 查建中  | 国际化创业型工程与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  | 北京交通大学   | 卢 苇  | 精英型国际化软件工程师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  | 北京师范大学   | 张 健  | 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  | 北京师范大学   | 王英典  | 生物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0 | 北京师范大学   | 李 翀  | 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实验区                            |
| 11 | 中国政法大学   | 李树忠  | 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                           |
| 12 | 中央民族大学   | 文日焕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3 | 中央民族大学   | 苍 铭  | 历史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4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刘 舒  | 安全防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5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董青春  | 北航创业管理培训学院                              |
| 16 | 北京工业大学   | 侯义斌  | 北工大-Xilinx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方向）应用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7 | 首都医科大学   | 彭师奇  | 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实验区                            |
| 18 | 首都师范大学   | 刘新成  | 历史学科教学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9 | 南开大学     | 陈志强  | 研究—实践型历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0 | 南开大学     | 刘 方  | 生命科学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
| 21 | 燕山大学     | 赵永生  | 机械工程“学研产互动”与“做中学”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2 | 内蒙古大学    | 孟克吉雅 |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3 | 大连理工大学   | 李志义  | 立体化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4 | 大连理工大学   | 沈宏书  | 工程型软件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5 | 东北大学     | 朱志良  | 实用性高级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6 | 辽宁大学     | 林木西  |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7 | 吉林大学     | 李俊江  | 吉林大学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8 | 东北师范大学   | 王 确  | 文史哲复合型教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29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徐晓飞  | 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0 | 黑龙江大学    | 张政文  | 基于专业教育深化改革的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1 | 复旦大学     | 臧斌宇  | 国际化创新型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                       |
| 32 | 同济大学     | 周兴铭  | 国际化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3 | 上海交通大学   | 马德秀  |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创新创业大讲堂                     |
| 34 | 上海交通大学   | 傅育熙  | 基于 CDIO 的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5 | 上海交通大学   | 张雪洪  | 应用型、复合型生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6 | 华东理工大学   | 涂善东  | 基于 CSS0 的全程创业教育新模式                      |





|    |          |     |                                 |
|----|----------|-----|---------------------------------|
| 37 | 华东师范大学   | 余伟民 | 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8 | 华东师范大学   | 谭 帆 | 综合性中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39 | 上海财经大学   | 刘永章 | 财经人才创业教育创新实验区                   |
| 40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 俞光虹 | 本科大学生创业教育基地                     |
| 41 | 华东政法大学   | 朱榄叶 | 开放型国际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42 | 南京大学     | 陈道蓄 | 南京大学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43 | 南京大学     | 丁 帆 | 南京大学中文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44 | 南京大学     | 洪银兴 | 南京大学经济学人才培养集成创新模式实验区            |
| 45 | 东南大学     | 郑家茂 | 基于知行合一理念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验区            |
| 46 | 东南大学     | 邓建明 | 工程应用型软件人才培养实验区                  |
| 47 | 江南大学     | 张大良 | 江南大学创业教育实验区                     |
| 48 | 江南大学     | 陈 坚 | 生物工程专业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          |
| 49 | 中国药科大学   | 姚文兵 | 生物医药创业型人才培养实验区                  |
| 50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吴庆宪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教育实验区                 |
| 51 | 苏州大学     | 路建美 | 理工结合模式培养化学化工科技创业人才实验基地          |
| 52 | 南京师范大学   | 朱晓进 | 中文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53 | 南京财经大学   | 凌迎兵 | 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54 | 浙江大学     | 吴秀明 | 以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为依托的复合型创新性“大中文”人才培养实验区 |
| 55 | 浙江大学     | 何钦铭 | 工程型、国际化软件工程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
| 56 | 宁波大学     | 赵 伐 | “平台·模块·窗口”式大学生自主创业教导模式创新实验区     |
| 57 | 温州大学     | 林娟娟 | 创业型人才培养温州模式创新实验区                |
| 58 | 浙江万里学院   | 钱国英 | 基于合作性学习教学改革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59 | 厦门大学     | 董槐林 | 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0 | 福建师范大学   | 郑家建 |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基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1 | 福建师范大学   | 李建建 | 福建师大经济学基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2 | 江西财经大学   | 廖进球 | 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型人才“两层次”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3 | 山东大学     | 彭实戈 | 金融—数学跨学科交叉应用型人才实验区              |
| 64 | 中国海洋大学   | 温海深 | 水产养殖学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5 | 河南大学     | 耿明斋 | 自主学习型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6 | 武汉大学     | 陈 伟 | 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67 | 武汉大学     | 王建波 | 生命科学与技术复合型人才实验区                 |
| 68 | 武汉大学     | 曾国安 | 理论经济学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实验区           |
| 69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吴汉东 | 解纷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          |     |                                       |
|-----|----------|-----|---------------------------------------|
| 70  | 华中科技大学   | 骆清铭 | CDIO 型光电工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验区                 |
| 71  | 华中科技大学   | 周艳红 |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2  | 武汉理工大学   | 程森成 | 基于职业发展教育的全程化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3  | 华中农业大学   | 张启发 |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4  | 华中师范大学   | 彭南生 | 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5  | 中南大学     | 徐建军 | 中南大学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6  | 中南大学     | 陈启元 | 基于学生能力成熟度模型的软件人才 CDIO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7  | 中南大学     | 夏家辉 |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基因科学与技术产业化点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
| 78  | 湖南大学     | 陈 收 | 大学生创业型人才阶梯嵌入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79  | 湖南大学     | 林亚平 | 面向企业需求的“做中学”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0  | 湖南大学     | 刘辉煌 | 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
| 81  | 湖南师范大学   | 李育民 | “三结合”理念下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2  | 中山大学     | 朱孔军 | 中山大学本科生创业教育实验区                        |
| 83  | 中山大学     | 王金发 |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4  | 华南理工大学   | 韦 岗 |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业型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5  | 华南理工大学   | 闵华清 | 华南理工大学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6  | 广西大学     | 韦 化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复合型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基地           |
| 87  | 重庆大学     | 陈蜀宇 | 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8  | 西南大学     | 王小佳 | 农学类专业“顶岗实习支农”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89  | 西南政法大学   | 张玉敏 | 复合型知识产权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0  | 四川大学     | 陈 放 | 四川大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1  | 云南大学     | 李 彤 | 基于 CDIO 的国际化、工程化软件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
| 92  | 云南大学     | 叶 辉 |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3  | 西安交通大学   | 丘 进 | 创业教育基地                                |
| 94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龙建成 | 电子信息类大学生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5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陈 平 | 面向产业需求的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6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梁宗锁 |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97  | 陕西师范大学   | 李西建 | 国家文科基地（中文）创新实验区                       |
| 98  | 西北工业大学   | 周兴社 | 国际化工程型软件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
| 99  | 西北大学     | 陈 峰 | 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 100 | 兰州大学     | 王希隆 | 兰州大学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09 年 3 月 10 日







## 要闻要事

### 周济：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高校若不是净土，何谈社会？！中国高校领军人物发出的疾呼，在学术不端行为和剽窃事件时有发生

的当下，更具警示意味。

在3月15日这个强调“诚信”的日子，教育部召开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邀请多位高校校长和教育专家分析高校学风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去年，浙江大学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等人的论文剽窃事件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鉴于这一事件的影响十分广泛，学校在解除与贺海波的聘任合同后，最近又决定将其开除出教师队伍。

“这一事件给学校声誉带来严重影响，也警示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学术道德建设。”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说。

“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急功近利搞实惠的人越来越多。”放眼当下的中国高校，与会者不得不对类似的现象产生忧虑。

类似事件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学术不端的成因。教育部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就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而言，在大多数学科想取得一点成绩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目前与切身利益挂钩的硬性考核指标导致科研人员坐不住“冷板凳”。

教育部社科委主任吴树青说，学术不端行为与当前科研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效应、轻长期积累的取向有关。“必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在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看来，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利益驱动。近年来，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一些受聘者也为个人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毒化了“学术空气”。

“这些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科学研究可以给个人和学术机构带来利益。”杨玉良说：“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切断利益链。”

据了解，中国不少高校已开始构建学风监控和防范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制定学校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加强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教育等。

一些学校还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推出创新举措，如浙江大学向所有研究生导师明确提出“五不准”的学术规范原则，实施博士后人员与合作导师签署诚信公约的制度。北京大学完善了学位论文失范责任追究制度，并计划分学科设立学术规范课程，针对案例加强宣传教育。

“学风不正是科学的大敌，学术不端行为更是对科学的亵渎，危害十分巨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一旦发现，要及时果断、严肃处理，敢于下猛药，不得推诿和隐瞒。”

他指出，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是高等学校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要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工作体系，通过提高道德自律，加强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力量，使学者“不愿”、“不能”、“不敢”违背学术道德。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创新取决于学者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尊崇和执着——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风的一番话，代表着学术净土守护者的心声。

据悉，教育部正逐步将学术道德建设纳入高校课程，并将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





周济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作者：吴晶 余靖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 年 3 月 16 日

##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回应繁体字建议 法律说了算

“教育部得依法行政，语言文字有法。”针对“恢复繁体字”的建议，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 3 月 12 日作出回应。而多家重点高校校长认为，没必要恢复繁体字。

### 高校校长大多认为 没必要恢复繁体字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3 月 12 日上午举行“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专题采访，邀请教育部、国家汉办等有关负责人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章新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有语言文字的法律，应当依法办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简化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进步，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全民素质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法律办事，因为它是进步的。”

纪宝成指出，在孔子学院的教学中当然要使用简化字。繁体字是一种历史，现实当中，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在书法、艺术上可以写繁体字。在某些专业研究上，比如研究中国的古代史、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研究人员确实需要懂得繁体字，而且应该精通书写。有一些专业人士是需要的。在国外，汉学家也是一样，如果研究汉文化的，他肯定要懂得繁体字。

纪宝成强调，但是从象牙塔走到市场的时候，简体字要方便得多、好得多。所以还应该继续推广使用简体字，依法推广使用简化字。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则指出，繁体字和简体字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从它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是不是有利于人民幸福的角度考虑问题。

### 孔子学院发展太快 师资质量尚未跟上

章新胜在会上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他说，目前，全世界已有 81 个国家建立了 256 所孔子学院和 58 所孔子课堂，世界著名大学中有 44 所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此外，还有 40 多个国家 150 多个学校和机构目前已经提出申请设立孔子学院。

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关注的“孔子学院发展太快以及投资大”问题，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解释，2005 年的时候说希望在 3 年之内，孔子学院能够在全球达到共有 100 所，但世界汉语大会开过之后，全世界有 100 多个国家纷纷提出要办孔子学院，比如说德国，本来想办 4 个，现在数字还在涨，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不能太快。

根据原来既定的目标，2010 年应该是达到 500 所，可是现在我们想还是应该首先强调质量。我们的教材、教师还是不太适应外国的需求，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作者：薛冰 朱小勇 黎詠芝 来源：《信息时报》2009 年 3 月 13 日





## 校长 著述

###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塑造高峰体验 用优秀文化育人

**摘要：**文章阐述了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要用优秀文化培育人才，而塑造高峰体验是大学文化育人的有效切入点。为了落实这项具有高度战略性的工作，必须有完备的工作体制、持久的政策支持和充足的投入。文章还介绍了东南大学的实践情况。

**关键词：**优秀文化，人才培养，高峰体验

#### 一、文化育人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特性

大学的人才培养是一个教育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培养适应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是时代赋予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崇高使命。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具有教育与文化的双重特性。首先，现代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承载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使命。同时，大学又是一个文化机构，它承载着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使命。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大学培育人才的方式必然是以文化育人。所谓以文化育人，就是大学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的过程中，利用自身的文化实力和文化氛围，使学生养成学识，发展智慧，提高综合素质，提升人生境界，从而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大学文化是包含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价值追求、大学制度和大学环境等在内的一切文化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有机联系组合，构成这所大学的校园文化生态，潜移默化地化育身处其中的学子。我们认为，文化实力是大学实力的重要方面和基础力量，大学教育教学力量的强弱，最终取决于这所大学的文化实力。大学的校园文化生态与大学生之间犹如水和鱼的关系，在健康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态中，优秀人才的培养无需刻意为之，而是可以自然养成。因而，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树立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实施文化兴校战略，实现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

大学以文化育人手段的特质决定，以培养优秀人才为目标大学文化，必然而且必须是一种优秀文化。优秀的大学文化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它是追求真理的文化。大学以传承、发展和创新知识为己任。大学发展知识、创造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是探求未知世界、求证事物本质的过程，是历尽艰辛、追求真理的过程。其次，它是尊重科学的文化。它拒绝一切思想观念的禁锢与束缚，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它始终强调人格与精神的独立，崇尚学术自由和理性思考，在开放的环境中探索新知，发展科学。再次，它是崇尚理性的文化。优秀的大学文化崇尚严谨、逻辑、理性、实证和脚踏实地，鄙视浅薄、浮躁、虚假、庸俗、急功近利和随波逐流。正是这种经得住历史和实践考验的优秀文化，使大学完成培育优秀人才这一重要使命成为可能。

在优秀人才的培育中，大学要注重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培育，牢牢把握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优秀的人才在服务社会中引领社会前进。大学要注重科学精神的培育，要从外在的科学知识传授向内在的科学精神培育转变，引导学生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大学还要强化学生创新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养成创新的勇气、实事求是的品格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大学要注重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培养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注重学生心灵境界的提升，培养学生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念，在创新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体验自身的价值。







大学以优秀文化育人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优秀的大学文化通过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育人才。优秀的大学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校园文化，它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突出地位，把教育与人的自由、尊严、幸福、终极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它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能够最有效地会聚优质教育资源，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调动人的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它能够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升华人的心灵境界，从而成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第二，优秀的大学文化通过提升学校文化品位和文化格调培育优秀人才。优秀的大学文化是注重创新的校园文化，它能够在建设的内容、方式、机制上不断推陈出新，通过文化整合资源，利用文化激励创新，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能够不断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格调，赋予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校园生活以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大学更具有活力，更富于魅力，从而影响身处其中的学子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第三，优秀的大学文化通过发展大学特色影响学生养成独特的精神气质。大学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文化，文化是大学的软实力。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学独特的校园文化生态，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学生养成与校园文化相适配、相呼应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所以说，大学的文化特色造就了其学生的个性特质，大学个性化的文化生态养育成了学生独特的精、气、神，这就是大学文化育人的神奇之处。

## 二、塑造高峰体验是大学文化育人的有效契入点

塑造高峰体验，以优秀文化育人，是东南大学十余年来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探索出来的理念。我们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教育思想结合，运用于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和校园文化生态建设，以此带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丰富和发展了学校人才培养“重基础、重实践、重素质”的传统。

所谓高峰体验，就是在大学教育中努力创造条件，使学生在接触大师、接触优秀文化成果、参与创新性学术活动等实践中，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获得心灵境界升华，激发创造潜能的一种情感体验。我们为学生塑造高峰体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开展创新实践，创造性地探索新知，在体验成功的愉悦与失败的痛苦中树立信心、自强不息、超越过去、超越自我，追求卓越，达到个人成长道路的相对高峰。二是学校创造条件，让学生与学术大师接触和交流，深入经典，接触高深学问，从而产生心灵的震撼，启迪智慧发展，获得高峰体验。

塑造高峰体验，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才成长提供远大的目标。它一方面注重使学生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锻炼和发展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在悟道式的高峰体验中树立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和健全的人格。这种教育观念体现了“日新其学，日新其德；先成人，后成才”和培育健全人格的教育目的，从而达到“先立其本，本立而道生；先提升境界，有境界自成高格”的教育效果。

塑造高峰体验，对大学的文化氛围、知识生态和文化载体建设提出了要求。

第一，塑造高峰体验，要求大学用优秀文化唤醒学生成长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感召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培养其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让他们在大学文化的理性激情之中明辨是非。要求大学营造浓厚健康的学术气氛，来熏陶和感染大学生。要求大学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支持激励学生创新实践，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挖掘他们的学术潜力。

第二，塑造高峰体验，要求大学为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宽厚的知识基础和健全的人格是塑造高峰体验的先决条件。人类的全部知识是包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在内的有机联系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结构我们用“六理”即物理、法理、心理、伦理、艺理、哲理来概括。构建完善知识结构的过程，就是使这“六理”统合。所谓“六理”统合，落实到教育教学，就是通过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培养学生格物致知、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通过法理等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培养学生经世致用、担当责任的人文精神；通过心理、伦理、艺理教育增强学生的内在修养，提升其审美和人生境界。最终通过哲理教育，使真、善、美合一，使学生的人格日臻完善。







第三,塑造高峰体验,要求大学不断会聚和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塑造高峰体验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条件使学生立于文化高峰之上。这就对教育资源的品质提出了高标准和高要求。在当前学术大师、优势学科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塑造高峰体验的教育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探索有效的途径突破这种限制。“内合外联”是突破这种局限的有效方式,即通过内部整合、集成,使校内教育资源优化升级;通过对外引进、联合,吸引校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所用。通过“内合外联”,大学不断会聚优秀文化资源,为优秀人才培养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第四,塑造高峰体验,要求大学建设高水平的文化载体和实践平台。要使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全面提升,必须借助各类创新和实践平台。我们认为,应侧重以科学技术实践、社会实践、人文与精神实践等三大类平台的建设来推动教育和教学创新。通过科学技术实践平台的构建,使学生养成超凡的学术目光、深刻的思维方法和独立的精神品格。通过社会活动与社会实践平台建设,使学生养成责任意识、济世情怀和博爱精神。通过加强高层次的精神和人文实践平台建设,鼓励学生涵养良知,扩展知识,提升境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有效提升,个性获得和谐发展。

### 三、完备的工作体制和充足的投入是优秀文化育人的重要保障

(1) 建设完备的工作机制,为优秀文化育人提供强大的文化合力。如果缺乏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支持,再优秀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思想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塑造高峰体验,以优秀文化育人的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落实,需要构建完备的工作体制予以保障。首先,领导机制的建设是关键因素。它负责学校优秀文化育人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学校高层领导对优秀文化育人领导机构的参与度体现了学校对优秀文化育人的重视程度,会关键性地影响到学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会聚能力。其次,必须加强咨询机构的建设。视野的高度往往决定事业发展高度。咨询机构成员的学术境界、资历和教育见地,会对一所大学以优秀文化育人认识水平和高度起决定性影响。咨询机构的成员应该由校内外著名学者、教育家或学术大师担任,对优秀文化育人和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建议和指导,并作理论总结和探索。再次,需要探索学校内部门和院系间的协调机制,构建优良的校园文化生态。以优秀文化育人,是涉及全校各相关部门和院系的综合文化工程。这要求学校在纵的方面形成教学线、学生线、管理线三线形成合力,横的方面院、系间资源共享、学科形成,使校内优秀文化育人的力量和谐共进,造成方向一致的文化影响力,从而实现培养优秀人才的根本目标。

(2) 持久的政策支持和充足的投入,为优秀文化育人提供坚实后盾。塑造高峰体验,以优秀文化育人是一个长期投入、高投入和长期回报、优质产出的过程,其教育效果无形,却又影响深远。这对优质教育资源、高水平的文化载体和实践平台的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大学领导人而言,需要具备长远的教育眼光,对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以优秀文化育人,给予持久的政策支持、充足的经费保障和投入支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就是要在政策制定上,从教学内容、课程建设、队伍建设、学生考核等多方面促进人文与科学的融合,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的会聚。在硬件上,加强对优秀文化育人的场地和设备支持以及经费投入,在工作体制、人员上随着事业发展的需要随之增加适配。只有这样,才能把以优秀文化育人作为事业来发展,才能通过高端教育平台来操作执行。才能收获以优秀文化育人的无用之大用和淡泊之大利。

(3) 充实和完善专门机构的建设,为优秀文化育人提供核心基地。营造高峰体验,以优秀文化育人,必须有专门的机构承担。我国许多高校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素质教育机构,或命名为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或为通识教育中心,在综合协调、会聚优质教育资源,以优秀的文化育人等方面存在着功能的一致性。以优秀文化育人,必须加强和完善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或通识教育中心的建设,为优秀文化育人提供有力的具体办事机构和协调优质资源的枢纽机构。并通过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设,对以优秀文化培养创新人才进行探索。这一机构要有效地沟通校内各部门与院系的联系,使优质文化教育资源有效会聚。要有效地将院系的优质文化资源集中和提升到全校层面,并将外来的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影响有效施之于基层院系的学生。要通过加强专职与兼职工作班子的建设和工作平台的建设,吸引更多的师生参与其中,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学校的文化品位,实现以优秀文化育人的目标。





#### 四、东南大学以优秀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

(1) 构建了完备工作体系,推动以优秀文化育人。学校依托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构建了完备的工作体系,形成了“学校统一领导、规划部署,专家决策咨询,各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各院系共同配合,文化素质教育中心协调联络、具体实施,广大学生积极参与”的高效的组织体系。颁布出台了《东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决定》等相关文件。成立了由校长挂帅的基地文化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协调校内各部门、各院系的合作,在相关政策和经费上给予充分支持和保证。同时聘请校内外著名学者教授组成文化素质教育专家组,指导和推动基地的工作。成立专门的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为基地的具体办事机构。基地建立了一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工作班子,并广泛吸收学生社团开展工作,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2) 通过优秀课程体系建设塑造高峰体验。课程教学是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最重要的渠道。首先,学校坚持建设精品主干课程。通过集成学科和师资力量,组织、动员教学名师开设高质量课程,制作优质课件,编写优质教材,先后建设了包含“大学语文”,“唐宋诗词鉴赏”(国家级精品课程)、“文科物理”(省级精品课程)等在内的多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其次是坚持建设精品人文选修课。学校积极鼓励本校著名学者,邀请校外著名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包含数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在内的选修课,并将精品人文选修课全程摄像与录音编辑整理,结集出版。再次,学校积极推进经典教育,使学生接触经典文化,以丰富学养,开启智慧。学校开设了涉及文、史、哲、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原典导读”课程,如“西方哲学原著导读”,“中国古典文学原著选读”、“论语导读”等,建立“原典、老师、学生”三者互动的经典导读模式,启发和激励学生在阅读原典中,直接进入高深学问的领域。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倡导实施经典阅读,并建设了“经典导读”网站,构建了广义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群,形成了结构合理、品质优越的文化教育资源系统。

(3) 通过高端讲座文化建设塑造高峰体验。开设高水平讲座是使学生了解学科前沿和体验高尚人格的重要途径。学校通过邀请学术大师、著名学者来学校举办讲座,使学生与人类高端文化建立联系。为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学校首先加大了系统的高水平讲座平台建设,对演讲板块与系列进行了设计与开发,开设了华英文化、科学与人生、泰戈尔文学讲座、柳诒徵史学、宗白华艺术等系列讲座。合理的讲座板块设计有效,突破了学科结构的局限,开拓了学生的文化视野。自1999年以来,学校开展高水平人文讲座1200余场,合计听众30万人次。费孝通、钱伟长、杨振宁、丁肇中、金耀基、许倬云等数百位名家大师登坛讲学,广大学生从大师身上获得了“高峰体验”,开阔了学术眼界,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学校对高水平的讲座进行价值开发和文化设计。学校专门建设了富有人文气息的讲座报告厅,设计了具有学校特色的讲座礼仪,通过环境育人、氛围育人、细节育人,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水平讲座的价值和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校园讲座文化,对高峰体验的塑造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4) 通过开展优秀的文化实践活动塑造高峰体验。文化实践活动是促使学生实现从知识向能力和素质转化的重要渠道。在文化活动方面,学校构建了以“文化名人进校园”、“高雅艺术进校园”、“高层次大型活动”、“高层次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高峰文化活动的平台。以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以重大的科技比赛引领学生创新创业,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十余年来,学校坚持不懈地开展优秀校园文化活动,百余位文化名人走进校园,举办了数百场高雅艺术精品活动以及高品位大型文化活动。这些高端文化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学生在参与这些文化实践活动中,审美视野、精神品格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我校学生在各类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两次捧得“挑战杯”的高校之一。可以说,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学校持续不断地开展高端文化活动存在着必然关系。

在东南大学,通过塑造高峰体验、以优秀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带动了包含大学精神层、制度层、物质层等各个层面的文化建设,在人才培养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的进一步深入推进,这种塑造高峰体验、以优秀文化培育人的教育教学模式,将为我国大学教育尤其是文化素质教育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东南大学校长 易红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2期

思想

政治

教育

## 学生管理归位 构建辅导员队伍新模式

探索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水平精、工作能力强、可持续发展的学生辅导员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长期以来,北京邮电大学是以二级单位为运行核心,辅导员队伍也就势依托二级单位而建设。由于学院的分割,各学院的辅导员之间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导致辅导员不能跨院流动,使得辅导员因工作重复性强而无法长久地固定在这个岗位上;由于学院的相对独立,辅导员少的学院显得管理群体气势不够,出现问题招架起来比较吃力;由于学院之间的创收能力不同,导致同样是辅导员的岗位在不同的学院收入不尽相同;由于各学院专业辅导员(如心理咨询师)分布不匀,导致专业辅导员作为紧缺资源而利用率不够。以上种种缺憾,使得我们下决心对辅导员队伍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经过充分调研,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我们开始了“学生管理工作归位”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建设“五四三二一”型学生辅导员队伍,确保这支队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梯队。

### 一、“五四三二一”型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

#### 1. “五统一”管理局面

一是统一管理,明确责任。将全校一线专职辅导员全部集中到校学生工作部管理,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使他们从学院繁杂的工作内容和状态中脱离出来,专心于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学院将原承担的责任归位到学校,由学校负责专职辅导员队伍的规划、选聘、培训、指导和考核。二是统一办公,加强交流。学校为专职辅导员安排了集中的办公场地,并将之定义为辅导员工作基地,从而形成了管理群体的气势。学生工作部设立多个辅导员管理科,打破学院界限,将辅导员分散到各科,促进辅导员在学生工作方面的日常交流。三是统一工资,注重绩效。学校在实现统一管理后,改革了过去因不同学院的辅导员工资差异较大的弊端,统一了专职辅导员基本工资待遇,并进一步设立了辅导员岗位津贴补贴,与辅导员日常工作的绩效考核挂钩,由学校、学院共同对辅导员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后发放。四是统一委派,个性化管理。学生工作部根据辅导员工作经验和教育背景的不同,结合学院实际,将辅导员以统一委派岗位的形式分配到各学院工作,期间专职辅导员在学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五是统一考核,调动积极性。辅导员工作由学生工作部统一考核,在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中以匿名形式网上在线进行,由自我评议、学生评议、辅导员互评、学院评议、学校评议五部分组成,方便辅导员之间相互比较,同时将考核结果与职务聘任、奖惩、晋级挂钩,充分调动了辅导员日常工作的积极性。

#### 2. “四化”辅导员队伍

专业化培养。2008年,我们建立了辅导员培训基地和学生事务研究基地,为辅导员素质培养搭建4个平台。一是课程平台,研究设立了政治素质与专业素质结合、基础理论与工作技能结合、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结合的培训课程体系;二是进修平台,学校设立一定数量的辅导员研究培训专项经费,每年输送一定数量的优秀辅导员进行硕士学位、博士课程班进修,取得职业生涯规划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证书,建立三个方向的专业化辅导员:职业发展教育专业化辅导员(职业咨询师)、心理辅导专业化辅导员、生活园







区住楼辅导员；三是交流平台，每年组织辅导员骨干到国内外学习考察；四是科研平台，设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题，组织辅导员开展研究，同时结合自身工作积极申报思想政治教育或党建研究课题，承担一定的科研工作。

**职业化发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最根本的出路是进行专业化建设，催生职业化队伍，向专家型发展。我们力争为辅导员提供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环境和支撑体系，鼓励辅导员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学生事务管理等发展道路，积极打造职业化辅导员队伍。即不仅研究辅导员的“出路”，更着力研究如何增强辅导员岗位的职业吸引力，如何增强辅导员工作的事业感、成就感，如何构建辅导员职业的人生价值实现模式。逐步完善激励辅导员“岗位成才”、“岗位发展”、“岗位奉献”，建立辅导员考核、奖惩、晋升的一系列长效机制，强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职业性。从人才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立辅导员职业化机制，使之成为光荣的终身职业，吸引一大批优秀人才成长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动态化轮换。**根据工作需要，一是专职辅导员可进行岗位轮换，实行不同学院间的阶段性流动以及学生工作部管理岗和辅导员之间的岗位性流动，使广大辅导员通过接触新的工作岗位、环境和内容，不断挑战自我，避免职业疲劳，保证辅导员队伍的开拓创新能力和良性发展态势。二是构建校内外“立交桥”。在校内，我们制订各种政策，为部分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学术造诣的辅导员转入教学、科研岗位创造条件，把一些既有政策水平、又有管理能力的优秀辅导员，列为党政后备干部。对校外，我们与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委等联手，在辅导员流动的瓶颈上“聚焦”，达成共识，构建辅导员与公务员、社会工作者、职业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等岗位的“立交桥”，为辅导员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广阔空间。

**集团化作战。**实行专职辅导员一人多种角色、一班多人协助的管理模式。每一个班均设置责任管理、协助管理、支持管理等辅导员岗位，一旦发现问题，辅导员可群策群力，迅速反应，拿出合理解决办法，迅速采取有效手段，及时解决危机问题。目前，学校已经形成了覆盖各二级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学生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指导等三支专职辅导员队伍，弥补过去单一群体管理中辅导员一个人“包打天下”，思想工作难以做深做细做实的不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学生个体覆盖。

### 3. 三个角色定位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不断拓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辅导员只有正确明晰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从认知、情感和价值观三方面确立起工作的热情，寻找到工作的动力，并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逐渐掌握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权，为此，专职辅导员既要有“行政管理角色”，又要有“教师角色”，还要有“服务者的角色”。

**“行政管理角色”**，即一边从事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以学生发展指导为主体、以学生事务管理为基础的行政工作，扮演政治上的“指路人”角色。这里的“指路人”意味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心灵之间的交流，从而引发一种基于需求的感情之间的共鸣，让学生从心里体会到这种指路作用。

**“教师角色”**，即结合辅导员自身专业和特长，依托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就业指导中心从事相关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使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有效互动，切实增强学生工作实效性。学生辅导员一旦能够承担教学，既可以在自身发展方面找到更好的机会，又便于让学生更容易地认可自己。从实践效果来看，辅导员上讲台就更容易在学生中赢得共鸣，其职业态度、学习态度、社会态度，都会成为学生的榜样。

**“服务者的角色”**，即做好学生与管理部门的桥梁，注重为学生分忧、解难和服务。要本着服务的理念，切实做到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解学生之所忧。辅导员要及时把握社会的需要，了解、掌握乃至控制大学生的群体情绪，了解不同学生的不同心理需求，掌握大学生心理疾患的表现、成因和处理方法，努力成为大学生情感上的朋友，引导他们以积极、开放、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待学习、生活及恋爱，成为生活的强者。







#### 4. “双结合”发展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而受编制限制,各高校都不可能给予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足够的编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编制不受限制,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也无法完全承担起全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任。因此,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既要重视专职队伍的建设,又要重视兼职队伍的建设,要做到专兼结合,把那些善于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又乐于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吸收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来,共同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校按照“专兼职结合”和“长短期结合”的“双结合”发展模式,以专职为核心、为种子,以兼职为补充、为呼应;以长期为灵魂、为牵头,以短期为新鲜血液、为活力所在;在合理流动基础上,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合理的队伍结构,成为有效的工作力量。要建设好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优化结构是关键。一是从本校免试推荐的硕士生、博士生中择优选聘专职辅导员,专职从事辅导员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攻读研究生。同时尽量丰富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的来源。择优选择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也从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奉献精神强的青年教师中选聘兼职辅导员、班主任。为鼓励青年教师兼职辅导员、班主任,规定青年教师在晋升高级职称或职务前,必须担任两年以上的辅导员、班主任,同时对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的青年教师在岗位聘任、工资津贴等方面提高相应待遇。

作为辅导员除了要承担学生日常管理、思想教育等传统工作外,还应该掌握大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和创新技能培养等新的工作内容。这也就要求,一方面要对专职辅导员加强培训,使辅导员对这些新工作有所了解并能熟练掌握;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兼职辅导员构成,通过邀请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专家担任兼职辅导员,让他们向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服务。

#### 5. 围绕“一条主线”

即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做好学生的成长成才为主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加强队伍建设为重点,实施“抓班风、促学风、塑校风”,充分发挥学生工作的教育、管理、服务三项职能,遵循“博学、务实、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构建学生工作的教育平台、创新平台、帮扶平台、就业平台、培养平台、实践平台,全面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把“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口号落到实处,为构建和谐校园做贡献。

我们将具体通过完善“四个体系”来落实“学生的成长成才”这一主线。首先,完善全员育人体系,要努力营造氛围,整合所有资源,紧扣每一个环节,形成教育培养学生的合力;其次,完善学生思想教育引导体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思想动态,以提高学生理想抱负水平为抓手,紧密结合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推进学生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载体、形式、阵地的创新,增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再次,完善学生素质培养与拓展体系,让每一位学生在大学期间都有机会参与各类主题活动,我们将扩大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的组织和覆盖面,充分发挥学生班级、团支部、学生寝室等基层组织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细胞”作用;最后,完善学生成长成才援助体系,满足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愿望和成才需求,我们将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出发,在学风建设、心理健康教育、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下功夫,重点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心理障碍、校外住宿和延长学制等学生群体,努力构建起帮助学生成长、解决学生困难、方便学生办事的长效服务机制。

### 二、新模式带给辅导员队伍的新课题

新模式运行以来,给辅导员队伍带来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影响。如:将辅导员队伍建设由以学院为主分散管理的机制,转变为以学校为主进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便于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了上传下达的层级,强化了与学生沟通的力度;增强辅导员队伍的联动能力,通过明确职责分工和建立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在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时,做到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实现险情预警、集体参与、快速反应、应急处理的整体联动;形成辅导员队伍的强势团体,通过专业化培养形成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





生涯规划、学生事务管理等专业团队,形成辅导员队伍集团化作战的强大合力。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辅导员由学院划归学生工作部后,面对的是全校的学生管理和教育,思考的是全校整体工作的部署,掌握的是学校政策执行中效果反馈的第一手资料,处理的是统一政策在不同班级、不同专业学生中的利益平衡,拓宽了辅导员的视野,提升了辅导员的政治觉悟。但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必须认真对待和面对的问题。

一是校院两级学生工作机制的相互协调。辅导员统一管理后,弱化了各学院对于辅导员和学生管理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学院在辅导员培养管理上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所降低,容易将所有与学生相关工作都直接提交学校解决。同时辅导员委派到学院工作后,往往处于夹心层,扮演两头为难的角色,在工作中就会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必须搞好两级领导体制间的协调与合作,为辅导员工作提供顺畅、和谐的工作氛围。需要进一步调动各学院辅导员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充分体现各学院辅导员培养的特色,加强各学院对辅导员主人翁意识管理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激发各学院在辅导员管理工作中的潜能和活力。

二是个人情感归属和动态委派模式之间的磨合。管理归位前,辅导员从属于不同的学院,大部分已经在学院工作生活了几年,有些是带有倾向性求职到学院的,学院的文化气息和人文关怀往往和辅导员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另外,辅导员在担当“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的过程中,也势必与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因此,在工作岗位动态委派中,如何将工作需要与个人意向达成一致,让辅导员能够快乐兴奋地接受新的工作对象和人文环境,也是在委派前所必须思考和关注的。

三是集中管理与创新思想、品牌创立之间的权衡。以往的思想教育和学生活动中,辅导员往往都依托本学院专业和学术背景,开展具有浓郁学院特色的工作。学生工作部大家庭的建立淡化了学院概念,树立的是学生工作整体意识。因此,传统、品牌、特色、创新等意识的重新树立和权衡,是辅导员所应该面对和积极思考的。目前,以优秀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中遴选出来的后备队伍为“塔座”、以现有专兼职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塔身”、以职业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为“塔尖”的“金字塔形”的辅导员梯队已逐渐形成。按照工作职能选拔配备党团建设、心理辅导、职业发展指导、学生事务等专业辅导员的“矩阵式”结构日臻成熟,实现了取长补短,达到了最优组合。今后,在辅导员队伍建设上还要拓展更加开阔的来源,在“宽”上下工夫;制定更加科学的准入标准,在“严”上下工夫;构建更加规范的管理体系,在“实”上下工夫;探索德育队伍的整体优化,在“高”上下工夫,尽量汲取一切有利于提升辅导员工作水平的积极因素。

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的改革和探索,对全体学生工作队伍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研究、去探讨、去实践,需要冷静思考,理顺各种关系,加强学生工作的实践性探索,使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改革措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创新性强的研究型辅导员队伍,更好地为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服务。

作者: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方滨兴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3/4期



## “学院”改名为“大学”的动力机制 ——以美国亨廷顿学院为例

**摘要:**透过亨廷顿学院改名为“亨廷顿大学”的案例,可以看到,随着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后大众化阶段发展,高等教育机构自身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学院改名体现了外部环境对学院的合法性要求,也





体现了学院为获得和保持足够的资源以解决外部需求问题,不得不追求大学身份的符号意义。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学院改名所引发的院校趋同问题,要求促进教育制度安排的合理化。

**关键词:** 院校改名, 资源依附, 合法性

美国高等教育以多样化著称,从类型看,即包括女子学院、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私立大学、社区学院等。一个多样化的系统可以更好地为具有不同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学生提供相应的高等教育机会,在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内,每个学生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成功机会。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类型上的多样化目前正呈下降趋势。高等教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过去30年来影响多样化的消极因素。先前几种比较有特色的院校类型(比如男子学院和私立2年制学院)已经趋于消失或者扩展了新的使命。研究者认为当学院扩展了学科专业范围时,它们也逐渐忽视或者抛弃了传统的使命,甚至是原有的生源。自1990年以来,大约120多所的公立和私立4年制学院改名成为大学。这一数量占4年制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5%,所以从学院变为大学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亨廷顿学院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亨廷顿镇,该校建于1896年,是一所教会学院,以基督教教育为宗旨。该校强调文理教育,要求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要学习艺术、历史、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文以该学院为案例,分析其改名为大学的原因,并探析学院改名引发的高等教育趋同问题。

## 一、亨廷顿学院改名的过程

2004年10月,亨廷顿学院董事会投票,把学校名字改为“亨廷顿大学”,学校在2005学年~2006学年初正式启用新的大学名称。该校校长说,“我很高兴董事会决定把学校名称改为大学,这一举措体现了我们已有的成就和我们今后的方向。这个新名字代表了我们的成就并标定了我们的未来”。校长达文登(Dowden)认为,学校将继续强调文理教育和基督教作为专业教育基础的理念。董事会的决定是经一年的慎重研究之后做出的。在2003年10月,董事会委任了一个委员会去探讨从学院转为大学身份的可能性。在一年的时期内,该委员会调查了该校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学生家长、申请该校的高中生和当地社区人士,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学校改名。委员会也考察了当前高等教育的趋势,并研究了其他类似的从“学院”改名为“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经验。

其实,早在1995年该校就做了类似的研究,当时董事会反对变成大学。然而,后来发现该校增加了招生人数,并增加了新的研究生和专业项目后,需要重新考虑原来的决定。2003年春季,该校增加了7个研究生专业,新增了70个本科生专业。“追求大学身份正是学校在扩展学位项目的背景下提出的。我们增加了许多与大学身份相应的研究生项目和专业学位”。委员会主席史密斯(Smith)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公众对新专业项目的认同,而且从近期的学校认证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情况来看,都说明我们符合大学身份所具有的条件,是把学校的名字由‘学院’改为‘大学’的时候了”。委员会成员萨维奇(Savage)认为,“我对学院提高声望和扩展学术课程的过程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发现这是校长、

教师和董事会努力工作以提高学院实力的过程,我们学校完全达到了大学的基准”。

学院改名实质上反映了全美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趋势。自1980年,共有94个中北部学院联合会成员获得了大学的身份。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最近这些年也纷纷改名为“大学”,包括圣弗朗西斯、斯普林阿波尔、布鲁富顿、安德森、印第安纳魏斯理等地。委员会成员迪利(Dilley)认为,“近些年很多同







类院校已经升格为大学,我认为这是值得调查的问题”。委员会还发现与该校属于竞争对手的有20所院校,其中17所是大学。史密斯说:“在一般的公众和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眼中,大学要比学院更加具有吸引力,大学听起来更加有声望。”

委员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相关利益团体都支持学院成为大学,包括学生、教师、职员、校友、亨廷顿学院基金会、家长议会、居民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在一年的时间内研究了改名的利弊。委员会的一位校友成员认为:“我联系了其他校友会的成员。他们代表好几届校友都支持改名。尽管很多30年前的校友反对改名,但大家都知道改名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学生会主席申克(Shenk)在该校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学生也支持改名。他说:“许多学生很兴奋‘学院’改名为‘大学’,因为大学更有声望,尤其是那些国际学生,他们毕业回国工作,无疑大学的文凭更有利于他们找到好工作。”

从该校发展历史看,学校建立于1897年,是中部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到1917年该校改名为亨廷顿学院。委员会成员认为随着学院继续发展,学院仍会保持传统和已有的使命。克拉克(Clark)说:“我们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不打算牺牲我们的基督教传统,不会牺牲我们的文理课程以及密切的师生关系。我们仍会是奉行基督教教义和传统的社区。”史密斯认为:“我们仍是强调基督教文理教育的机构,名称的变化并不比使命本身重要,我们的使命依然是提供基督教教育。”

## 二、“学院”改名为“大学”的解释

### (一)“学院”改名为“大学”更符合外部环境的合法性要求

合法性是学院扩展使命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斯科特和迈耶认为,“组织如果要获得支持和合法性的话,必须遵守复杂的规则和制度”。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即是“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资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包含以下三大要素:法令规章体系、规范体系和文化认知体系”。这三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而“文化——认知”即“普遍的符号体系”和“共同意义”的构建则界定了制度产生的根本机制。综上所述,我们给出合法性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即某一制度符合法的性质,其中,法的范围要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的范围,它可以是一种法令规章,也可以是一种秩序和规则;还可以是一般所接受的标准,即同一性的社会认同机制。这三者层层递进,从法令到规范再到文化认知,共同构成了合法性的三个层面。“学院”改名为“大学”以及采用大学的结构和行为会帮助较低地位的学院给外部体制传达一个合法性的信号。因为“当提到学院时,人们会自然想到学院是非常小,水平很低的,而大学则是学科专业齐全,学位授予范围广泛的机构”。亨廷顿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说:“在一般的公众和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眼中,大学要比学院更加具有吸引力,大学听起来更加有声望。”

在高等教育领域,卡内基分类法为院校向上层次发展提供了一个标准。艾德斯里(Aldersley)分析了卡内基分类法中各类型院校在1976年~1994年期间的变化,发现几乎所有的院校都向上层次发展了,而不是追求机构的创新模式。他比较了1976年~1987年与1987年~1994年的变化,发现综合的研究型大学为所有类型的高校提供了共同的发展模式。此外,各种认证机构和大学学科专业标准也规制了大学各专业和学科领域的合法性。“学院”改名为“大学”的趋势和实践符合外部制度环境对学院的合法性要求。

### (二)“学院”改名为“大学”可以获得重要的和实际的资源

根据资源依附理论,组织成功的关键是获得和保持足够的资源。该理论解释了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的必要性,组织必须和外界情景互动,解决外部的需求问题。实际上,资源依附理论主要解决的是互赖问题。例如,大学与学生是互赖的,大学要想成功,必须有成绩优秀的学生入学。同样,大学与政府和立法者





也是互赖的,大学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反过来,政府也需要大学培养优秀的人才,以实现政府的目标。根据凯瑞特(Kraatz)和赞科(Zajac)的研究,资源依附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私立文理学院的组织行为。他们发现组织变化与资源获得密切相关,文理学院的新学位项目设置很少受地位高的学院的影响,而更多是受学生需要的影响,满足了学生的需求无疑等于获得了切实的办学资源。

资源依附理论解释了“学院”改名为“大学”在资源上的考虑。而且事实证明,一些学院改名为大学后获得的资助和捐赠明显多于学院时期。学院和大学的使命陈述表明它们彼此有着不同的目标,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冲突。许多学院和大学通过开设远程教育、促进技术转让或者增设新的研究生专业来获取资源,从使命比较狭窄的学院升格为使命更为综合的大学。资源依附理论解释了“学院”变为“大学”这样的行为与院校为了获得更多的运行基金、捐赠和研究资金等资源存在关联。改名的院校的校长陈述也证明了该假设。例如爱荷华州的布里亚·克利夫(Briar Cliff)学院于2001年改名为布里亚·克利夫(Briar Cliff)大学,该校校长就认为:“除非你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否则你不会有什么名气。但当你成为大学后,人们开始关注你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了。”从该校长的陈述可以看到,名称上的变化是院校与其他更有声望的大学竞争资源的策略之一。高等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一样,把改名作为向外界利益相关者释放的一种信号,表示组织所出现的变化反映了它们的新方向。

### (三) “学院”改名为“大学”更好地体现了综合化的属性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后大众化阶段发展,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使得院校需要对此做出反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生对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院”改为“大学”体现了当前机构的发展需要。许多先前只提供本科生教育的学院开始提供研究生教育以吸引学生和保持入学率。这些机构已经改变或者废除了原来的使命,以新设的学科吸引更多的学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从学生入学率以及需求的变化看,可以预测到许多学院向上个层次大学演进的趋势。甘波特考察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向“后大众化”的发展,提出高等教育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应反映今日高等教育市场的现实,即学生及其需要。这就意味着对大多数非高选择性的以及没有重要捐赠来源的学校,必须使专业和服务满足当前学生的需求。尤其是目前的学生和传统学生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高校职业学位(以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为职业发展需要再次进入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10%。院校采用“大学”的身份,能够更好地体现当前组织的现实情况。例如,亨廷顿学院决定改名为“大学”时,校长对教师和行政人员做了如下解释:“我们多次探讨过学院改名的原因。不过董事会决定把‘学院’改名为‘大学’首要的原因是更好地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在过去若干年里,我们学校已经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学术机构。仅2003年春季,我们增加了7个研究生专业,新增了70个本科专业。董事会相信亨廷顿大学能够更好地描述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且帮助我们不断挖掘潜力。”

可见,“学院”改变名称成为“大学”传递了这样的信号:采用“大学”的名称是“姗姗来迟”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学院已经提供大量的研究生学位以及较多的综合学位项目的现实。要知道,在历史上,“大学”的名称即是用于那些有相当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的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先前的本科学院为吸引更多的学生以及稳定入学的规模,纷纷开设研究生专业。这些院校实质上已经扩展了先前的本科生教育的使命,所以采用“大学”的名称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前的现实情况,从而吸引那些对新近开设的学位项目有兴趣的学生。

### 三、学院升格造成高等教育趋同化

学院纷纷改名或升格为大学的趋势造成了高等教育多样化降低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趋同化。克拉克·克尔在谈到以高等学校职能分化为主题的《1960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时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趋同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后就十分





严重,“有些州立学院想要成为羽毛丰满的研究型大学,有些社区学院想要成为4年制学院”,而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一所赠地学院和一所师范学院到研究型大学的成功转型,更增强了许多学校升格的决心。

学院纷纷改名为“大学”被研究者描述为“院校随波逐流”(academic drift),指的是院校在缺少控制的情况下,复制声望高的大学的角色和使命的趋势。其中瑞斯曼是最早的研究者,他研究了美国学术机构的模仿行为,认为这是一种随波逐流的现象。身份较低的学院总是模仿比较成功的和有地位的院校。他强调了一流院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它们为地位较低的院校发展提供了蓝本。这种模仿行为造成了高等教育分化的降低,强化了趋同。他还认为在院校模仿过程中,不仅院校如此,教师也是如此。他说:“毫无疑问,大学和学院相互模仿,所有人应该做的是阅读分类学以认识到这种趋同的范围。整个过程涉及到所有的大学组织、所有的系科。人们进入大学教书,给大学以应有的形象。这些形象宛如空中楼阁,不是任何一个研究所能呈现的。”他认为,对教师的训练和教师本人都对学术机构的随波逐流产生了影响。他以布法罗大学为例,该校法律系的教师有一半来自哈佛大学,他们大多数想要教授在哈佛所经历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有着极大的声誉。这无疑影响到了布法罗大学法律专业的设置。

学术机构随波逐流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具有消极的影响,并且会降低高等教育的效能。伯恩鲍姆指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满足学生变化需求的指标。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能够满足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需求,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综合教育。但学院纷纷改名所造成的学术机构随波逐流现象降低了高等教育系统形态的多样化,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多样化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此外,学院随波逐流也是高等教育系统效能的指标。当各州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实际拨款数额保持稳定时,州协调委员会和州大学理事会为了保障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和综合性,一起致力于保持机构多样化,结果州一级的专业评审机制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 四、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学院改名为大学的趋势日渐明显。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5月24日,全国普通高校共1,794所,其中冠名为“大学”的高校280所(含20世纪80年代历史遗留的15所专科、职业类大学;107所“211”高校中除“中央音乐学院”外,其余106所全部冠名为“大学”),冠名为“学院”的高校1,514所(其中专科院校1,091所)。实质上,大学改名并不是近年才有的现象,自1978以来,我国高校改名为“大学”的现象有三次较为集中的时期。第一次是1986年《高校设置暂行条例》颁行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学院升格为大学;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如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1994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三次是2000年以来伴随众多高校合并掀起的新一轮改名浪潮:一方面是一些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学院”,另一方面是一些学院改名为“大学”。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些专科学校更名为学院、一些学院更名为大学。

在我国,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规定,大学和学院名称具有等级、办学实力差别的涵义,这无疑为学院改名为大学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大学更名意味着升格,升格意味着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发展空间。改名使学校在教育资源的竞争(包括学校的层次定位、办学规模、招生指标、学位授予资格、职称评定标准、拨款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更名涉及的便不仅仅是“名”,它更有助于大学动员和获取更多的组织资源。可见,中美“学院”改名为“大学”是基于符号意义上的合法性以及追求更多资源的诉求,但改名的同时也造成了院校普遍趋同,缺乏特色。由此,必须促进教育制度安排的理性化以及教育政策价值的多元化,从根本上促进高等教育的层次调和与平衡。同时,可以预见的是,“学院”改名为“大学”初期所获得的招生以及其他办学资源上的优势,将随着同层次院校竞争格局的重新布局而消失,院校只有持续进行变革,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王占军 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

